



闽 都 文 化 掠 影

衣锦坊双青园

唐 希 摄/文

在三坊七巷大整修时，衣锦坊35号花厅门堵墙上突现一块被抹上水泥的石碑，剥落水泥后显现隶体“双青园”三个大字。碑首刻长方章“永春堂”，落款“甲戌（1934）长至，青山农”，钤“黄葆戍印”。

黄葆戍字蕙农，别号青山农，长乐青山村人，曾任福建公立第一图书馆代馆长，从1925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永春堂”是黄葆戍斋名之一。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大门两侧的楹联也出自他手笔。

青山黄氏家族系南宋大儒黄勉斋后裔，黄葆戍系黄勉斋第二十二世孙。这座院子曾属同为青山黄氏族亲的黄守素。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门工作的黄守素喜添双胞胎孙女，为了怀念乡梓取名“大青”“小青”，将金陵的府邸命名“双青园”，并请文化名人、同宗长辈黄葆戍为之书写了这块碑，立于花园之中。1949年，黄守素告老还乡回到福州。他购得衣锦坊一座带花厅的大厝，东邻欧阳花厅，将双青园石碑从南京“移植”回故里，嵌于门堵墙上。动乱岁月石碑被封存保护。2007年，黄守素后人黄心初随三坊七巷改造搬离衣锦坊，将“双青园”石碑以及家族前辈人的故事留在了园子里。

双青园石碑的出现开启一段尘封的文史旧话，当年的文坛精英、社会名流在坊巷里留下的文化印记，成为地方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们进一步探讨和挖掘古厝人文故事的支点。如今双青园活化成福建闽剧非遗传承点以及“福建榜书创研中心”。

目 录

文苑艺林

- 4 福州历史名人与城乡水利建设述略 / 杨济亮
- 11 福州邮驿的设置——兼谈宾馆公馆及烽燧 / 庄 勇
- 16 国际视阈下的林译小说——纪念林纾逝世一百周年 / 邹自振
- 22 浅说林廷玉题刻 / 陈常飞
- 24 寻盟访鼓山 风物宛如昨——李纲的鼓山诗作和鼓山情怀 / 危砖黄

十邑纵横

- 27 情系三山两塔 / 唐 希
- 31 旧闽县壶山施氏宗祠 / 施文铃
- 34 古今同辉晋安城 / 缪淑秀
- 37 琴亭岁华记 / 孟丰敏
- 42 “庆丰庄”的故事 / 邵良官
- 45 华林寺里千年莲 / 张 茜

人物春秋

- 48 蔡襄：飞毫划峭壁 灵源为之开 / 蔡 林
- 52 名门绣手曾明 / 林丽钦
- 53 从台江走出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侯德榜 / 石丽钦
- 59 闽峤女宗——王眉寿 / 方 琪
- 61 林旭“维新”谋福 / 江 榕
- 63 林云铭与古文析义 / 黄益群

封面：元宵节买花灯（1985年）林振寿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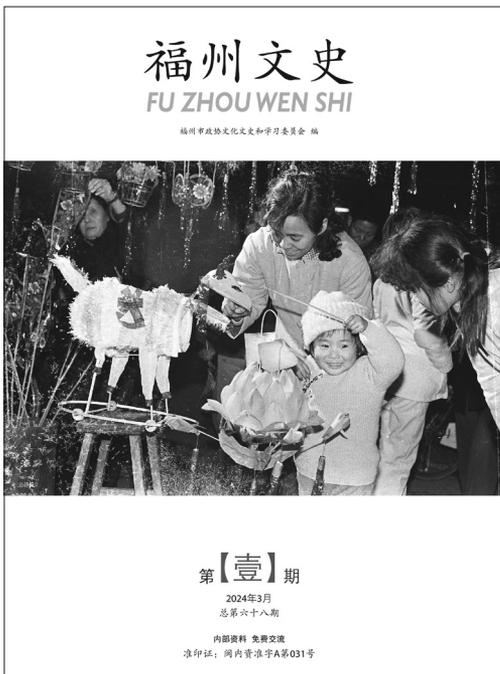
彩插：福州古塔（林振寿 文 / 图）

封底：张斌篆刻

福州文史

2024年 第一期

(总第六十八期)



主管：政协福州市委员会
主办：福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福州文史》编委会

主任：林澄
副主任：周应忠
委员：陈高英 杨凡 卢玲
李大林 陈泽山 张振玉
李仲才 唐希

编辑部

主编：陈高英
副主编：卢玲 李大林
编辑：陈泽山 唐希 林丽钦
潘登 万瑜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25号
邮编：350003
电话：0591-87808927 87831257
传真：0591-87816430

电子邮箱：wswb@sina.com
印刷：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刊号：闽内资准字A第031号
印刷数量：1500册
发送对象：系统内发送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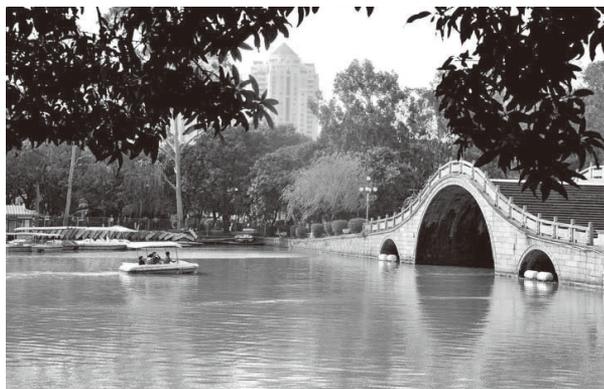
福州历史名人与城乡水利建设述略

◇杨济亮

一般来讲，水利概念范畴包括防洪、防潮、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港工(开渠通航)等八种工程。20世纪后半叶，水利又增加了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环境水利和水利渔业等新内容。在古代，农田水利关乎农民收成，城隍港道水利影响防御、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不少文人甚至认为水利关系一方文运兴衰。所以不同时期，不同人群都出于不同的动机参与地方水利建设。官方通过动员地方社会参与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提高自身权威，以更好地管理地方事务。地方大族与个人通过参与水利建设与管理，保障乡族自身利益，获得更高的声望与地方话语权。寺观僧侣以其强大的号召力，推动地方水利发展，也在此过程中获得精神与道义上的满足。历史上，福州涌现了一批治水名宦和能人，通过水利建设与管理，大大促进了福州



东湖镇天竹村



福州西湖

地区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一、晋至唐五代福州官宦名人与水利建设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分建安郡地设晋安郡，治所侯官县，郡守严高组织民工在“凿东西二湖，周回各二十里，引东北各山溪水注于东湖，引西北诸山溪水注于西湖，二湖与闽海潮汐通，所溉田不可胜计”。东、西湖不仅是古代福建最早的水利工程，也是效益显著的水利工程。到南宋淳熙十年，疏浚“尽复其制”东、西湖，仍能使闽县、侯官、怀安“三县承食水利民田一共一万四千四百五亩”。林晓，连江县城北郊钦平上里人，约生于南朝梁大同年间。祖上颇为殷富，广有田产。晓承家业，富有爱心，常疏财仗义，济人之急。他慨然将全部田产舍以为湖，尚有少数不属他的田产，他也主动与各田主联系，以他的

别处田地交换或价购调整补充，计得3800亩（古代计算单位，约合2000市亩）。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发动农民兴工挖凿，历两年多告竣，取名东湖。据民国版《连江县志》载，湖形如掌，西高东低，周围20里，面积663551步，深1.3丈，出口处筑坝设闸，以司开关。上纳九溪之水，下灌北野青塘、山下（今上山和下山两村）、白沙、浦下、毗屯、县尾下（今凤尾村）、上林街（今凤城镇绿茵村）7墩之田，受泽农田4万亩（今测1.2万市亩），惠及3000多户农民。

唐五代时期，福州的水利灌溉工程是以湖潴蓄水泽为主，在湖与湖之间有大濠相接，同时湖水通过闸门又与河浦相通。天旱时，则利用所聚湖水灌溉田园，即使高地之田也无干涸之忧。雨水泛滥时，则放泄湖水流入河浦，低洼之田也无淹浸之患，旱涝保收，百姓享丰年之利。唐贞元十一年（795），福建观察使王翊在福州城西南开挖南湖，“接西湖之水灌于东南”，以备干旱季节农田汲用，又开“洪塘浦，自石岵江而东，经鹭渚而至柳桥，以通舟楫”。

唐代是福州水利建设的高峰期，沿海人民开始采用筑堤泻卤方法围海造田，开发出围田或圩田。大和三年（829），闽县令李茸于县东5里筑海堤，堤成后引溪水种植水稻，使深受卤潮之害的沙洲300公顷皆成良田。[1]大和七年（833），李茸任长乐县令，在县东十里筑海堤，立斗门10座以防御海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其旁皆成良田。咸通初，连江知县刘逵奏复开掘于隋朝但年久壅阏的连江东湖，“列大树以固堤防……设斗门以通沟洫”，[2]进一步巩固发展了东湖的灌溉功能。在官府的带动下，民间还开掘修筑了长乐县的严公湖、滨闰湖、桃枝湖、陈令津湖和林婆湖，连江县的材塘、财溪坝，福清的天宝陂等湖塘和水利设施。材塘系贞观元年时筑。长乐西湖又名严公湖，唐宝应二年，里人严光舍田而凿，周3280丈，亦名放生湖。中有小阜，曰蟹山。后渐湮。陈大建年间（约569-582）。黄仲昭《八闽通志》载：唐天宝五年，长乐仓曹林颺于方乐、崇仁、和风三乡筑堤五处，复舍己田为湖，



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

周一千二百丈，窠八，沟八，沟阔一丈二尺，溉田里氏田，凡七百余顷，因复开陈塘港，以泄三乡及西湖之水，而注之江，又奏请立石炉峰皇恩寺、纪其限界，禁民不得侵傍湖余地为田，以防水利。详载本湖规簿，今俗呼“东湖”。长乐今有林长者祠，即当地人为纪念这位东湖缔造者所立。唐时县令陈齐贤捐俸买民田，开沟泄水，后人凿石记之，曰“陈令津”。

宋梁克家《三山志》引“旧记”（按：应即林谔《闽中记》）载虎节门大桥，“前大桥河，晋严高开，舟楫往来，因名大航”。可见自晋代起，子城的南门外大航河（护城河）就是重要的航运水道。“后五百年，当唐元和八年至十年（813-815）中，观察使薛謩再浚河”，以油杉作堤限，说明大航河对福州城内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性。

五代时期，在闽王王审知的统治下，福州沿海屡兴大型水利工程。如福清境内的占计塘，闽

忠懿王筑埭，东起化北白石，西至临江里桑墩洋，延亘15里，堤渡大塘、东芋前，木杈、占计、拓泼、郑坑、白洋、上坑，溉田三千顷余。另，大塘海傍，闽王时以兵筑之，堤防潮水，溉田种3600石（梁克家《三山志》卷16）。开平四年（910），王审知在福州“大浚侯官县西湖，广至四十里，灌溉民田无算”，使得“卑田无淹没之患”。除开辟陂塘外，福州人民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垦造田。如长溪县“赤岸居民垦辟赤卤地，得田千余亩”。五代时期的水利建设促进了福州的农业发展，故于兢《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赞王审知治闽时“鸡犬相闻，时和丰年，家给人足”。

二、宋元时期福州治水能臣和水利事业

宋元时期，民间百姓包括不少僧侣修筑堤陂，又围垦了许多埭田，《闽书》记“凡诸港浦埭塘皆古人填海而成之”。如万安里的香严上下洋：天禧二年，僧师振募八千缗，筑堤九百丈，高五尺，厚倍之，斗门三，泥门五，凡十一年乃成。又如安香里的苏溪陂，溪道凿石，石铎山间入海。天圣二年，西禅请万安、安香二里内地，因遏为陂，溉田千余顷。派别为莲塘十六顷。熙宁间，郭知县按田留诗“万工填巨海，千古作良田”。福清苏田里黄蘗郑渚田，“天禧元年，僧履原堤之，光贤里绵亭洋，僧惟真截溪十二派、漆林洋白濞陂唐黄檗僧开”。僧民也常常合力共建水利设施。如北宋开宝年间，中山人刘逢以滨海地数千丈施于东禅寺，乃筑旱腾……凡十年三筑乃成……岁收千石。又如，宁德县赤隘坡是“元祐四年，土人林圭与僧录灵泉寺僧养誉，以陂下田户百六十均所费……溉田三百八十顷，受种二千四百石，园艺不计”。南宋绍兴年间，福州城内的甘棠闸和使君闸也是由法海和庆城二寺僧人管理的。宋代民间主要采取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组织方式来兴修水利设施。当然也有官方组织田户兴建，如元符陂的修建。

位于福清市观音埔村的元符陂，唐天宝中置，故名天宝。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知县郎简重修天宝陂，后为洪水所毁。熙宁五



福清市观音埔元符陂

年（1072），知县崔宗臣“岁科田户，鸣鼓兴筑，不至者罚之，邑司著籍”。后又毁。宋元符二年（1099），知县庄柔正主持重修，溶铜汁锢其基，广十丈，灌溉田亩如昔，更名为元符陂”。此后，明万历年间、民国34年（1945）又多次重修。明叶向高《重修元符陂记》说：“吾邑滨海，土田瘠薄，又鲜有泉涌灌溉之利，雨暘一不时，苗立枯矣，惟西有陂，名天宝，水自仙游而来，历清源、善福，达新丰、仁寿二里，沃田数千顷……水利悉复，岁不能灾，五洋二十五墩，数万人咸被其泽。”此陂用大量条石及鹅卵石砌筑成长约220米，高约3.5米的拦水坝。天宝陂是闽中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2020年12月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官府要动用大量民力督修水利，主要是以赋役形式直接摊派，而出资则按照比例承担。宋代，福州城区面积较小，北至屏山，南到今东街口一带，西至西湖，东到七星井一带，周围与闽县、侯官、怀安三县接壤。嘉祐元年（1056）八月，蔡襄二度来福州任职时，把福州的城区建设、百姓供水和河道清污同三县兴修水利有机结合起来。据《三山志》记载，嘉祐二年（1057），“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命闽县县令朱定开沟负城河浦176处，计21976丈，均用民力，凡八万九千，灌溉农田3600公顷；侯官“疏导渠浦69处，总长125里”，“田主以四分佃户，以六开浚，借盘水利者，亦四分助之，仍命民以时修治，不用命者有罚”；也就是说，蔡襄令民户依受益程度按比例

分摊治水费用。晋安河是北宋开宝七年(974),刺史钱昱修筑外城时,在东门外挖的一条护城濠。这条护城濠又短又窄,由于多年失修,泥沙淤积,水流不通。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河,沿城外抵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港、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知县樊纪复作桥十三。与此同时,蔡襄还发动群众清理城区内河,并开通自清水堰起至利涉桥、清泰桥,经开元寺至东康门桥的河道,使城内的各条干渠连成一体,与晋安河相通,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网。

南宋宗室赵汝愚曾两次任职福建,那时福州西湖经前几任知州蔡襄、曹颖叔、程师孟等“渐次修筑”已逾百年,经常闹旱涝灾害。宋熙宁十年(1183),赵汝愚首任福州刺史时,上奏议开浚西湖,后“朝廷从之”。这年冬天,赵汝愚即从州库提钱数百缗彻底开浚西湖,使受利的三县(闽、侯官、怀安)民田达14000余亩。第二年八月,福州淫雨两个多月,三县民田幸赖西湖而不受涝。赵汝愚的师友、理学家朱熹有《次赵汝愚开西湖》两首诗加以称道,其一是:“百年地辟有奇功,创见犹惊鹤发翁。共喜安车迎国老,更传佳句走邮童。闲来且看潮头入,乐事宁忧酒盏

空。会见台星与卿月,交光齐照广寒宫。”

宋代,福州郊县的水利事业也涌现不少名人。如鞠仲谋(字有开),密州高密(今山东高密市)人,雍熙年(985)进士,官至开封府判官、兵部员外郎,他在连江县任上兴修的东湖水利工程为后世称道。长乐与连江两县因水利建设的成就,得到朝廷表彰。绍熙元年,宋廷下诏说:“福州长乐知县徐暮、连江知县曾模,各特转一官,以本路安抚使言葛兴修管下湖塘水利及创造斗门一百四所,灌溉民田二千八百余顷;着开浚东湖塘二十余里、造水闸、筑埠塍一百二十余所,灌溉田二千余项。”

北宋年间,理学家、音乐家陈旸目睹家乡闽清二都(今云龙乡)农事灌溉用水需求无序,倡导下游乡亲们兴修水渠,在濠上水头建筑拦水陂坝,科学合理地利用水资源。这里河床属整体的花岗岩结构,在岩石上凿洞立木桩;坝体材料则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松木、芒草、黄土等进行穿插叠压夯构,既牢固又经济,堪称闽清水利工程史上的创举。陈旸在绍圣元年考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人们为纪念陈旸的功绩,将拦水陂取名为“贤良陂”。

长乐陈塘港历史悠久,唐大历年间初辟。南



长乐陈塘港

宋咸淳年间，邑人状元陈文龙见乡人常遭旱灾，在二十三都海地筑田砌塘，疏通河渠，会东西两湖之水，长50余里，水深丈余，北伸黄浦闸入海，南经杜桥（今渡桥）、沙京至壶井江，通三溪，建造斗门闸，将所有溪河之水汇归弦歌里（今潭头一带），沟通梅林（今梅花、文岭），成为舸船的主要航道。陈塘港挖通以后，历代地方官员多有疏浚扩建，明洪武间，“典史黄本修筑（间山塘），北溯二十三都北陈塘港水，以荫民田、南障海潮”；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县贺世骏重修陈塘港。民国3年，知事吴鼎芬又重竣东、西湖及陈塘港。

三、明清时期的福州治水业绩与名人

明代工部侍郎董应举，清代学者陈寿祺、郭柏苍均从堪輿学角度说明，福州省城河港的开塞与水流的顺逆有“人事征应”的关系，认为它们关涉省城的文物盛衰和仕宦命运，指出“省城龙脉水法非，故人事渐乖”，强调保持内河水流通畅，小则可以做到“舟楫不绝，货财日积，人物日盛”，大则可“以回王气，以昌文运，以利民生，以安地方”。董应举在福州期间，曾为疏浚护城河、西湖，美化福州做了许多工作，福州人对此曾在朱紫坊建祠纪念他。

明正统十年（1445），长乐县民刘彦良言“本县严湖周围二十余里，南接稠庵溪，西通倒流溪，旱则引稠庵溪入湖溉田，雨则疏倒流溪以防其涨。近者湖岸坍决，溪流湮塞，不能积水防旱，雨则田或湮没”。明隆庆四年，知县蒋以忠率民众对长乐东湖进行疏浚、修复。东湖水系与西湖水系，通过人工河道构成陈塘港水网，起着蓄水、调节水位以及灌溉、运输、养殖等功用。

明代，长乐“左山右海，北方利在堤堰，南方利在湖塘，所利不同，则措置亦异”^[3]，因此，湖塘作为水利设施也时常受到占垦和养殖的严重影响，乡村宗族间甚至因利益相争而引发械斗殒命等事。因此，需要州县官“力主公道”，合理分配水源。如明末《长乐夏允彝横岭湖审词碑》提到：“时值亢旱，辄与内争，关系既巨，众力弥

坚……甚有如正统之事，为之破家丧躯，胶纷不解者矣。”清光绪六年，长乐知事徐承禧的《重浚严湖即西湖碑》也讲到乾隆二十七年，安成贺公划田还湖，湖界以清，迄今日久，湖洲淤浅，民占垦，湖田日广，湖面日蹙，甚至竞收湖利，械斗以争，叠酿巨案”。“安成贺公”指的是长乐知县贺世骏。永泰县嵩口义渡处有一块碑文，记载了大樟流域陈、林二姓水田争执事件，甚至惊动了福建巡抚。碑文详细记载了争水的缘由：“乾隆三十九年间，偶遇天旱□□□□□□□□后设立大坪洋木枧，并穿开加垅寨涵洞，捋大坪坝洋水决流入南，致陈家北岸西首田亩无水。”官府为防止两家争讼不休，作出裁决：“断令陈林二姓各捋涵洞水圳，填塞水坝，照旧拆低□听坑坝，各水照旧流灌，永不许陈林两姓设立木枧，以昭平允；主陈姓所典林其勉田亩，着林姓照契赎回，永杜争端。”

在马尾琅岐海屿村关西杨氏宗祠前古榕下立着一方明代义湖开湖碑，正面碑额横刻“皇明”，中间镌刻“杨公仕琮舍田开湖”，左边镌刻“万历丁未年十二月通乡立”。明万历丁未年（1607）春，海屿村六姓族长及乡绅开会商量开湖蓄水事宜。可是，湖开在哪里、开湖资金如何筹集都是个未知数。杨仕琮带头响应，与子孙商量，把位于村口、祖传的十几亩水田捐献出来开湖。海屿父老见杨仕琮舍田开湖，十分高兴，奔走相告。动工开湖之后，杨仕琮又捐献白银数十两作为扶助开湖工钱。村民们在仕琮公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仅半年时间，义湖就开出来了。同时，湖中放养鱼苗，每年春节，湖鱼按人口分给村民过年。

水利设施的日常管理，主要靠乡约族规对族人和村民的约束。湖塘水利还会与养殖业产生矛盾，长乐潭头镇二刘村咸丰辛酉年（1861）立的《禁抽水捕鱼碑》就提到“毋得妄传闸板”“不许私抽以捕鱼蟹”，“如有违者，宗祠议罚”。

连江马鼻塘修建于元、明间。马鼻塘正溪全长二十多里，集风水、灌溉、分洪、饮用，观光于一体。万历三年，正溪斗门头重修时，时任连

江知县的钱九思专门写了重修碑文。清代，闽县兴修白石、斗米二堤，知县龚廷扬与“诸父老议，地主出资，佃出力，民力之所不及，长吏借助之，长吏整体之所不及，上官借助之”。二堤告成，又立约曰：“尔民合于农隙时，家出一丁、亩出一工，时加培植，以不致于溃决乎。”这些都是以民力为主，官府“倡率”或“借助”的做法，实则即“民办官助”的模式。

兴修水利还会与千方百计侵占湖田的势家豪族产生冲突。福州西湖在明代“为豪右所据……诡名受税，奄而有之，启闭不时，畜泄失度”。这些地方势力假编受税证明，实占湖边淤田。万历四十年，按察使陈邦瞻“始立议以湖归官，以湖利归民”，副使李思诚捐俸修闸，采取豁免湖田赋税，从而还田于湖，就是釜底抽薪，把诡名受税侵占湖田的渠道堵塞了。清乾隆十三年（1748）春，潘思榘（谥号敏惠）从安徽巡抚调任福建巡抚，当时福州“天久不雨，西湖之浅可涉也”。西湖水利关系周边几万畝的农田，他与布政使商议，命福州知府负责疏浚西湖事宜，十一月动工，年底竣工。当年冬，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谥号文襄）任福建总督，和巡抚徐嗣曾商议疏浚西湖和内河。两个月后，福康安调任两广巡抚，最后浚湖工程由徐嗣曾于第二年五月完成。清道光戊子（1828）正月，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林则徐丁忧在家。当时西湖“奸民侵盗，壅为园池，陆种蔬菜，水种菱藕，湖日益隘”。同年八月，林则徐为兴修水利以惠桑梓，在总督孙尔准，巡抚韩克均的支持下，与海防同知陆我嵩，闽县知县陈铎着手重浚西湖。其工程浩大，历时一年有余，在湖边四周砌石为堤，以杜占垦，其长1236.5丈，湖堤自是始。

清末，福州著名藏书家、水利学家郭柏苍曾推动了福州的南城壕和三元沟、七星沟治理。在治理南城壕、三元沟时，不止发动民众，官方也为南城壕治理发布告示，倡议“绅士庶民亦各出愿力，积丝为缕，以助斯役”。同时，还派出了不少兵勇参与疏浚。更重要的是，郭柏苍还推动官府支持他动员、教育市民养成良好的保护城区



许世英西湖碑刻“击楫”

生态的习惯，组织民间力量维护好城壕，规定沿城壕而居的市民，每百户推选若干户组成日常督导、管理力量，“许绅庶随时稽察”。由于有人监察监管，就较为有效地制止了那些有害城壕生态的不道德行为，营造了重视环保的新风气。郭柏苍多次主持疏浚福州城里城外的怀安、洪塘、濂浦等多条河流，以减轻省城水患，也有利于城郊农田果园的灌溉。他还用心将治河疏理城壕的过程用笔记录下来，先后撰写《三元沟始末》《福州浚湖事略》《闽会水利故》《新港开塞论》《福州入城地脉水法》等著作，将治河史料素材梳理成文，以利后人。三元沟是福州最古老排水沟之一，建于宋皇祐年间（1049-1054），清同治六年（1867）重浚，自府学（今延安中学）泮池之底，经圣庙月升地，过圣庙路、福履营、夏体井出城入濠。沟的末端设有一口池塘，入濠处设有闸门，并规定蓄水高度和启闭闸门时间，立碑勒石，使排水畅通。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变化，沟道后多被民房穿越。

光绪年间，福建督抚还借用船政衙门机船，

继由上海机器局代向外洋购运连珠斗挖土机船，并由厂添造土船，以机船居中开挖闽江东、西两港（实即南、北两港），土船左、右随之分装沙土，雇工运岸堆卸，土船敷分装，则添雇渔船帮运。还沿江河分段插竹，导水归港，以分其势。四、五年间，均无水患，内河疏浚取得一定成效。

四、民国时期的福州治水名人和史事

闽侯上街的厚美堰筑于明万历年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三日，闽江上游溪洪暴发，福州城内平地水深2米至3米，田园庐舍浸没甚多。”^[4]厚美村防洪堤决口，整个上街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全村只有环翠楼是两层全木结构，成了村民的避灾地。灾后村民展开自救，齐心协力，堵住决口。1912年11月16日，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曾任奉天巡按使等职的张元奇被任命为福建省民政长。1913年1月9日回到故乡厚美村，当即决定拨款加固闽江西岸防洪堤，使堤内园地面积扩大了200多亩，另在古山洲及厚美村防洪堤外栽种竹子数排，这样既可减轻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力，更重要的是还能疏浚闽江河道，加快洪峰入海的速度。堤外栽竹与修堤两项工程，由时任福建水利局局长林炳章具体负责，他是林则徐的曾孙、陈宝琛的女婿。工程告竣，遂立碑于厚美堰前，碑身坐东朝西，“大跃进”年代被移作他用，后填埋于阴沟之中，直至被村民发现。

民国3年（1914），许世英主闽期间拨盐务款修浚福州西湖，并正式辟为公园。为整治西湖，任命林炳章为水利局局长，兼管治湖工程。经过两百多天的挖湖清泥，浚治福州西湖灌田渠浦1760丈，修缮旧闸门，重修开化寺、镜湖亭、春声花园等，增筑紫薇厅、海棠亭、湖心亭，于民国4年竣工，西湖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把园内的李纲祠及林则徐读书处桂斋修葺一新并分别题联，表达对前贤的崇敬之情。

民国初年，陈培锬倡修闽江台马航道，于民国6年聘请上海黄浦局总工程师瑞典人海德生来闽视察。民国7年，经省政府、各国驻福州领事馆和闽海关税务司同意，报北京政府和外国驻京

公使批准，于次年成立修浚闽江总局。海德生推荐北洋大学铁道工程教授美国人韦斯德来闽任总工程师，并成立工程处。在闽江沿岸抛石筑坝进行疏浚，整治了马尾到福州城区的航道。民国16年因工程进展缓慢，辞退外籍工程师，由顺直水利委员会工程师陈鸿泰（此后最早提出科学治理黄河）接任，前后历时15年，用款160余万元，于民国23年（1934）完工，使航行于上海至福州的1500吨级轮船可驶抵台江万寿桥下。民国24年，在福州台江江滨路建造了6座小码头，即俗称的第一至第六码头；同时聘用荷兰人，由上海铁工厂承包，于民国25年在马尾罗星塔畔也建造浮码头2座，可供4000吨海轮靠泊，另建有2座仓库。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长杨树庄兼任福建省长。他以在马尾办铸币厂所赚的40万大洋，在长乐县龙门高氏宗祠设立海军长乐“莲柄港溉田局”，局长马德骥，总工程师杨廷玉，招募上海工程队开山凿渠。早在宋代大观年间，林慎思八世孙林安上就上书倡议开山凿港，引闽江水灌溉长乐东部平原，但由于石坚难凿，三年无成。明嘉靖元年（1522），退休回家的云南布政使林恕，又建议兴修莲柄港水利，但地方政府无心实施。莲柄港溉田局选择龙门村的二桥和莲柄港村的马林桥两处建设两座抽水厂，各安装400匹马力抽水机一部，每机抽水高达8.5米，使南区北山、鹤上等18村6万亩农田获得灌溉。1931年因征收水费纠纷，设备被当地民众捣毁。1935年集资重建，采用电动抽水，受益面积减为3.6万亩。1940年，长乐沦陷，机器被日军拆走，厂房亦被摧毁。1947年，由工赈物资局拨款重购柴油机2台各500马力恢复运转。

注释：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地理志》。

[2] 陈寿祺等《重纂福建通志》卷33《水利》引《宋鞠仲谋东湖记》。

[3] 李驹《长乐县志·卷五》。

[4] 《福州大事记》。

福州邮驿的设置——兼谈宾馆公馆及烽燧

◇庄 勇

中国邮驿历史长达三千多年。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就出现了驿亭传舍。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开创邮驿制度，对以后的驿道开拓和邮驿设置、运作及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邮驿机构设置主要有驿、亭、铺、所、塘、馆、烽燧几种组织形式。驿即驿站，承担接待官员使臣，运输官物和兼管邮驿任务。亭指邮亭，级别略低于驿站，管理范围较小。元代以后，或

升亭为驿，或取消亭之组织。铺即铺递，是承担传递公文、军情的重要的基层通信组织。所指递运所，是明、清两代邮驿专为运送官府公物、贡品等大宗物资而设的邮驿组织。塘也称塘汛，是地方负责边防、治安的基层军事组织，设置塘递人员，传递当地官府的普通公文、军事情报。

馆指宾馆公馆，是接待军政要员和外交使臣食宿、休憩的专业性服务机构，都由官方出资建造和派员管理。宾馆公馆是一个地方的对外窗口，显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当地官府多“以整洁的环境，宽敞的屋宇，华丽的设备，博得过往人员的欢心”（王俊《中国古代邮驿》，第五章宋元时期的邮驿，第85页）。古代福州的宾馆公馆多设于城中以及县邑、邮驿干线、码头等处，以便于宾客出行和迎送接待。

烽燧，称烽火台，又称烟墩、烽墩、墩台。是在当地军事部门领导下，专门设置的观察敌情、紧急报警的通信组织。这种利用声光传递军情警讯的通信方式，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烽燧通常选择便于瞭望的高山险要之处或高台之上，建造观察和燃烟放火的设施，台下可因地制宜，建有供士卒守卫的房屋、仓库等。烽燧可独立构筑，也可依据地形地貌，成犄角配置为烽燧群。烽燧之间距离为20~30里不等。守台士兵一旦发现敌情，立即燃起烽燧，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将敌情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浦城仙霞山顶及汉阳城



《中国邮驿发达史》书影

于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徐善所设的烽燧遗迹至今尚存,为福建最早的烽燧。

宾馆公馆和烽燧烟墩都是古代邮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古代福州的宾馆公馆

(一) 宾馆公馆的设置和管理

自唐开元十三年(725)福州定名起,朝廷先后在福州设置都督府、经略使、都防御使、节度使、观察使、威武军、福建路、福州府等行政机构,以督领福建诸州。福州始终是全闽行政中心和主政官员驻节地。福州对外交往,以及与朝廷上下联系愈加频繁和密切,宾馆公馆的设置以及接待服务就愈益显得重要。

作为邮驿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对邮驿管理订立了许多规定,其中不少涉及对宾馆公馆的管理。唐代,在节度使、观察使之下设判官、巡官或兵曹、司兵参军管理驿、馆。地方由县令兼管和监督邮驿。元代设置站官、司吏、祇应、头目、攒典等官员管理驿、馆,负责管理宾馆公馆的钱粮、米面,柴薪等项应支。又规定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军政)长官兼管驿、馆。还对过往驿站和宾馆公馆的使臣及随从人员的伙食标准做出明确规定。至元二十一年(1284),“定增使臣分例”规定:“正使宿顿支米一升,面一觔,羊肉一觔,酒一升,柴一束,油盐杂支增



甘肃博物馆邮驿画像砖



邮驿的雕塑

钞二分,通作三分;经过减半。从者每名支米一升,经过减半。”明代,对驿站、宾馆的管理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明会典》中,对驿、馆的管理,以及各级人员接待标准都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如“应付通例”对各级官员、军事人员、外交使臣、公侯驸马、备任官员、新科举人,以及随从、家属,包括伤病人员,职官病故护送回乡人员等,其接待伙食标准和乘坐车、马、船、轿的标准,甚至对途中因故死亡人员的处理都有明确规定。《明会典》还要求定期核准各驿、馆人员数、工银粮数额,稽查过往人员数,以及接待标准和接待费用的使用情况。天顺年间(1457-1464),奏准天下“驿递夫役每十年,磨勘重编丁粮”。宏治五年(1492),题准“各驿馆夫有司于丁粮相应人户内点,应当专为使客治造饭食。遇有支到廩结,随即炊爨供应,不许顶刻稽留。”嘉靖三十七年(1558)题准“使客廩给,如便道经过,非公干去处,每驿(馆)支三升,止宿亦支三升。如本等公干去处,每驿(馆)支三升,止宿则支五升。支口粮者,每驿(馆)一例,俱支一升五合”。万历十一年(1583)题准“通行各抚,按官查照节年条例,及勘合应付款目,着落各驿传道备查编定夫马、廩粮、银额,分发驿递各若干,应付过公差人员,是否俱照勘合原定之数”。清雍正四年(1726),驿传道并归盐运司,改为督粮道,兼管邮驿,后又改为粮驿道兼管邮驿。清朝中晚期,撤销驿丞,改由县丞兼管驿务。

驿丞是直接管理驿站、宾馆的低级官员，一般宾馆公馆设驿丞(馆长)1名，吏员1名，门子以及接待服务人员数名。规模较小、接待级别较低的宾馆、公馆配置的人员则更少。

(二) 福州的宾馆公馆

1. 福州城宾馆公馆

崇韬驿是福州最早的宾馆，在登庸门内西，今八一七北路西侧乌山路与道山路之间。唐昭宗天复四年至开平二年(904-908)，时任朝廷命官翁承赞赴闽册封闽王王审知时已有。临津馆，在南台大桥头附近，馆西南有合沙亭。梁开平(907-911)中，翁承赞册封闽王时，《南台路书事》诗有载；迎仙馆，南禅寺东。景祐年间(1034-1038)都官范亢所造，《治平图》有之，位于今台江南禅山东侧。使星馆，在海晏门内街北，旧为使星驿，绍兴年间(1131-1162)火灾复为馆，位于今东大路、五四路口。如归馆，在威武军门外西，位于今鼓屏路，自迎仙馆废，始为如归馆。迎恩馆，在迎仙门内南，为送迎御香及恩赐之所，淳熙元年(1174)丞相史浩始置，位于今西洪路。皇华馆，在还珠门外春风楼，淳熙十四年安抚贾选创建，侯官县丞欧阳光祖为记，位于今八一七北路西侧，省府路与杨桥路之间。



闽安镇巡检司衙门

元初，福州遭兵祸，城中驿、馆尽废毁。元朝在稳固政权后开始恢复和修建驿馆。东驿在府治西南，至元年间(1264-1294)以宋赵资政的府邸为驿馆。元贞二年(1296)，平章高兴移建，位于今通湖路驿里。西驿在府治西南，位于今光禄坊察院庄附近。成化十年(1474)改为福宁道。明代，三山驿，洪武年间(1368-1398)建于原东驿故址。柔远驿，初名怀远驿，位于水部门外河口进贡厂之南，成化八年(1472)建，专为琉球诸番国使臣馆寓之所。清代，皇华馆，位于今新民路与福三中附近。

2. 各邑宾馆公馆

闽县，峡江北岸公馆，位于今盖山阳岐，万历年间(1573-1620)建。大义公馆，位于今青口大义，万历年间建。闽县公馆，横山铺旁，位于今台江吉祥山，雍正年间(1723-1735)建。

侯官县，寅宾馆，在郡城西旧澄澜阁之址，正德年间(1506-1521)建。西湖公馆，位于今鼓楼西门外，为使客人不入城宿于此，万历四十年(1612)始创。

长乐县，长乐府馆，在县治西三十步，洪武年间(1368-1398)知县丘宗亮建，后移建于县治东观音寺西廊后。

福清县，寅宾馆，在县治西，谯楼之左偏，万历三十年知县邬元会建，匾曰“好我堂”，自为记，康熙九年(1670)，署篆谢钟和重修，匾曰“敬慎威仪”。渔溪公馆，在万安里。常思公馆，在方兴里。以上二馆，弘治年间(1488-1505)知县况璟建。宏路公馆，在善福里。蒜岭公馆，在光贤里。以上二馆，正德十六年(1521)，知县陈逅修。

连江县，寅宾馆，天启二年(1622)，知县宋应祥于仪门东设，康熙三年(1664)，改寅宾馆以祀关壮缪(关羽)。六年，署县王绍芝移祀关壮缪于震远楼，复置寅宾馆。

罗源县，寅宾馆，明初，在县治东三十步三皇庙旧址，洪武十一年(1378)，县丞庞益建，景泰七年(1456)河泊张用成重建。成化十年(1474)知县施弘建，“中建正厅，厅后为轩，左

右两边为卧房，外两间为庖厨，厅南建大门”。正德元年（1506），知县徐珪重修，嘉靖丁亥年（1527），移建寅宾馆于县治西五十步，义官丁滔建。万历七年，知县杨瑞重建寅宾馆，崇祯十四年（1641），知县章简鼎修。应德公馆，万历十三年，知县陈应凤拆河泊所木料，加建公馆。叠石公馆，万历二十八年，知县吴文英择地于叠石境创立公馆。

闽清县，闽清公馆，在县治南，洪武二十五年（1392）建，成化四年（1468），知县左辅重建。

永福县，永福县署嘉靖三十八年（1559）燬于倭。万历四年，知县陈克候重建县署，寅宾馆在其东。

古田县（时属福州），古田府馆，在紫极宫东，布政分司。嵩溪公馆，在县治西水口镇。嘉靖年建（1522-1566），知县吴立所建。石山公馆，在县治南五十里许，地名岩上，弘治六年（1493），知县屠容新建为三间两厢。秀峰公馆，在县治东五十里许。莪洋（豫阳）公馆，在县治西黄田镇，万历二十五年重修。竹园公馆，在县治西黄田镇。

二、古代福州的烽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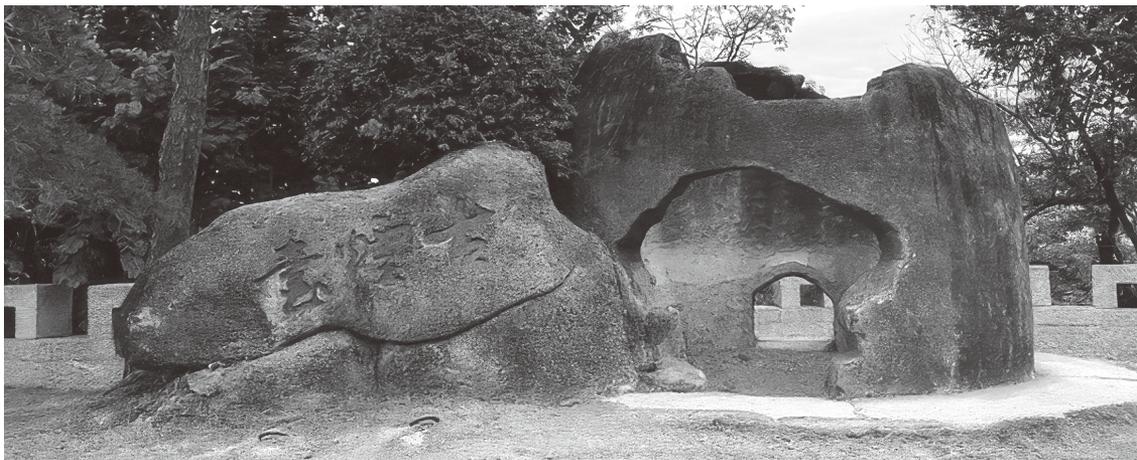
（一）烽燧的使用与布防

发现敌情时，首先要仔细观察，根据来敌多寡和军情缓急确定警讯级别，举烟为号，加以鸣

炮、挂旗、击鼓等不同方式和不同次数，表示警讯级别。如海面发现海盗敌船，放1炮，举烽1把；海盗敌船逼近海岸，放2炮，举烽2把；海盗登陆，放3炮，举烽3把。清代初中期，烽燧更趋完善，除举烟、放炮外，还加以挂席（旗）。《清史稿·兵志》载：“寇至100人者，挂1席（旗），鸣1炮；至300人者，挂2席（旗），鸣2炮；至500人者挂3席（旗），鸣3炮；至千人者，挂5席（旗），鸣5炮；至万人者，挂7席（旗），连炮传递。”

福州烽燧布防最早见于唐代。闽江口闽安镇是军事要地。唐中和四年（884），福建观察使陈岩在闽安镇田螺湾北面山上建烽火营寨，即闽安高山寨。高山寨地势险要。寨城墙为花岗石结构，高10米，宽3米，面积6-7亩，城墙四周有拱门，山顶建有瞭望台，烽火台。自唐代始，闽江口沿岸险要高处建有不少墩台营房和烽燧，既能驻军，又能监视敌情，一旦有警立即举烟为号，进入战斗状态。宋代，闽安镇设巡检司。元祐二年（1087），为固守闽江口要塞，依山修建寨堡。在蟛蜞洋建登高寨，石龙山建石龙台寨，乌猪岭建乌猪寨，白眉山建鸚哥寨，鼓岭建牛头寨，各寨城占地约十亩左右，并在主要山头设置烟墩瞭望，遇警则举烽火为号，形成犄角，环卫闽安。

自元代始，倭寇流劫于沿海地区。明代，仅嘉靖十九年（1540）至四十二年（1563）二十多年间，倭寇屡次进犯福州及各邑，攻占城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抵御倭寇成为最为紧迫的任



福州烟台山古烟墩遗址

务。军方在福州沿海设立卫、所、水师营、巡检司、长福军等军事机构，由南往北，自兴化南日（岛）、福清、平潭、长乐、闽县、连江、罗源，至福鼎沙埕烽火门沿海一线部署防御设施，包括设立烽燧瞭望。其间，名将戚继光率领精兵来闽组织抗击倭寇。

（二）福州的烽燧设置

1. 兴化南日岛系孤岛，于山顶上设烟墩。该岛属莆田兴化，与福清海面相隔，为兴化、福州共同防御范围。

2. 福清县，明代设烟墩27处：前村墩、蟹屿墩，以上二墩在灵得里；蒲头墩、西岭墩，以上二墩在临江里；礮山墩，在万安里；松下墩、峰前墩，以上二墩在永宾里；峰头墩、双屿墩，以上二墩在光贤里；洪坑墩，在安秀里；陈塘墩、石马墩，以上二墩在江阴里；墙头墩，在化南里；白鹤墩、大琅墩、垄下墩，以上三墩在平北里；汶留墩、前晏墩、茶林墩、白沙墩、桃屿墩、塔山墩、宴积墩、马头墩、仙岩墩、后瀛墩、大邱墩，以上各墩在平南里。清代，烟墩设置如下：芦港，西面为烽火山，设警燔烽燧；鼓屿门汛，海中孤岛，山上设烟墩；峰头、上迳二汛，临海要冲，山峰有寨，康熙元年（1662）置，西南至江口桥，与兴化界，东至东澳山，设烟墩。

3. 海坛（平潭县，时属福清），大练山，在斗门区，洪武初（1368）设烟墩；小练山，洪武初设烟墩；溪口汛，临海澳口，东北系外洋，君山顶上设烟墩；东庠岛，孤岛，设烟墩；观音澳，连海坛山，山顶设烟墩；夯尾汛，在夯尾区，大方山顶有南北二寨（牛头寨），设烟墩；娘宫汛，山顶设烟墩；烽火台，在坑北区小庠山；大寨，在坑北区东庠岛大寨山上，有烽火台，明代为增援平潭水军而设，今遗址犹存；烟堆山烟墩，有两处，一在朴秀区招康垄村西；一在大墩区。皆垒石而成，周数十丈；岭顶烟墩，在高平区烟堆岭，毗连三座；五皇山烟墩，在庄上区玉皇山，毗连三座；烟墩山烟墩，在草屿岛，毗连三座；凤髻山烟墩，在斗门区大练岛，今遗址犹存。

4. 长乐县，洪武二十一年（1388），设烟墩22

处：石门村墩，在八都；山亭山墩，在十都；湖头墩，在十一都；甲峰墩、塔山墩，在十二都；旒山墩、大屿墩，在十四都；蕉山墩、牛山墩，在十五都；圣娘山墩，在十七都；壶井山墩，在十八都；流水墩、江田墩、石浓墩，在十九都；大祉墩、小祉墩，在二十都；浪头山墩，在二十三都；魁洞墩、棋山墩、斗湖墩，在二十四都；泽里墩，在方安里；文石墩，在大宏里。清代，在明代设置的基础上加设寨四、塘21、汛一，每寨、塘、汛各设烟墩三座，共96座。其中：文石、筹港、泽里、厚福等防御要冲设烟墩；梅花所，设烟墩；东澳、西澳、南澳、北澳，在十五都，均设烟墩；壶井，在十八都，设烟墩；大祉寨、小祉寨、下寨，在二十都，设烟墩。

5. 闽县，明代，设烟墩共11处：凤埔、长崎、琅岐（崎）、海屿、象洋、拱屿、东崎、猴屿、旺崎、盐仓、鼓山。清代，闽安崇新寨、登高寨、象洋寨、石龙台寨，皆康熙元年（1662）建造，设烟墩。南竿塘、洋屿、琅岐门，设烟墩。

6. 连江县，明代，设烟墩59处，埠寨连之北茭。清代，设烟墩如下：东岱烟墩台、南峰岭台，在二十八都；透岭尖台、真如岭台，在保安里；高洋岭台，在建兴里。以上俱顺治十八年（1661）调移设。马门岭台、定安台、长沙台、大澳台，在安庆里。小澳山嘴台、东岱台，在永贵里大塗，原三沙镇旧地。松坞台、腰岭台，在二十九都；白鹤台、纲边台，在集政上里；驴头台，在安德里；马鼻台，在保安里；岭口台、浮曦台、东山台，在建兴里北，与罗源交界；麻坂台，在集政里。以上俱康熙九年（1670）展界设。定海要冲，康熙、雍正年间设烟墩；北竿塘，设烟墩。

另外：罗湖、西洋山、芙蓉山、大金汛四要冲，属霞浦界，有的系外洋孤岛，属福州、福宁共同防御范围，设烟墩。

7. 罗源县，中房镇满盾村界首和白塔乡白塔村后山均有烽火台，设置年代已无考，遗址尚存。

古代福州的宾馆公馆和烽燧，都在福州邮驿历史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国际视阈下的林译小说

——纪念林纾逝世一百周年

◇邹自振

一、林纾何以走上翻译之路

如果说，严复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者，那么，林纾则是近代以其翻译成果之数量及译文之魅力而享誉文坛者。林纾翻译之独特性堪称空前绝后：他自己不谙外语，全凭他人口述而笔录之，这在世界翻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晚年称蠡翁、践卓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自幼好学，31岁中举人，后屡试落第，遂绝意仕途。1906年起受聘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任教，始为预科、师范馆，后转大学经文科。林纾一生未进官场，以教书、著书、译书及作诗、画度日，主要成就在翻译小说，也同时从事小说、戏剧、诗文创作，除翻译小说一百多部外，尚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

1897年夏，林纾的结发之妻刘琼枝不幸病逝，对此，林纾颇为伤感，终日郁郁寡欢。

此时，刚从法国回来，在马江船政任职的好友王寿昌邀请林纾翻译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这是林纾以独特方式走上翻译道路之始，也是中国系



统地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始。

1899年2月，《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福州印行。这是林氏家刻本，书末有“福州吴玉田镌字”一行。林纾署名冷红生，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约三四个月之后，索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此即汪穰卿刻本，亦即素隐书屋本。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大江南北，人们争相阅读，好评如潮，称之为外国的《红楼梦》。林纾同邑的著名翻译家严复写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这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译书的

热情，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了自己一生的译书生涯。

二、林译小说概观

林纾的翻译小说数量之多、速度之快，都是惊人的，并且几乎囊括了当时欧美国家主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合作者也多达二十人左右，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难已磨灭的华章。据不完全统计，与林纾合作翻译外国小说的人士，大致有以下诸人：

英文翻译：

魏易，合译：《黑奴吁天录》《孝女耐尔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姻缘》《不如归》等，其中日本小说《不如归》从英文翻译而来。

陈家麟，合译：《现身说法》《恨缕情丝》《魔侠传》《哀吹录》等。

曾宗巩，合译：《海外轩渠录》《战血余腥记》《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逊漂流记》《新天方夜谭》等

毛文钟，合译：《埃及异闻录》《沙利沙女王小记》《情天补恨录》《以德报怨》等

力树麓，合译：《罗刹雌风》《情窝》等

胡朝梁，合译：《云破月来缘》

陈器，合译：《痴郎幻影》

林凯，合译：《情海疑波》。

法文翻译：

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

李世中，合译：《玉楼花劫》《爱国二童子传》等

王庆通，合译：《孝友镜》《金台春梦录》《蟹莲郡主传》等

王庆骥，合译：《离恨天》《鱼雁抉微》等

林骥，合译：《兴登堡成败鉴》

廖琇崑，合译：《义黑》等。

英、法文翻译：

严璩、严潜，合译：《伊索寓言》等。

三、林译小说之影响

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风

貌，既有中国传统古文简洁、隽永的风韵，又有西方文学的灵思美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范。清末民初的林译小说无疑成为中国小说新旧嬗变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媒介，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风流人物，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

鲁迅早年十分热爱林译小说，几乎每出版一部便购买一部，看过后还要专门装订起来，他认为林译的文章确实很好，他也已经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郭沫若最初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他在所写《少年时代》中记到：“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哈葛德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

周作人曾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模仿他的译文。”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林纾开创了译介欧美小说之新风气。促使当时的文人、作家可探首域外，汲取异域之营养；林纾数十年的辛勤劳作，为中国近代文坛奉献了巨大财富，“林译说部丛书”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几代人。可以说，中国的文学界是自林纾开始才逐渐具有了开放性的世界眼光的。胡适评价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康有为将他与严复相提并论：“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同邑郑振铎认为林纾提高了中国人对世界和西方文学的认识与了解，打破了中国人历来看不起小说的旧传统，开了翻译世界文学风气之先。

四、饱含拳拳爱国之心而译书

必须指出的是，林纾从事文学翻译的宗旨，除了早期个人排遣寂寞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有关。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孝女耐尔传序》）的命题，建构了新的小说审美规范，文学的主人公由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转为命运卑微的小

人物，昭示了“平民意识”的崛起与“人”的时代觉醒。

林纾在《黑奴吁天录跋》中强调：

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即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

可见，林纾翻译这部小说的动机出自“爱国保种”的热忱，他想通过译书振作同胞的志气，让他们认识到变法图强、勤求新学的重要性。斯托夫人这部小说是抨击美国黑奴制的优秀作品，它深刻地揭露了种族压迫的罪恶，鞭挞了奴隶制度的丑恶。黑奴汤姆的悲惨遭遇，令林纾感叹不已，他认为黄种人在美国受到的虐待比黑人还要严重。他与魏易立刻着手翻译。两人的翻译热情缘自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1901年前后，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代表大资本财团的执政党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煽动排华高潮，许多华工遭到种族主义分子的抢掠毒打乃至杀害，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根本无力与美国进行交涉。而刚刚经历八国联军入侵的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亡国灭种之祸近在眼前。因此，两人都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向国人介绍这部揭示美国种族压迫罪恶的长篇小说，唤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以实际行动挽救民族危亡。小说的出版发行，对反美华工禁约斗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自《黑奴吁天录》开始，林纾已自觉地把文学翻译与反帝爱国斗争联系在一起，融入自己强烈的爱国情感。

译本《黑奴吁天录》的艺术魅力也是值得称道的。林纾的同乡、作家冰心在九十高龄写的《我和外国文学》一文提到：“……以后我进了中学和大学，上了英文课，能够自己阅读小说原文了，我却觉得《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原名不如林译《黑奴吁天录》……那么生动有趣。”

从多部林译小说看，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是饱含着拳拳爱国之心的，他试图以所译介的域外

小说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并以此唤醒国人与青年，以所译小说之所述作为借鉴，促励人们为祖国强大、同胞警醒而努力奋斗。

1909年7月，林纾为早一年翻译的日本小说《不如归》作序，他在最后一段写道：

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攄其胸臆，非敢妄肆喙吠，尚祈鉴我血诚！

《不如归》是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所著，也是林纾翻译的唯一一部日本小说。作品写孤苦的女孩浪子，由继母抚养长大，嫁与川岛男爵家的武男为妻，婚后夫妇感情和睦。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丈夫远航，她不幸得了肺病，被婆母逼迫离婚，最后含恨而死。林纾写序，主要是因为小说第十八章《鸭绿之战》，侧面反映了中日海战的一些实际情况，故他引用书中记述的事实，以说明中国海军在甲午战役中曾经英勇作战的情形，批驳一些不实之词。

林纾此序，主要不是介绍和评价小说，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报国”“胸臆”。林纾强调，不要因一时战败而自馁，而应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进行改革，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这种看法不同于失败主义，对于鼓舞斗志具有积极作用。林纾重视培育海军人才，把培养人才置于制造船炮之上，其见解高于当时的洋务派。这篇序文使我们看到一个“报国无日”的爱国者的“血诚”，从中受到强烈的感染。

五、桐城文派的译书风格

林纾翻译的域外小说，还引进了文学风格流派的现代概念。林纾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敏锐眼光，他对于作家风格往往有一种灵犀暗通的默契，他对西方作家创作风格的阐发给人以创造性的启示：如司各德的文心奇幻、大小仲马的冶艳秾丽、华盛顿·欧文的诗意的氛围与哲理深味等。

文学史家郑振铎评价林译小说：“译笔清腴圆润，有如宋人小词。”以宋词婉约派风格比拟桐城派大家林纾的文笔风格，应该说是恰如其分

了。邱炜萋对《茶花女遗事》的评价则更为具体、形象、生动：

中国近有译者，署名冷红生笔，以华文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衰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年来忽获《茶花女遗事》，如饥得食，读之数反，泪莹然凝栏干。每于高楼独立，昂首回顾，觉情世界铸出情人，而天地无情，偏令好儿女以有情志，独令遗此情根，引起普天下各种情种，不知情生文耶，文生情耶？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林纾在他的翻译小说中，或多或少地亮明了他的小说观。也在他的序跋中，对中西小说在思想、艺术上作了具体、细微的比照，给人以深刻、鲜明的印象。如他对中国说部的“登峰造极”之作《石头记》（《红楼梦》）与英国狄更斯的《孝女耐尔传》（《老古玩店》）作了艺术表现手法及特色的比较：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姬，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究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狄更斯）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佞驱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遽曲，宁可及耶？

林纾翻译小说之所以获得广泛好评，关键在于优美的译文风格，深深地吸引了各类读者，无论是青少年，还是硕儒饱学之士，这与林纾本人是桐城文派古文大家，有深厚的古文修养根柢密不可分。胡适因此赞誉道：

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六、现代爱情意识的觉醒

必须指出的是，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还诱发了现代爱情意识的觉醒。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等欧洲小说，引进伴随着人格独立、个性解放而兴起的现代爱情意识，对中国几千年铸就的道德心防产生了轰击作用。近则流风被于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远则下开“五四”时代那些浪漫自由的爱情咏叹调小说。

在林译小说中，对青年人影响最大，对封建礼教冲击最有力的要数英国哈葛德的《迦茵小传》。《迦茵小传》在众多的英国小说中并不出名，但经林纾翻译后却大为畅销。这部爱情悲剧作品描写平民女子迦茵与贵族子弟亨利邂逅，两人一见钟情。迦茵鄙视追求她的小财主洛克，也不屈从姨妈的各种压力，勇敢地与亨利相爱。最后，她为了成全亨利与爱玛的婚事，毅然牺牲自己的爱情乃至生命。翻译此书时，林纾已经53岁了，颇有人生逢秋之感，此时的他，一改平时“木强多怒”的性格，常为书中的儿女之情所打动。迦茵这个英国乡村的女孩子，获得他无限的同情与爱怜，并在他的译文中，付出了自己的强烈共鸣。

《迦茵小传》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卷首附有夏曾佑《积雨卧病读琴南〈迦茵小传〉》有感：

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前说古今。
薄病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洲阴。
旁行幸有伽姿笔，发喜难窥大梵心。
会得言情头已白，捻髭想见独沉吟。

林纾以娴熟的技巧，精彩地再现小说人物的外貌、动作和语言，表现细致的心理活动。钱鍾书说他重读林译作品后，“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的多。”

陈源在《西滢闲话》中甚至说，中国的革命是由两部小说造成的，一部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另一部就是《迦茵小传》。近代中国人追求

个性解放，渴望恋爱自由、要求婚姻自主，向往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浪漫型男女关系。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文学史并无什么地位的《迦茵小传》，却能在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

《巴黎茶花女遗事》叙述的是一个凄美哀婉的爱情悲剧。小仲马先写成小说，后又改为同名剧本。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外表与内心都像白茶花那样美丽纯洁的少女马克格尼尔(玛格丽特)到巴黎谋生，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后结识富家子弟亚猛(阿尔芒)，两人深深相爱，遂移居市郊，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阿尔芒的父亲百般阻挠他们的爱情，认为他们的结合有辱家风，并会断送儿子的前程。他暗中迫使玛格丽特与阿尔芒断绝关系，深爱阿尔芒的玛格丽特为了阿尔芒的前途，狠心与其不相往来。蒙在鼓里的阿尔芒不明内情，以为玛格丽特变心；玛格丽特有苦难言，一病不起，最终摧残致死。

林纾深为故事中玛格丽特的悲剧结局所打动，在翻译中更增添了对亡妻刘琼姿的不禁思念，他不时沉浸在不堪回首的往事中，而合作者王寿昌也是性情中人，每遇小说中缠绵悱恻的情

节，两人常常相对流泪，以致掷笔痛哭。林纾为此曾写道：“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丈夫。而士大夫中必若龙逢、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玛格丽特)竞。”

七、客观正确评价林译小说

在林纾所有的译作中，数《巴黎茶花女遗事》影响最大，其次是《黑奴吁天录》，两部翻译小说的出版先后引起轰动效应，中国读者由此了解西方人的爱情和黑种人在非洲、美洲的遭遇，中国的留日学生据此两书将小说改编成话剧，在东京的舞台的演出，从而形成了校园戏剧与中国话剧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早期历史。自然，林纾的翻译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林纾毕竟不懂外语，他所作的翻译工作，是先让别人将外语译成中文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用中国传统的古文形式传达原作，这种翻译，即使再好，也难以保证忠实于原作。

因林译与今译之书名不一，此处特列部分世界著名小说篇名以作对照：

狄更斯《老古玩店》，林译：《孝女耐尔传》

《大卫·科波菲尔》，林译：《块肉余生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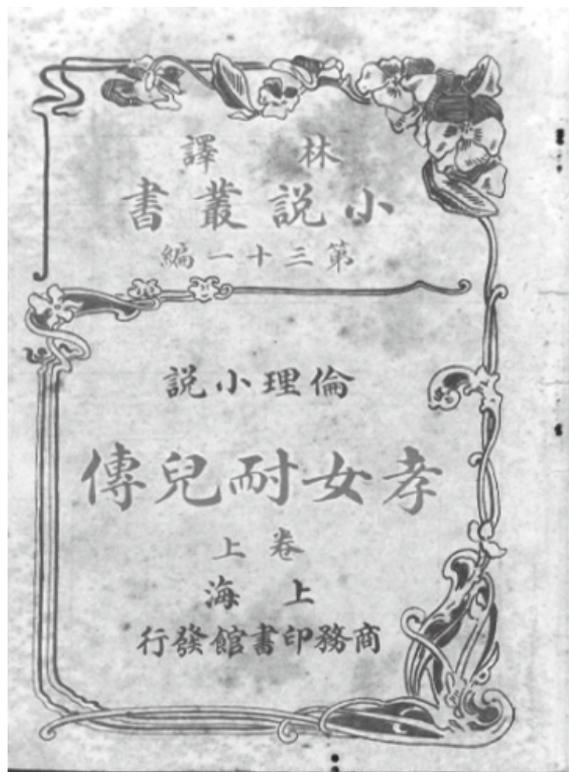
司各德《艾凡赫》，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雨果《九三年》，林译：《双雄义死录》

易卜生《群鬼》，林译《梅孽》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林译：《魔侠传》

以一百年前的时代而言，林纾的翻译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所以那么大，关键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尚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林纾的译作犹如一股冲决堤坝的洪水，一下子汹涌而入，顿时打开了中国文人与读者的眼光，霎时间纠正了清末民初的人们对小说、文学的传统看法，刮起了文坛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之风，影响了整整一代文人与读者对欧美文学的兴味。从这些方面来说，林纾是古往今来翻译文学的第一人。在纪念林纾逝世100周年的今天，尤其需要我们对林纾其人及其成就作出正确客观的评价。



浅说林廷玉题刻

◇陈常飞

草树迷蒙谢豹啼，江山依旧世人非。
野翁识破尘凡事，一度来时一醉归。
林廷玉书

乌山林廷玉诗刻在霹雳岩，西向。摩崖高133厘米，宽75米，楷书，纵4行，字径13厘米。在诗句起承转合中，记录了林廷玉一段情感。在诗中写乌山之景，亦寄寓心中之情：那一年林廷玉再次登上乌山，所见草木凄迷，时闻周遭杜鹃鸣啼。以眼见之景物起兴，感慨人事变幻莫测。但他此时可能也见惯了、看透了世间之事，故能豁达乐观，做到乐天安命。“一度来时一醉归”，即是从容、自适的另一种表达。

明王应山《闽都记·郡城西南隅·侯官县》(卷10)引此诗，名作《霹雳岩》。此方摩崖文字结构整齐，三十二个字排列得当。虽说从横向上看每4字多不在水平线上，但整幅作品还是给人整饬之感。这不得不再次肯定古人对书法的专注——他们不单留意笔法，一笔一画毫不苟且，且分行布白亦十分讲究。朱和羹《临池心解》云：“分行布白，为入手要诀。元人所谓《黄庭》有六分九宫，《曹娥》有四分九宫是也。否则，疏处安顿，尚易舒展；密处安顿，每形局促。”

楷书是人们学习书法的“标准”字体之一，得到很多人青睐。林廷玉善诗词，亦擅书，徐氏《笔精》载：“公善擘窠书，名山胜处多存手迹。”另据有关资料记载：福州府学贡生许天祐等庠友

于九仙山“唱韵漫兴”，后来吟咏形成诗作，亦林廷玉书丹。(详见《竹间十日话》卷3)这段诗刻尚存，“在九仙观西南兰花圃内，南向。摩崖高100厘米，宽240厘米。楷书，纵18行，字径9厘米。”(参见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于山摩崖石刻》)今石文部分残泐，但仍可根据书中记载与之印证。明王应山《闽都记》(卷4)录此诗，名作《登九仙山》，诗云：

马踏香尘晓气清，间寻羽客共黄精。
湖边细柳迎春媚，山半晴云阁树轻。
村酿新莳眠草醉，野歌无调傍花行。
留连且尽今宵兴，漫道长庚又启明。

这块摩崖上镌刻两首诗，另一首甚难辨识，《竹间十日话》中亦录此诗，但并不完整。今据摩崖石刻内容，谨录于下：

□鹤飞飞薄太清，仙童□□采黄精。
沿阶新草□□嫩，落地闲花片片□。
□□□头呼我醉，□□□上学人行。
水晶盘□琅玕起，却笑痴翁喜□□。

二诗同为一韵部，属“下平八庚”。这有理由相信其中一诗并非林廷玉所作。而落款“南涧翁侯官林廷玉书”，则表明其书法得到时人肯定，遂由其书写此作。时过境迁，如今不知林廷玉“原作”如何，但石刻总体面貌浑厚雄强，比拓片、墨迹更有质感。

林廷玉喜吟诗，其诗隽永，耐人寻味，而几

段诗前小序也简净地记录了一些历史信息，点染了几笔古人交游画卷：

一、正德己卯（1519）正月十有七日饮平远台，许天祐、李祐、谢蕢三庠友，唱韵漫兴；二、游九仙观酒半，庠友林■、谢蕢，乡进士许绎出韵偶题，正德己卯（1519）正月十有九日也。三、余致仕六载矣，杜门以诗书自娱。正德己卯春偶出一游佳地，因造万岁寺看塔，聊以寄兴。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以后“知人论世”的思维也形成研究人物之习惯与传统。

林廷玉的资料散见数种旧志、杂记中。今据所查找史料梳理如下：

林廷玉（一说为1455—1532），字粹夫，侯官人，号南涧翁、烟霞病叟，明成化十九年（1483）领陕西乡试解元，翌年中进士。历官都给事中、海州判官、茶陵知州、江西佥事、广东提学副使、保定巡抚、南京都察院事等职。后以执法严正，得罪权臣贵戚而辞职归里。居里十余年，屡荐不起。其性格刚果敏达，雅以文章自许，为人风节凛然，（郝玉麟《广东通志》）系明代“福州四林”之一。《竹间续话》（卷1）云：“北林为林廷玉，家在水流湾、北林坊是也。”著有《南涧文录》（7卷）等书（一作《南涧先生文集》12卷，见《千顷堂书目》）。

他在官场上发展并不顺意，一些政绩很容易被后世遗忘。但与他有关的教育事迹，却传留至今。

林廷玉当年以给事中谪知茶陵州。他认为：“民风不淳、士习不正、道之不明故也。”于是牵头创建洙江书院，“日深衣幅巾，集诸生讲习忘其身之为吏也。”（康熙《湖广通志》）他在书院为学生讲解儒家经典，风雨无阻，“讲到兴致时，常



掀髯而长歌”。（阳卫国等著《历代茶陵书院·洙江书院》）洙江书院位于湖南省茶陵县，始建明弘治十七年（1504），是茶陵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官办书院。历代书院山长皆为有名望之人，如清末状元萧锦忠等。他当年曾作《洙江书院铭》，以申说“主敬铭”“行恕铭”“修德铭”“凝道铭”等内容。（康熙《湖广通志》）其与书院事迹又见郑方坤《全闽诗话》收录：“周濂溪为广南提刑，广人因于西湖创濂溪书院前种白莲，扁曰爱莲。其前为提学厅事，后池渐淤塞。林廷玉为广督学，令人佃地植禾以取税焉。有无名子题诗壁上云：当日红蕖蘸碧波，薰风时节一来过，于今景色非前度，谁道先生又爱禾。林公见之大笑，亟命植莲建亭云。（《小草斋诗话》）”

另有史料载，福州九仙山南曾有崇报祠，明嘉靖间建。祠中祭祀都御史林廷玉、副使高文达，春秋二祀。因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福州士兵因索饷哗变，“廷玉、文达有定乱功，里人请建祠”。（乾隆《福州府志》卷14）方志及一些文集的作者对记载人物生平一事，在人物资料编选方面皆有所取裁，他们选择历史人物最典型的事迹，力求在“惜墨如金”的笔法中记录其事迹，以反映其生平概况。所以从这两则资料中可以窥见林廷玉是理学践行者，其一生为官也以宋儒哲学作为从政指南，并躬身实践。乌山上“冰壶”石刻，似乎也能证明这一点。

“冰壶”榜书石刻在望潮峰南坡，摩崖高132厘米，宽约260厘米。楷书，横纵各一行，正文高121厘米，宽99.5厘米；旁款字高10厘米，宽7.5厘米。（摩崖石刻数据参考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修订本）唐姚崇《冰壶诫序》云：“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示不忘清也……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全唐文》）林廷玉为官常思民生，以“冰壶”自鉴、自警，这两字也足以总结他人格精神及为官廉介品质，正如冰壶之清。这方摩崖石刻是艺术，是历史，也是林廷玉一生写照。

摩崖石刻为历史提供了一种佐证，也给名山增添了文化意蕴。

寻盟访鼓山 风物宛如昨

——李纲的鼓山诗作和鼓山情怀

◇危砖黄

史书写李纲，最突出的事情有二，一是北宋末年，东京汴梁第一次被围时，李纲主导守城，并且守住了；二是南宋初，李纲做过75天的宰相。

宋高宗称帝一个月，就任命李纲为相。李纲极力主张定都北方，在高宗无意北返的情况下，他着手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进行整顿，包括机构设置、国赋税收、募兵买马、训练军队等等，使新的赵宋王朝初现生机。但是，高宗只求自保，终究舍弃了李纲。从建炎元年（1127）六月初旬到八月十八日，李纲担任宰相仅75天就因投降派的排挤而被罢免。朱熹在为李纲奏议作序时说：“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朱熹《丞相李公奏议后序》，见《李纲全集》）

罢相之后，李纲先后居于鄂州、澧州、雷州、饶州等地。最后定居福州，曾两次被起用，一次出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一次出任江南西路安抚使。

建炎四年（1130）七月，李纲自海上“蒙恩”北归。八月，李纲携家人自邵武，经泰宁、沙县来福州，这已是李纲罢相之后三年的事了。

绍兴元年（1131）三月中旬，李纲一家经沙县由水路抵达福州。

到福州后，李纲先是寄居于安国寺，六月，移居南台岛天宁山（今烟台山）天宁寺。他在《迁居南台天宁寺》诗中感叹道：“壮年几何时？倏忽成衰翁。”同时安慰自己：“风月应更好，清欢永相同。”

这一年，李纲常与好友王仲薏邀约唱和。王仲薏，字丰甫，华阳人，北宋宰相王珪次子。李纲曾邀王仲薏等人同登鼓山，鼓山石门至今留有他们的题名石刻：

昭武李纲伯纪邀华阳王仲薏丰甫、建溪吴岩夫民瞻、临川陈安节巽达、淮海周灵运元仲游鼓山灵源洞。丰甫之子升叔明，伯纪之弟经叔易、纶季言，甥张津、子知同来。绍兴元年五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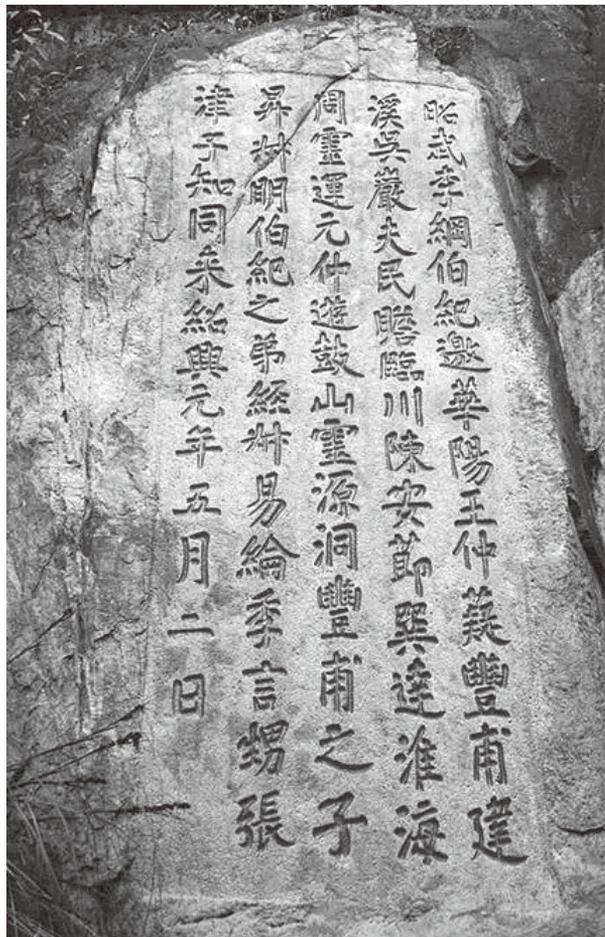
昭武，即今邵武。出现在石刻中的人物，除李纲和王仲薏之外，还有八人：吴岩夫，字民瞻，建炎间知南剑州。陈安节，字巽达，淳熙间知南剑州；周灵运，字元仲，淮海人；王升，字叔明，仲薏之子；李经、李纶皆李纲之弟，李经，字叔易，宣和六年进士，官漳州教授，绍兴八年除校书郎，绍兴九年致仕，李纶，字季言，官漳州教

授、右奉议郎、洪州通判等，绍兴二十六年作《李忠定行状》一卷，记录了李纲的主要事迹；张津，李纲外甥；李知，李纲之子。

清《闽中金石记》载：“绍兴元年，韩世忠既平范汝为，欲杀建州人，至福州见李纲，劝勿杀。则题名当是年矣。”

李纲在《游鼓山灵源洞次周元仲韵》诗中写道：

碧海吸长江，清波逾练净。
我为鼓山游，潮落初放艇。
连峰翠崔嵬，倒影涵玉镜。
舍舟访招提，木末缭危磴。
凌云开宝阁，震谷韵幽磬。
乃知大丛林，托栖必深复。
灵源更瑰奇，岩壑相隐映。
森罗尽尤物，无乃太兼并。



鼓山灵源洞李纲题刻

伟哉造化力，至巧于此罄。
烟云互卷舒，变态初不定。
岂惟冠一方，实最东南胜。
周行洞泐中，泉石若奔竞。
飘萧毛发清，涤濯肺腑莹。
当年喝水人，端恐溷观听。
是心如虚空，动寂岂妨并。
兵戈正联绵，幽讨亦有幸。
相携得佳侣，散策谢轩乘。
偷安朝夕间，未可笑赵孟。
淹留遂忘归，怅望云海暝。
不负惠询期，更起沧洲兴。

诗题中的周元仲，就是石门题刻中的“淮海周灵运元仲”。诗中有“我为鼓山游，潮落初放艇”“舍舟访招提，木末缭危磴”之句，说明那次游鼓山之前，他们是乘船渡闽江而去的。当时李纲住在南台岛，一行十人前往鼓山，乘船是个不错的选择。李纲在诗中描写了灵源洞的“瑰奇”，称赞鼓山“岂惟冠一方，实最东南胜”。他借登鼓山之机，排遣退居的郁闷，一方面感叹“偷安朝夕间”的无奈，一方面抒发“淹留遂忘归，怅望云海暝”的惆怅。

李纲对鼓山似乎特别钟爱，多次登鼓山、游鼓山，并与友人唱和、抒怀。

冬季的一天，趁着鼓山有新阁落成，李纲登鼓山观礼、游览，而赋《冬日来观鼓山新阁，偶成古风三十韵》一首。诗云：

寻盟访鼓山，风物宛如昨。
山中有开士，弹指成杰阁。
应真飞锡来，一一得所托。
翬飞鸾栋甍，绚烂丽丹雘。
峨峨大顶峰，孤影入檐角。
乃知象教力，建立必卓犖。
却为灵源游，云木互参错。
岩深松桂香，石古苔藓剥。
冬温日清美，景短气萧索。
天然资野逸，安用遮翠幕。
快哉緬登临，及此小摇落。
乘高望瀛海，南极露垠垓。

蓬壶在跬步，谁谓仙山邈？
 苍茫杳霭中，万象恣磅礴。
 回头睇中原，郡国半沙漠。
 犬羊污宫殿，蛇豕穴城郭。
 畴能挽天河，一洗氛祲恶。
 我生多艰虞，久矣衰病作。
 君恩听言归，养拙侣猿鹤。
 忽忽岁道尽，平子殊不乐。
 幸同二三子，杖履遍丘壑。
 跻攀力尚强，谈笑心无怍。
 野鹿饱丰甘，冥鸿在寥廓。
 翻思轩冕间，何异遭束縛。
 斯游信清绝，妙赏寄寂寞。
 晚来凄以风，远色秀增岳。
 泠泠钟磬声，随月度林薄。
 愬焉感时心，未免如陨箨。
 倘能驾云螭，岂复忧世瘼。
 会当期若士，相与踞龟壳。

诗中描写了鼓山的奇秀之景，也诉说了诗人自己的心情。从“寻盟访鼓山，风物宛如昨”，到“回头睇中原，郡国半沙漠”，身在鼓山，最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北方故国蒙尘，他总是寄望于“畴能挽天河，一洗氛祲恶”。

诗中“弹指成杰阁”说的是鼓山寺中新阁落成。李纲曾作《福州鼓山斋僧疏》，文中饱含对建造新阁的寺僧的称赞和怀念：“右伏以名蓝清静，雄踞海山；宝阁巍峨，肇新栋宇。五百大士于焉而栖息，八部龙神亦为之欣欢。大顶峰前，觉林峦之秀发；灵源洞里，增泉石之幽奇。成此胜缘，实为盛事。大比丘有神通之妙力，病居士以庆赞而特来……”

对于鼓山新阁的建成，李纲又在《游鼓山拙句奉呈珪老并简诸公》诗中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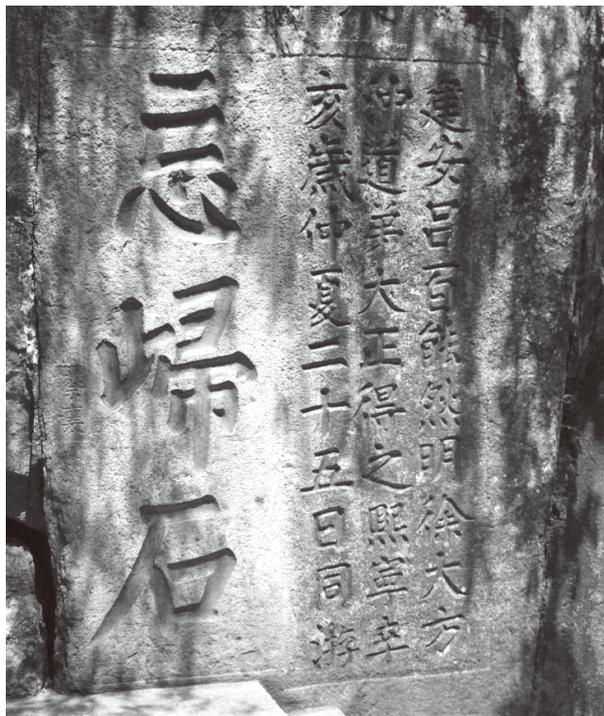
嘉客同游海上宫，高僧问道得从容。

乍惊暑退灵源洞，最爱庭开大顶峰。

（自注：峰旧为阁所遮，师徒阁而峰见，气象雄伟）

杰阁初成切星斗，飞云时到绕杉松。

我来未尽登临兴，更待秋高灏气浓。



鼓山忘归石

诗题中的“珪老”，是李纲的僧友。这次和李纲同登鼓山的，还有他的老部下、同样早已罢职退居的张元幹（守东京时担任李纲行营属官），张元幹在《和李丞相游鼓山》诗中写道：

海山幻出化入宫，楼观新崇万指容（亦作“万里容”）。

云雾入檐银色界，藤萝昏雨妙高峰。

放怀久已参黄檗，雅志无疑伴赤松。

欲去更闻狮子吼，忘归桥下兴犹浓。

一句“忘归桥下兴犹浓”，说的是他们在鼓山灵源洞蔡襄题刻“忘归石”下游览的兴致。“放怀久已参黄檗”，则是表示功名之心久已淡泊，寄意于参禅向佛。“黄檗”，福清有黄檗寺，这里代指佛家。

绍兴二年（1132），李纲50岁了。这年二月，李纲获除观文殿大学士，出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湖东路兵马钤辖，后又兼湖南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李纲力辞，朝廷派内侍前来抚问，李纲推辞不掉，便于五月起行，离开福州，赴任湖南。同时，朝廷另有旨，将孟庾、韩世忠下拨统制辛企宗、郝晷两军，及在湖南的岳

飞、韩京、吴锡、吴全等军，听受李纲节制。到湖南后，李纲很快着手平定地方群盗，并弹压曹成七万之众出界（曹成部众终被岳飞击溃）。一旦湖南平定，李纲又遭弹劾，再被弃用，他便上疏请辞。

绍兴三年（1133年），朝廷批准了李纲的请辞报告，让他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于是，他由醴陵经江西、武夷回福州。

此番回到福州，李纲身体已大不如前。有一次，李纲的弟弟和友人登东山和鼓山，而李纲因病不能前往，只有作诗记之。

如《诸季招客游东山，置酒赋诗，以病不果往，次其韵》：

衰病年来百事阑，禅居环绕尽青山。

登高选胜从君乐，隐几忘言输我闲。

一枕清风消永日，三杯浊酒发酡颜。

雀罗可没从来事，东阁常关不是慳。

东山属鼓山支脉。“一枕清风消永日，三杯浊酒发酡颜。”苦闷随风而去，闲暇有酒则欢。

再如《诸季邀德久申伯同游鼓山灵源洞，仆以病不果往，赋诗见志》：

灵源韞秀异，杰出闽粤间。

神功谢镌凿，妙境森回环。

曲磴下窈窕，高岩上孱颜。

松萝互荫翳，正暑生清寒。

路转人寂寂，泉飞涧潺潺。

乘高望云海，天末波涛翻。

伟哉宇宙中，有此气象宽。

诸子雅好游，蜡屐履山樊。

佳客来自远，复共一日欢。

而我抱衰疾，屏居方杜关。

岂不乐山水，宴坐心不阑。

神游八极表，目寓无髦蛮。

块视众岳小，杯看五湖慳。

矧兹几案物，安用劳跻攀。

登览务得隳，无乃见一斑。

作诗调诸子，醉语不可删。

秋风动林壑，冻雨洗尘寰。

新凉至万里，浓翠浮千山。

白云出何心，飞鸟倦自还。

兴尽盍遄返，胜游宜勿殫。

“诸季”指李纲的几个弟弟。在诗中，李纲一再赞赏鼓山之奇秀、灵源之幽深。“路转人寂寂，泉飞涧潺潺。乘高望云海，天末波涛翻。”他的思绪没有停留在鼓山，而是飞出了云海之外。

这一年，李纲在福州安心养病，较少远足。

绍兴四年，李纲在福州城东报国寺营建书斋及居所，取名“桂斋”。其《桂斋上梁文》也提到鼓山：“突兀东山，揖灵源之胜概；嵒峣西岭，藉高木之清阴……”可见他对鼓山的喜爱。

迁居城东桂斋后一年多，绍兴五年十月，朝廷委任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洪州。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先赴行在，于四月至洪州赴任。李纲赴行在入对的时候，宋廷正组织一次北伐，以张浚为总指挥，以韩世忠、岳飞为京东西路宣抚使。李纲进言：“朝廷近来措置恢复，有未尽善者五，有宜预备者三，有当善后者二……”又说：“臣于陛辞日，窃闻麻制，以韩世忠、岳飞为京东西路宣抚使，圣意可谓断矣，然兵家之事行诡道……”

绍兴七年，江西安定，李纲更显年迈体弱，一再请辞，又以犯台谏之怒而罢职。

绍兴八年（1138）正月，李纲再次回到福州。

这次回福州之后，李纲没有再出去担任实际执政的官职，只享虚衔和祠禄。朝廷一度于绍兴九年二月要他再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他以疾病在身，再三推辞未就。

此番居福州，李纲已绝少诗文。

前文已提及，李纲有个弟弟叫李经，石门题刻之中，留有他跟随李纲登鼓山的记录。李经博学多识，李纲对他期望甚远，可惜他不幸早逝。

绍兴十年（1140）正月十五日，李纲祭奠他的时候，哀痛难抑，突然感疾，竟就此薨逝。他无法听到半年后岳飞堰城大捷的消息了。十二月十四日，李纲葬于福州怀安县桐口大家山之原（今闽侯荆溪大嘉山南麓）。累赠太保、太傅、陇西郡开国公，谥忠定。

情系三山两塔

◇唐 希

数千年等一回。海大踏步地退却。

对于亿万年的地球史，那只是个美丽的一瞬。

北纬26度，东经119.5度，海将它身躯的一部小海湾给陆地留下一片可耕、可渔、可居、可生存、可信仰、可依赖的土地。

那个盆式的古海湾里，因为有了人类的耕耘，瞬间完成了沧海桑田的辉煌。

养着大蛇的江，用山的泥沙沉积出的土地。北岸上的聚居地最终成为幸福之城。当古海湾中

的岛屿、明礁被围进五代闽国城墙之内的時候，文化赋予古城诗一样的别号：三山。山在城中，三座山：于山、乌山、屏山，在福城之中诗意的生活着。三山之下无数的支脉、山包让水岸上、三山下的“福人”产生了城市诗样节奏的箴言：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

每个福州人被外来人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这藏、现、看不见的三山指的是哪几座山？

最实在的回答是在翻阅前人著书之后，发现除了浮现在城市中的于山、乌山、屏山之外，藏



乌塔石塔寺

起来与看不见的山各有各的说法。还不包括历朝历代一山多名的缘故。其实它们本来就都是于山、乌山、屏山的支脉嘛。而藏在寺庙井底的岩石也算是一座山的说法，更是一种玄虚文化的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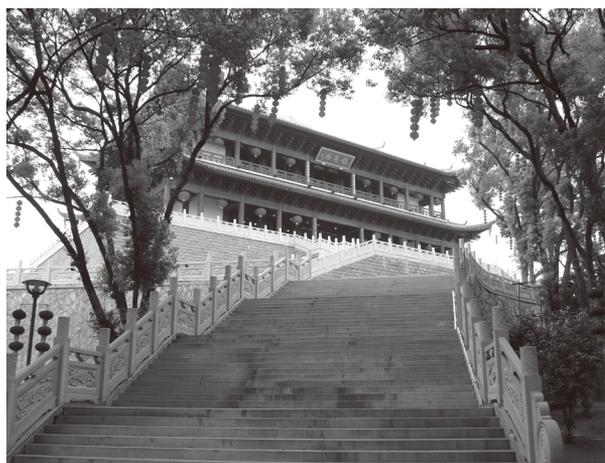
最脑筋急转弯的回答应该是：它们是前辈文化人的文字游戏，个位数中最大的“九”暗喻了数量众多。它在告诉人们：这座城市有众多的小山点缀着古城的美丽与宜居。

三三得九，这名义上的九座山都在老城区，在今天八闽首善之区的鼓楼。它以千年不变的脚步慢节奏地行走在闽江流水的北岸，听着安泰河水岸桥边摇橹人的歌谣。讲述着古汉语抑扬顿挫的故事。

与三山结缘，我始于五岁那年。老式的黄包车，沿石板道上把我拉进入于山下的罗山境。八岁，乖乖仔的我平生第一回在放学时逃离路队，随皮皮孩连滚带爬地从野道上抓紧草皮、树根，好不容易登临了于山。在山脚水部临河的老石阶上见过黝黑的石构拱桥和桥旁的大树小庙。在山腰见识了题刻与古寺。翻越黄土山路，在山顶见识到了绿叶隐匿着的高射炮阵地。

万万没想到的是三十年后的上世纪80年代。命运居然让我坐进于山白塔寺的文联办公室里，编写着三山两塔的故事。

当海峡两岸不再枪炮对峙的时候，这里流行着还山于民的口号。军用设施与营盘的迁出，福



新镇海楼



于山白塔

州市委市政府将于山定性为文化山头。也许，这正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的一个举措。一时间，文化系统的群艺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书画社、画院、文物管理机构，以及文联所属的各文艺家协会、刊物编辑部分布山头的各个新旧建筑中。利用旧建筑的同时给以修复性保护是那个时代的特色。除了画院是后现代的混凝土仿古建筑之外，白塔寺成了群艺馆、美术馆，在大殿里开艺术展、在法雨堂开办讲座与音乐舞蹈会。道教天君殿成了图书馆与阅览室还开出了碑廊。大士殿与护国寺一排古建筑是博物馆所在地，展出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同时，明代武官夫妇的木乃伊让小学生们又惊又奇。而文物管理机构就落草的九仙洞旁的白云庵。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祠堂、十九路军策划“闽变”会议的补山精舍又因庭院典雅以及它的爱国主义主题，成全整个于山景区的核心。当年福州的文化系统因为有了这个文化山头而名扬海内外。

白塔寺内，白塔下西侧的芒果树丛的红砖小楼有两间文联办公室，那是我在于山最早落脚的地方。那两座红砖楼是部队驻扎于山时期的简陋用房，连同芒果树也是那个年代象征领袖关怀工农兵的产物。那楼房简易，时常是屋里有人说个笑话，如果能引发群体人哈哈一笑，便能让全楼人感知快乐的震动。

后来，文联事业发展了，兵强马壮地将东侧红砖楼上下两层专用了，还在榕寿岩的大树附近搭起了会议室。而文联刊物《家园》的杂志社也

有了专用的小楼，挂出冰心老人题写的花岗岩匾额。每天第一个上班的人可能会在窗口与阳台上获得树熟芒果的嘉奖。当然这是后话。

当初住进风景区，才知道这里上一回厕所是要穿越风景线的：从白塔下出发穿过戚公祠、万象亭、榕寿岩、补山精舍、醉石，出白云庵，过九仙洞、炼丹井……方能抵达山腰大榕树下的卫生间。这厕所上的有点太奢侈了吧。

如此与地方历史文化的亲密接触。用笔写下这些区域地理历史故事，用当今的方式传播成了一种必然。最初的地方文乡土散文：《读读于山》等便是在这里完成。这些文字的特点是吸收了前辈文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用当代人习惯的语言加以梳理与叙述。融入当代人的思考，让历史生动，让阅读轻松。

那时候正是人类即将跨越21世纪的千禧之年。盘点历史的散文开始受到关注。福州晚报社



乌山乌塔

的闽海神州版编辑专程来到于山，约谈之后，定下了福州文化行旅乡土散文的写作计划。将于山作为这个系列散文的开篇。此后，撰写了几十篇城市文化的系列文章结集成《福州文化行旅》《福州文化散说》相继出版。

由市委宣传部与市文联联手组织编辑的《可爱的福州》丛书《闽都古韵》《闽都石语》等专著，其组织与编撰工作也都在白塔下的古寺里完成。这些书开创了福州乡土文化图文版专著出版的先河，是里程碑式的作品。文联创办的文学与文化刊物，在办刊过程中较早地介入了地方文化的创作与写作。早有《榕树》，中有《家园》，后有《闽都文化》其创刊的过程都与于山相关。21世纪之初，完成了过渡使命的文化机构迁往白龙江南岸的南台岛，于山真正地返山于民了。

立足于山，关注三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进了古城南门，向东拐还是向西拐，区别仅仅在于是上于山，还是上乌山。它们一黑一白如同两只拱卫着城市南门的狮子，在这里守护了千年。山上的一双黑白塔如同龙的犄角，将城市中轴从蛇升华成了龙。乌山上众多的榕树庇荫着摩崖题刻如同城市历史刻在石上的档案，记载着城市千年的文明。与于山一样，在这里生活过的历史名人忧国忧民成了共同的特色。周朴的反抗战乱，曾巩赞美大自然、追求普世的诗意生活，俞大猷的抗倭战斗，林则徐等人守土有则的努力…

从小我只是在乌墙黛瓦丛中远眺作为军政要地的乌山和乌塔。返山于民的乌山是在八十年代最初的那个春天，开放出来的线路仅仅是山间一条狭长的通道。从天皇岭上山，经黑黝的小巷民居从天香台旁攀登到雀舌桥下，然后沿着道山亭的山径，通过黎公亭到先薯亭，再向下是一片榕荫石林题刻。这不足乌山全景十分之一的风景线已经让百姓感受到乌山一步一景、变幻无穷的魅力了。为了开放迎接它回归文化公园的功能，那座道山亭是作为乌山灵魂被精心修复的，尤其是它顶部的藻井，涂抹红与白的木片组成浪花的节奏围着中心的一朵莲花，当地人称“出水莲花”。阳光从地面上折射在藻井上显现着它动感的韵

律，当即我用120双镜头相机仰拍了它的黑白构图之美，在当年的“榕城之春影展”上展出。后来，我每次经过，都用不同相机，黑白彩色胶卷试图再出效果。但都没能达到首拍的理想境地：它抽象地变幻着光影，有旋律动感之美。

后来的乌山，园林部门进驻其间，按园林设计的要求，在收复的旧地上找寻历史的踪迹，复建古书上记载的景点：冰壶、第一山、福字坪、双峰梦、浴鸦潭、海阔天空，还有千年的古佛崖刻石像……那望耕台的修复得益于旧书市上的一幅民国时期老照片。或许，将来再造邻宵台时也会在清末的老照片上找到依据。

除了利用出版印刷物之外，最古老的口头宣讲在这里成了时髦。冲天台高处的道山观里鼓楼文明办与方炳桂前辈联手开创的鼓楼乡学讲习所，大有“乡学有理不怕山高”的说法，每年大约五十节的课程已成为全市地方文化讲坛的典范。

作为乡学讲习所讲师团成员，这里给我一个用福州方言与乡亲们交流对福州乡土文化感悟的机会。

此前，我写过屏山，关注着春秋时代铸剑大师欧冶子还有西汉闽越王无诸在冶山的遗迹，涉足了冶山、泉山、欧冶池及周边景点与古村落街道，如城隍庙、能补天、山头角等。我是将屏山作为本地区文化的摇篮地来关注。

我将目光再次投向屏山的时候，是听到镇海楼即将重建的消息。

我骑着摩托车按先前打听到的线路往后山开去。停车，找寻通往山顶的养花圃。简便公路的尽头有扇大门虚掩着。推开它，是一片足球场大小的山坡平缓地，静悄悄的只有阳光、树丛与待放的花。这便是传说中镇海楼的所在地。

明朝初年的朱元璋时代，重建福州府城之前，在屏山上建造了一座各大城门的样榜楼。它给福州无天险可守的北门加了个军事要塞，也将福州城的北端从城隍庙拉到了屏山之上。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这样楼经历了战乱、大风、雷火，天灾人祸中大修大建了八九回。也终于有了它响亮的名字：镇海楼。此前的最后一回建造于日军

侵华战争之后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了纪念抗战中去世的国府主席而改名为林森纪念堂。少年时代，我们见到屏山上破旧地孤立山头的仿古建筑正是它。最终也因“文革”中的军政当权者看它不顺眼而人为消失。

我在屏山花圃中找寻旧建筑的遗存，除了水泥石构蓄水槽之外，惟有一处两层的砖石小屋，据说是旧的通讯电台所在地。沿着花圃我一洼又一洼地细心观察查找。可看到花圃中心有一处高出地面约一米的坡地，依稀看出长方型楼型的模样。在它的边界找到几段圆柱型的砖石水泥构件，其顶部有仿木的卯榫槽。细看断面仅仅找到了一根直径12毫米的钢筋。听说拆除时工匠是将旧建材顺势推下山去，引来附近山头角的居民前来哄抢。于是，我沿树丛向山下探去，在抵达山侧的坡地上，乱石丛中翻找着残砖碎瓦，一时没有发现带铭文的砖石……后来，是林利本老师在山头角村拆迁之时觅到了镇海楼铭文砖并捐给有关部门。

两年之后，镇海楼得以重建，按照老建筑的古老规制复活了它。根据当今环境的变化，为凸显楼体加高了底部台基层约11米。传统的木饰与工艺包裹着其主体的现代钢筋混凝土，连地砖、栏杆、檐口的瓦当、滴水全都显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古风。而老石碑、新联匾等，更是做足闽都文化的文章。镇海楼的西侧按北斗七星状摆列七星缸，是福州镇海楼一大特色，意在降火灾保平安。为了撰写导游词、制作宣传册，我两次专程为镇海楼拍照。在华灯初上天色依蓝的时分，从台阶龙雕到天际飞檐，从牌匾到地宫精细拍照，初步体验到镇海楼不可言传的威严与神秘。

当我走遍三山两塔的时候，轻轻梳理，这便是一本《话说三山两塔》的书稿。配上新老照片，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专门为它拍摄了电视专题片配上手绘导览地图。将光盘、地图和小册子三位捆绑一体在2005年出版发行。我情系三山两塔数十载，此时有了小结，只遗憾那时镇海楼还在筹划建设中。

旧闽县壶山施氏宗祠

◇施文铃

一、宋末入闽 梁山肇基

闽侯县青口镇壶山、农光两村施氏族人，远祖源自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居山东临濮世代蕃衍生息，郡邑名门郡望。后裔分支陕西、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吴兴等地。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大举南下，陆秀夫临危受命抗元护驾，命好友吴兴人指挥使施国忠、国仁带领军民奋力抵抗。南宋气数已尽，宋军寡不敌众无法挽回败局，临安府（杭州）沦陷，老臣陆秀夫、张世杰等将领带一支三十万保宋抗元军民，护拥益王赵昰、广王赵昺等南撤。从温州浮海抵福州，在闽县开化里邵岐一带登岸。而后，在陈宜中等老臣拥戴下，奉赵昰于福州越王山南麓垂拱殿登基，称宋端宗皇帝，改元景炎。

宋军保卫临安战败，施国忠、国仁兄弟为国殉难。浙江吴兴施氏族人逃亡家属失散，施国忠后人施镇时不在仕四方游学。据施厝《施氏旧谱牒》记载，宋末，施镇游学福城，始寓城邑津门，后卜迁邑南七十里，闽县崇善东乡还珠里梁山西麓肇基。梁山，里人谓之紫台山，据《闽书》记载：“葫芦山，一名梁山，上有紫台，邦人胜游，为扈屿……”清郑祖庚编纂《闽县乡土志》，将葫芦山舛误壶芦山，民国时期葫芦山淆讹壶山，今人谓之“壶山”。水曰濂江，水行闽县七里乡间，亦谓七濂。濂水派流施厝街前面一段河，曰施厝

浦，与扈屿浦、上岐浦三流汇合河头浦湟（水面大），涨潮故有河头浦水三头涨景象，形成浦湟潮水漩涡奇观。施镇公购得林家业产，择葫芦山西麓筑庐而居，娶妣周贡元之女成家立业，几十年间顺风顺水安居乐业，财富不断集聚。施家人凡事不张扬，十分低调内敛，做事谨小慎微。祖训：“允循善道奕世嘉珍，克遵至理永守纯仁。”教导后人，做人诚信为本，遵章守法，与人为善，善道是世代奉行美好的精神财富，做事坚持真理，遵从做人的道理，始终坚定守护仁义道德。先人云：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诸事让三分，黷仔馥馥福（傻人有傻福）。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勤劳的施氏族人财富不断积攒，有钱买田购地，拥有七里诸多良田，富甲一方。财旺丁旺，人口持续增长，先后在梁山西、南麓，建筑二、三十座六楹（扇）五屋厝。

施氏祠堂座东面西，坐落在葫芦山西麓，建于明景泰年间，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民国初，民主革命先驱施秉政族亲，请时任国府主席谭延闿先生题写“壶山施氏宗祠”匾额。

几百年间，祠堂历经几次大的修缮扩建，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神主殿金碧辉煌，两对青石镂空石雕柱精制秀致，石柱榑（础）笃实敦厚。

祠堂内设戏台，宽敞明亮富丽堂皇，每逢祭祀活动，请戏班公演，感恩祖先恩泽。祠堂内外雕梁画栋，装饰精美，蔚为壮观。

宗祠是裔孙认祖归宗殿堂，供族人和海内外游子还乡祭祖觐拜，每年正月都举行祭祀活动，追思祖宗造化，感恩先人福荫子孙后代。

二、七里中心 商贸繁荣

闽县七里区是濑江、西峡江泥沙冲积小平原，堪称小江南水乡，水田沃土宜种水稻，是邑城粮仓。濑江回转三十六弯，有许多洲地长满蒹葭，是织床席天然原料。在男耕女织时代，施厝男人力耕，女人拍席（织草席）。据说，拍席手艺是老祖宗从浙江吴兴带过来的，草席是居家生活日用消耗品，不愁没有销路，拍席是一项收入可观的家庭副业，施家人视作传家宝，施家女出嫁把拍席手艺带到夫家，女承母业。

古时候施厝街是南下官道，闽县还珠里设梁山驿站，据《福州府志》记载：“梁山铺兵六名，每名银七两二钱，闰年每名加六钱。”福城与闽南上下通道，必经施厝街，人流物流给施厝带来经济繁荣，直至民国时期，七里商帮庆诞（年会）都在梁山紫台庵举办。那时施厝钱庄比米店多，民间金融活动十分活跃。七里商贾有资金需求，常来还珠里施厝当店、钱庄融资。施氏宗族分支有“当店房”派下，古厝曰当店裡，说明其祖上以经营典当、资金拆借为业。施厝街有水产生鲜、日杂、京果、药材等批发商行，生活必须品油、盐、酱、醋，日用百货应有尽有。施厝街两侧商店牖列：河头依金肉店、宝金饼店、木勤甸（陶器）店、细哥虾油店、依七竹器店、依西船头行（水俣店）、鼎亨京果店、培镇米绞（碾米厂）、培铃百货行、敦厚当店、佛妹豆腐店、志润西医诊所、施厝街邮局、宋幼文中医馆、二佛布店、百龄剃头（理发）店、二哥药材行、万春中药行、榕



谭延闿题匾

官雕刻土依仔店、义妹米店、依妹桶店、嫩佛什杂店、海水鲜鱼店、依瞻（富）什杂店、共和牙（三沙、连江水产批发）、伙水鲑（岐）行、依康什杂店、才姆饼店、大佛饮食店、卓枫中医诊所、林记中医诊所、黄依莲衣服店、妹仔米绞（碾米厂）等等，昔日商业十分繁华。

三、允循善道 仁义好施

明朝义官施纶，字克端，闽县还珠里施厝人。里间传说，施纶三代单传，里人戏言“蜀条烛点呢敷敷光”（点一根蜡烛亮堂堂）。纶幼年家境贫寒，大年三十，纶父到肉桌（店）赊两斤猪头肉过年，屠夫收市时候想到民间风俗，年三十是讨债日子，被人欠账不吉啊！于是，便到施纶家讨肉钱，纶父求情道：“肉都下锅煮了，实在没钱，年后即还。”屠夫不依，吼道：“没钱还想吃肉！”揭起锅盖拎着肉便走。是夜，纶父无可奈何，便到屋后菜园拔两株芥菜凑乎做年，不慎碰倒菜园石头围篱，砌好后转身要走，不料小石头围篱又倒下，如此反复三次。纶父心想，干脆把围篱基地土扒深垒结实点。基地土扒开，挖到一陶罐，打开一看，竟是闪闪发光的金子！意外拣金，自此发迹。有了钱，盖房、买田、经商，施纶年青机灵，商场得心应手，几年光景，赚得盆满钵满，家财万贯，又买了大片良田。据说峡南以内，近半水田是他家的私产，可谓富甲七里。施纶也脱不了世俗老套：“发家致富传世事”，还有一段“有声没策担（稻筐）”故事。时施纶年近六十有五，纳季氏为妾，对“细姐”宠爱之至。老话说“做花旣做夹竹桃，做依旣做依细婆。季氏当小妾没有名分，被人小觑，平日抑郁寡欢。施纶心疼小美人，便取悦爱妾，赋予收田租大权。季氏欢欣雀跃，一权在手不怕令不行，让乡人刮目相看。里人时有讨好她，以长者辈分相呼，遂尝惠利。是年歉收，乡人秋获交田租困难，佃农依歇者，挑谷进仓交田租，便在谷仓门口大声喊“伊婆”（对长辈妇女的尊称），我挑一担谷子来交租，请你来查验一下。喊她“伊婆”，季氏满心高兴一脸春光，在账房里回应“阿使”（可以）。

依歎交了四担租，还差一担，家里只剩不到一担稻谷了。没奈何空手到仓库大门口高喊：“伊婆！我挑一担谷子到仓库了，请你来查验一下。”这喊声三落厝都能听得到，“伊婆”照例连头都不抬，回应“阿使”，依歎免了一担田租。施纶为人仁义，后来，逢歉年，任恤乡人，默许里人“有声没策担”减田租。施纶善举载入《福州府志》，曰：“施纶，性慷慨乐义。少善贾，累赀巨万，辄施亲故之贫者……”

施氏仁义基因脉脉相传，清初，施元暘开仓赈灾和资助邑城军民抗敌，仁者义举传为佳话。据《闽县乡土志》记载：“施元暘，字赧白，顺治五年（1642），福州饥，出己粟多贍族众。顺治十三年（1650），郑氏兵围城，居民分陴坚守，敌军寻退，皆其措饷之力。”元暘公胸有家国情怀，铭记祖训：允循善道，赧续好施善举之祖德。

四、先贤办学 满门书香

古语云“家有诗书抵万金”，俚语曰“养仔听读书，不如佻养猪”（养儿没读书，不如去养猪），让孩子读书，是普天下父母的夙愿。据《施氏旧谱牒》记载：“明朝洪武四年，施益，字友成，于户部给由当还珠里三图里长。”施友成力措让施氏子弟实现科举入仕理想，在施厝办起三处“人家斋（私塾）”。自此闾里间常闻琅琅读书声，学经读史蔚然成风。《壶山施氏族谱》载，晚清，施厝“斯彰斋”藏书甚富，旧有“七瀨吟社”。在壶山右麓辟地数亩，花园庭森绿竹，窗舞垂杨，杂时花木，布置幽雅。施与螺江陈氏姻亲，弢庵（陈宝琛）石遗（陈衍）频生诸老，曾几度雅集斋中。后弢老息影玮门曾寄施一联云：“何日追欢期竹所；与君留命看桑田。”施之长子名棱字子毅，亦娴韵事。昔时七瀨吟社三十余人，联吟唱和，每至深夜。

葫芦山地灵人杰，施镇公肇基七百多年，人丁兴旺，今闽侯县青口镇施厝人口七千余，尚有族亲在不同历史时期寓居台湾、北京、上海、尤溪、大田、长乐及海外各地。

明清两朝，施氏族人参加科举时有登榜，据

《福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施爱，字欲周，授浙江归安知县；明嘉靖二十八年举人施可学，字欲行，广东仁化教谕；明景泰年间监生施得（德）任顺昌县丞；明成化年间监生施闰游任长泰县主簿。《福建通志》载：施霖，字能继，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授平原知县，寻改西宁，擢升工部主事；清乾隆十三年举人施廷挺；清同治元年举人施登龙；清同治元年举人施鉴槃；清光绪十五年举人施枢金；监生施侃、施泽、施士奇、施文良等，分别任训导、教谕或其他官职。《施氏旧谱牒》记载：康熙五年武举施奇绩；康熙四十一年武举施觐光。秀才20人，武秀才2人。

据施宝霖等老先生回忆，小时候见过施厝街（今40号），大门上方悬挂“大夫第”匾额，古厝厅中悬挂一面“进士”和三四面“文魁”牌匾。施厝上岐（今127号）古厝，门额悬挂一块“进士”匾额。施厝庵边俗呼“大厝裡”古厝，大厅旧有悬挂“文魁”“武魁”五面牌匾，上岐“后斗厝、中落、下底落”三落透后古厝，“七柱裡”等古厝还有文魁、太学生、雍进士、监生等科举牌匾。这些匾额是先人读书的成绩单，激励后人“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科举入仕光宗耀祖报效国家。

近现代施厝人才辈出，杰出者如南洋水师舰长施辉蕃（刘冠雄亲家舅）、黄埔军官学校少将教官施泰祯（邓拓姐夫）、民主革命先驱施秉政、陆军少将施广植、海军少将施芳，晋江县长施子毅等等。新中国水利工程教育学奠基人、中国水利工程教育家、清华大学终身教授施嘉煬，清华大学举办施嘉煬期颐嵩寿庆典，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专程前往祝贺。书画篆刻家施宝霖，师从陈子奋、龚礼逸、潘主兰等大家，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创作的两件寿山石组雕，永久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展览。浙江绍兴开办施宝霖寿山石雕博物馆，共有三百多件套展品，篆刻名章印钮小动物栩栩如生，人见人爱。族人在当代政界、科研、医学等领域，尚有众多颇有成就人才。

古今同辉晋安城

◇ 缪淑秀

“晋，进也。日出，万物进”，“安，静也”，《说文》云。

“晋安”，作为闽地行政区域名称，一个是福州历史上最早设置的州郡，一个是在“3820”战略工程规划中诞生的区县，相隔1700多年，却承载着一样的美好祝福，一样的如日东升的万千气象。

晋太康三年（282），随着闽地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晋武帝司马炎析建安郡东南部增立新郡，并冠以国号，谓之“晋安郡”。

福州地区最早的郡是秦始皇在福建、浙南设

立的闽中郡，但未派遣官员，形同虚设。汉武帝之后，福州、福建长期属于会稽郡管辖，行政中心（郡治）在江浙。到三国时期，福建才从会稽郡分出来，设立建安郡，行政中心设在闽北。晋安郡是福州地区独立设郡的开始，也进一步奠定了福州作为福建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

晋安郡下置原丰、侯官、罗江、宛平、温麻等八县，郡治设于侯官，即今福州主城区西部，原丰则为今福州主城区东部，大部分区域属今晋安辖区。

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修筑子城，开凿东西二湖，定下了后世福州城的雏形，而“晋安”这个称谓除了少数年份，大约沿用了三百年。

晋永嘉元年（307），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建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中原士族相随南迁，史称“衣冠南渡”，永嘉二年起，大规模南迁入闽。此后，中原人口陆续南迁，他们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使远离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区域的福州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在闽越文化和海洋文化基础上，集成融会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的闽都文化。

宋代，福州科第成就跃居全国领先地位，成为“儒学最盛之地”，被誉为“海滨邹鲁”，先后出过26位文状元，仅次于苏州府，位列全国第二，进士数量逾3200名，居全国第四，仅次于苏州、杭州、常州。



鼓岭风光

“甲第朱门长乐郡，管弦灯火晋安城。”明代文学家徐 曾在诗词中以郡城之名展现福州的经济、文化、教育之繁荣。之后，虽几经更名，闽人仍习惯以“晋安”指代福州。

明初，福州形成了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才子”，追慕盛唐诗风，被称为“闽中诗派”或“晋安诗派”。之后，以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等为核心的福州诗人仍坚守唐音，自成“晋安一派”，与历下、竟陵鼎足而立。仅诗歌总集《晋安风雅》就收录了明初至万历年间264位福州诗人的1424首诗作，展现了当时闽诗之盛。

千百年来，一个被珍爱的郡名，带着人们对家园的挚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延续着一座城市源远流长的文脉。

“晋安”作为福州城区之一，则成立于1996年，由50年代所设置的“郊区”调整并更名而来。

所谓“郊区”，即由环抱福州城区的城门、盖山、建新、仓山、螺洲、琅岐、亭江、洪山、台江、鼓山、新店、宦溪、岭头、红寮、日溪、鼓岭等16个乡镇组成，总面积约926平方公里，经济总量低，交通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甚至70%以上居民皆为农业人口。

1992年11月，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福州市编制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称“3820”战略工程)，提出了建设

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目标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

根据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要求，郊区除山区、海岛以外都要向城市化方向发展，这是建设大福州对郊区的必然要求。福州城在旧城改造之后的重点是向外拓展，而福州城的扩大首先是郊区的城市化。

如何加快城市化步伐，使郊区得以“金蝉脱壳”？福州市先后组织人员100多次深入郊区视察调研，推动郊区行政区划调整和新区定名工作。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挂钩联系岭头乡，推动寿山石文化发展，为北峰山区发展指明方向。

郊区的开放开发、城市化建设在全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郊区发展了，就能对全市的发展起带头示范作用。福州市将郊区开放开发、城市化建设放在全市发展的高度来认真组织实施。

为此，福州市成立了以市里为龙头，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各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有序推进福州的城市化建设和区划调整工作。

1995年10月，制定出台了福州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将“福州市郊区”更名为“福州市晋安区”，辖王庄新村、象园(新设)、茶园(五四街道更名)3个街道；鼓山、新店、岳峰(原台江镇更名)、宦溪4个镇和日溪、岭头、红寮、鼓岭4个乡，总面积552平方公里。

1996年1月1日，晋安区正式挂牌成立。“晋



晋安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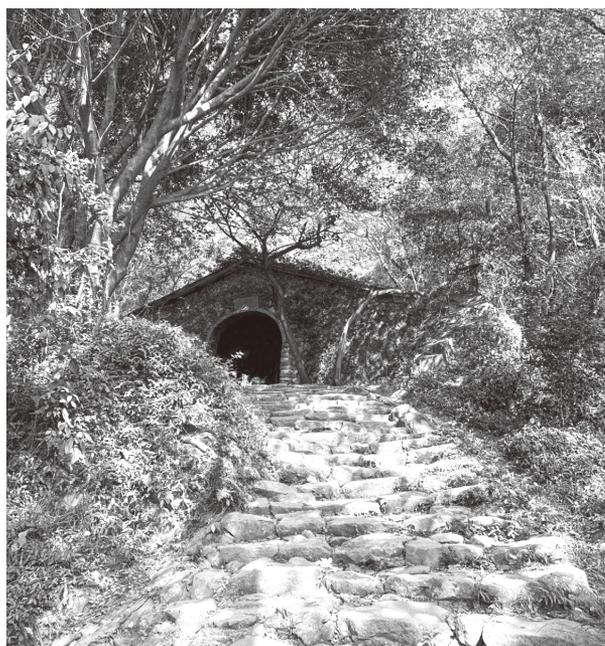
安”，一个沿袭了闽都文脉的新区如旭日般在晋安河畔冉冉升起。

区划调整解决了城乡分治、版图不清、管理不便和市区发展空间受限以及功能不协调等问题，达到了有利于统一规划、方便行政管理、功能优势互补、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也为晋安区从田野走向世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城市化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循序渐进，还要快中求稳。

近30年来，晋安区秉承“3820”战略工程的思想精髓，应势而生，勇立潮头，砥砺前行，秉持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锚定建设新城区、开发大山区的发展方向，缔造了一场从郊区到现代都市核心区的美丽蝶变。

通过王庄、横屿、光明港、火车站周边、连潘、溪口等一批组团式、多极式旧屋区改造，基本消除城中村。城区每平方公里路网密度达到8.3公里，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穿行而过，轨道交通覆盖核心区域；山区行政村通双车道率位居全市前列，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区）。全市率先完成38条内河水系综合治理，新建金鸡山、光明港、牛岗山、鹤林、晋安湖公园



状元岭古道



寿山乡

等301个公共休闲空间，城区绿化覆盖率位居全市首位，获评国家生态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绿化模范区；美丽乡村建设实现全覆盖，获评全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区。

近年来，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新征程中，晋安区全力打造一个科创走廊桥头堡、一个亚太光电组件中心、一个区域性消费中心、一个闽都文化品牌矩阵、一个山水城市样板区、一条优质民生服务链，为福州都市圈建设注入更多现代化、国际化元素。

在先行先试，锐意进取中，晋安综合实力由“弱”到“强”，成为福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全区经济总量从26亿元跃升至1137亿元，增长43.7倍。三产结构从10.3：67.0：22.7优化至0.8：25.4：73.8，初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都市型创新产业体系。人口从25万增至79万，教育、医疗、养老等事业全部实现跨越式发展。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3820”战略工程思想的引领下，晋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进入了“管弦灯火晋安城”的古今同辉新时代。

《说文》又解：“晋”乃前进、向上；“安”乃静好、舒适、稳定。故此，晋是福，安是福，晋安是福。

千年底蕴，世纪新城，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感恩奋进，不枉“晋安”之名，不负殷殷嘱托。

琴亭岁华记

◇孟丰敏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周易，古人讲究住宅风水布局，有的村落甚至按照阴阳八卦来布局，而阴阳之间那道分割线即村里最重要的河流。河流则如同人体里的血管，滋养一方百姓。因此，传统村落一般都有一条河。有河一定有桥，还有亭，便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水乡风貌。尤其在南方，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炊烟袅袅的村庄，尽显其灵秀婉约之姿态。

逛古村，我最喜欢看村里的溪流。每当一泓池水映入眼帘，仿佛看见了一位佳人的善睐明眸在波光荡漾，令人怦然心动。水就是古村的灵魂所在。有一天，我意外看到一张古村庄的照片，白墙黛瓦、榕树、稻田、炊烟，朦胧的层叠山峦，宛如一幅画般展开。古厝前有一池塘，清澈的池水宛如明镜，将巨大的古榕映照在池水中，仅凭一眼，便令人印象深刻。据村民说，这片池塘便与琴亭村的琴亭溪相通。多么清澈美丽的溪流呀！

“琴亭”村名更令人产生无限遐思。琴棋书画是古人修身养性的四种技艺。弹琴时，贵禄荣名皆可忘却，更令我好奇的是，这是怎样的一把琴、一座亭、一个村？

2023年初春，我刻意到村里寻访琴亭，却只看到琴浦新苑里一座新修的琴亭，并非古迹。那么，古村为何命名为“琴亭”？这座古村的生命

线——河流在哪里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实地寻访。

琴亭古村

关于琴亭古村的历史，搜遍福州古籍，如南宋淳熙六年（1179）福州知州梁克家撰写《三山志》卷第十六、明王应山《闽都记》都记载了琴亭村的历史情况。清末郑祖庚的《侯官县乡土志》更加详细地说明：“西园区三峰耸翠如列屏然。近乡之山，南有凤山，北有玄坛岭，玄坛古庙在焉，为诸乡会议之所……逾山峡而下，与闽县之苔井交界。西，曰：磐石、岑亭。亦名琴亭，傍山而居，前后约百四五十户。另有墓亭一所，小乡亦属焉。相传明陈培所有七墓，一见上，一在此地，余未详。过此，则为富村区之领乡矣。南下申明亭亦曰思儿亭。父老传言，明戚南塘元旦出军讨倭，路经此地，令兵士毋回顾，违者斩。其子回顾，斩之，凯旋至此，哭之恸，后人因建亭以志之，名曰思儿。”

琴亭村历史先从唐朝说起。《三山志》记载那时福州户籍衰少，郊外荒山野岭，人迹罕至。但《福州郊区志》记载，晋代以前，新店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因为秦汉时，闽越国的城池就在今天的新店古城。琴亭古村也属于闽越国古城范围。

唐代，琴亭古村属闽县灵山乡怀贤里。它背靠罗汉山、琴亭山，村前有溪流穿过，地下水丰富。而且琴亭山就是民间传说的福州青龙生的第九子，位于罗汉山西麓，如青龙匍匐下山。听老村民说，这是一条护佑当地的福龙，头在琴亭山，项在青井，尾靠罗汉山，两只龙眼，一只是琴亭山之阳的一口井，另一只是琴亭山之阴尾厝边的一口井。琴亭村的水井确实多，杨庵里原有一口水井，井栏上刻字说明井开凿于唐元和二年（809）。可惜杨庵里拆迁后，水井已填埋，也没有留存照片佐证。但这一切说明，按传统风水堪舆学看，琴亭村乃宜居之地，或许早在闽越国时期便有居民聚居成村落。

北宋，琴亭古村从闽县改为怀安县管辖。宋到明，琴亭古村依旧属于灵山乡，东湖之东北隅。清朝，琴亭村属于侯官县西园区，且位于西园区的西边、罗汉山西麓。民国时期，琴亭古村属于闽侯县（今福州市）莲峰乡。

琴亭村的正式建置，有史料记载的是北宋开始。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福州建置怀安县。怀安县衙几次迁移。《闽都记》记载，最后一次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知县薛武营将县衙移建城内，在福州府城西北角永安门外。永安门外即屏山一带。

北宋蔡襄开渠时已有琴亭村。清王应山《闽都记》补充记载了蔡襄为复古五塘，以溉民田，有意浚治西湖，未果，乃命疏导渠沟六十有九，以兴水利。这69条渠沟就包括了琴亭。说明有琴亭村，才会开凿引琴亭湖水。

民国文学家何振岱主编的《西湖志》记载：“龙腰、湖心、琴亭诸处皆滨东湖，里数最长。”“又至铺前河、琴亭村为来宜铺。父老云，此地本凿山通渠，河势高仰，得水为艰，又至琴亭桥，穷于罗汉山之阴，为旁支之一。”

综合以上古籍记载，说明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建置怀安县，闽县的部分村民迁移到怀安县来开荒拓土。此时建置琴亭村，有专门负责邮政的来宜铺。今天的省体育馆一带当时属于琴亭古村的田地。因此，怀安县衙署与琴亭古村近在

咫尺。

因村开凿琴亭湖，今琴亭湖在何方？琴亭村的村民尴尬地说，现在的琴亭湖没有经过琴亭村内，距离琴亭小区却很近，但琴亭小区的居住者都是外来人口，属琴亭社区管辖，与琴亭村无关。琴亭村民不无遗憾地说，琴亭村的历史大家不了解，所以现在解释不清楚琴亭湖和琴亭村的关系了。沧海桑田，琴亭湖和琴亭村真的就此断联了吗？

琴亭湖与铺前河

根据《侯官县乡土志》记载，西园区、琴亭村水系发达。老居民说50年前，村内有琴亭溪、浦前河、门前溪等。这些河流都与琴亭湖有关。

清朝徐景熹撰写的《福州府志乾隆本》记载：“东湖，在县东北。”“东湖，在西湖北，亦晋太守严高所凿。”

北宋庆历四年（1044），福州知府蔡襄浚治西湖，灌溉农田，谁知不成功，只好将晋朝严高所修筑的城壕拓宽重建成福州的护城河——晋安河，成为福州城外重要的运输航道，也是福州河道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人工运河。不仅如此，蔡襄要求疏导渠沟69条，令晋安河所经之处也形成塘、埭、陂、湖、池等。当时琴亭村民凿山通渠以灌溉农田，琴亭湖此时出现，河流里数是东湖中最长的。

《福州府志乾隆本》记载：“宋庆历初，奸民蚕食，其中东湖湮。”

明朝王应山撰写《闽都记》记载：“东北诸山溪水，纳于东湖。宋庆历中，渐塞。至淳熙间，则渐为民田。浮仓山昔在水中央，今周遭皆田。东北诸乡，至今犹有湖滕之号。浮仓之西，有亭呼湖前亭。旧属怀安，今并侯官。”

以上古籍记载，南宋末年，东湖渐塞为民田，低洼处形成湖泊池塘。琴亭湖原纳于东湖，又流向哪里呢？琴亭湖里数是东湖中最长的，既命名“琴亭”必然与琴亭村有关。

为留住乡愁，2021年，晋安区五四北琴亭高架桥下，原磐石村里修建了一座琴亭湖公园，南

起福州三环路，北至南平路，西至福飞路，东至罗汉山、福建儿童发展学院。琴亭湖公园面积跟左海公园相当，湖面东西向长约1100米，南北向宽200米至350米，成为五四北片区一个重要的休闲公园。公园的花海中有一狭长的湖泊像一支琵琶，正是琴亭湖，从此向南与晋安河连通，流经东浦路的琴亭村。村旁的茶园路和公益路之间的这段琴亭湖，从此不再称作“琴亭湖”而叫“晋安河”了。

现在，人们难以想象北宋时五四北有一座依靠罗汉山的古老的村庄叫“琴亭”，村内有一座琴亭山，南宋时有了琴亭湖，后来还有琴亭溪、南禅湖、马头池、井龙池、火烧池、双屿池、池楼后、凤来轩池、白莲浦、浦连河、浦前河、延安里池、门前溪、居龙街大小两口池塘。琴亭村先民凿山通湖牵溪建池以溉田，形成良田千亩。

因为有琴亭湖，村里又有了一条琴亭溪，其发源于大北岭，流经象峰、溪里、秀山、磐石，经琴亭、思儿亭、树兜、汤边，汇入闽江。老村民说，琴亭湖公园的琴亭湖到思儿亭小区的一段河流即琴亭溪。为了蓄水灌溉农田，先民在思儿亭北50米处筑一道拦溪坝。20世纪50年代，疏浚晋安河而填埋部分。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琴亭溪几乎填平，仅残余现在一段沟渠，位于琴浦新苑和琴亭小区之间。

在琴亭村生活50年的村民王正蓉说，琴亭村拆迁前，她家就住在浦前河畔。50年前的古村里有一条大河叫“浦前河”。浦前河长一百多米，宽六七十米，河水清澈，村民在此洗衣、摸螺、养鱼。

《侯官县乡土志》记载：“乡之前有白莲浦，潮汐往来，田园资以灌溉。浦边有一古塔，明陈培所建。”

相传浦前河是明朝首辅叶向高开凿。浦前河原名铺前河，是来宜铺前的河流。据说此河一开，琴亭山之龙脉被截断，风水告“破”。其实明万历前，每年春末夏初山洪爆发，琴亭村饱受洪患之苦。叶向高便主持开凿浦前河，沟通了白莲浦与浦前河。两条河畅通后，琴亭古村被截为两段：

河东为上片，河西为下片。村民从此将浦前河又称“白莲浦”，今惯称“浦前河”。

白莲浦上有白莲桥，桥旁有一座明天启年间工部尚书陈培所建造的石塔。浦前河边住着林家、欧阳家。浦前河的白莲桥边住着陈家和姚家。陈家人说，浦前河靠近街道的拐弯处有一座青石板铺就的大石桥，五米宽，七八米长。桥畔有一条古街，街的另一头还有一座小石桥，桥边有一条门前溪，溪边住着金家。

20世纪初，浦前河依旧可通闽江。每年端午节，四乡龙舟队在浦前河上竞渡，琴亭村的龙舟队经常拔得头筹。1958年外建设福铁路和东浦公路，贯穿村庄的浦前河被截留，余流主要在琴亭村内，经引渠注入晋安河。1981年车辆段项目征迁琴亭村，浦前河被填埋，变成福州铁路修配厂。

2023年春，我从琴亭湖公园的秀峰路出口步行前往东浦路，穿越罗汉山隧道，拐到站西路，看到碧桂园融侨时代城，从这里过街到对面的地下通道，就到了东浦路，一直往西走就是琴亭村的三个小区。村民回想起当年的浦前河早已消失，不无感慨地说：“沧海桑田，变化太大了。但如今住在公寓楼里，比当年住在柴栏厝里，条件好多了。”

琴亭桥

北宋时管理琴亭村的怀安县知县樊纪修建了13座桥，其中一座就在琴亭溪上，名“琴亭桥”。桥附近是琴亭，村民称琴亭一片区域为“亭下”，后又修建琴亭下桥、白花六角亭桥。

《侯官县乡土志》记载：“（白莲）浦边有一古塔，明陈培所建。叠石嵯峨，如戴鳌屹立而听号令者……”

《西湖志》记载：“由湖头井至西园村白连桥，桥旁石塔，明天启造，又至琴亭下桥、白花六角亭桥。”“西湖水断到龙腰，只隔琴亭二里遥。每到浮仓山下望，无人能识十三桥。”

《闽都记》记载：“东湖既湮，赖此港浦桥梁，导东北诸水以达于东门。按：十三桥，今俱湮塞

无存。”

清代的《侯官县乡土志》记载是白莲浦，民国的《西湖志》记载是“白连桥”。虽是一字之差，意思差别很大。或许白莲浦是种满白色莲花的河浦？无论如何，古籍记载说明民国时港浦日渐淤塞，东湖遂消失，13桥无人能识，仅白连桥因有白莲浦（铺前河）而犹存。

那么，琴亭桥在哪里呢？它就位于琴亭溪上。当年的琴亭溪流经思儿亭，琴亭桥就建在思儿亭附近。据老村民回忆，50年前的琴亭桥是木桥，后来改为水泥桥。2016年，琴亭村全面拆迁后，公益路思儿亭小区附近的水泥琴亭桥也日渐朽坏。为便于村民出行，就在旧桥上架设了一座铁制“琴亭桥”，形成了独特的高低桥。村民们当初很高兴有了时尚、坚固的新桥，如今又颇为遗憾地叹息，如果当年若懂得保护这些老建筑，留下旧桥作为纪念，近旁另建一座新桥，会更好。

琴亭

介绍琴亭古村、琴亭湖、琴亭溪、琴亭桥情况后，最后才能综合推敲“琴亭”名称的来历。

中国古代最早的亭并不是供观赏用的建筑。如周代的亭，是设在边防要塞的小堡垒。秦汉的亭是地方维护治安的基层组织。《汉书》记载：“亭有两卒，一为亭父，掌开闭扫除；一为求盗，掌逐捕盗贼”。魏晋南北朝，驿制代替亭制。此后，亭和驿逐渐废弃。但民间却有在交通要道筑亭为旅途歇息之用，或作为迎宾送客的礼仪场所，一般是十里或五里设置一个，十里为长亭，五里为短亭。

琴亭之亭，或许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那时福州属于闽越国管辖。今天的新店闽越国古城范围应该就包括了琴亭古村。或许那时琴亭村里的“亭”是一个类似驿铺的基层组织。那么，琴亭古村的历史便要提前到秦汉时期。或许日后这座驿铺作用的“亭”被废弃，演变为真正的亭子建筑。因为作用变化，它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琴亭村里真的有一座和“琴”有关的亭子吗？



思儿亭

琴谐音“情”。琴境撩人，古人抚琴觅知音，他们在山水丘壑间，寻觅琴境和知音。“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常聚竹林饮酒赋诗，操琴吟唱。东晋陶渊明确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借琴怡情，借琴起兴，借琴衬景。唐大诗人白居易在洛阳故居南园建琴亭，并自谓“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他的庐山草堂依旧是“不可居无琴”。可见琴境是营造自然脱俗、幽雅闲适的出世境界。“琴”的作用这么大，因此家中多有琴室，室外则有琴亭。

琴亭古村的亭建在何处

古人对建筑的位置十分讲究。亭子一般建在山顶，既是一个到达山顶的标志，更是遮阴挡雨歇脚之处，又可供游人统览全景。临水处筑亭，人于亭内凭栏闲坐，观赏湖光月色，恍如瑶宫仙境。因此，亭子构成溪流、湖边景区的重要建筑。

古代全国各地都有琴亭，比如《东维子集》记载：“夕阳下春，新月在庚，闾阖从兑，至公子鼓琴亭之所歌，商声若出金石。”又如《御定全唐诗》：“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

古人作诗常联系周易八卦理论，比如“新月在庚，闾阖从兑，商声若出，池西琴亭”都围绕一个问题即西位。因为庚在西方白虎位，西属五行之金，金石之声即声音来自金属，后来指高昂的乐器声音或是音乐。

《淮南子地形训》云：“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闾阖之门。”

《楚辞·离骚》：“吾令帝闾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王逸注：“闾阖，天门也。”

纵观古籍记载之“琴亭”皆与西有关。说明古人喜在池西建琴亭，而且闾阖从兑，意谓金石之声在西。文人雅士以为在西边的天门弹琴，岂非仙人？

唐代，各地琴亭最多。当时福州也许有一位文人雅士在罗汉山西麓，琴亭山下，琴亭溪之西侧建琴亭。琴亭溪、琴亭山、琴亭相映成景，琴亭古村风光旖旎之处，更是村之中心。于是一位诗人、一条溪流、一座亭的风雅故事诞生了。“琴亭”之名流传下来。历经几百年，或许这座木构的琴亭朽坏倒塌了。

琴亭建在琴亭溪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侯官县乡土志》记载：“玄坛古庙在焉，为诸乡会议之所。庙后有文昌阁，傍列精舍十余楹，为诸乡讲读之所。乡之前有白莲浦，潮汐往来，田园资以灌溉。”真武庙当年是诸乡会议之所，庙后有文昌阁，附近还有琴亭溪、琴亭桥，因此推测琴亭建在琴亭溪的西侧，即琴亭桥畔，距离真武庙不远，方便过往者休憩、迎来送往。

《闽都记》载：“琴亭，在二都，先朝邑令所建，巡行阡陌往来稍憩于此，俗呼虔亭。”既然有明确的古籍记载，可以确定宋朝的怀安县知县樊纪复修建了琴亭。这段话的描述也可见当年的村景村貌，说明阡陌往来的人不少。樊知县常来琴亭古村了解民风民情，造访村民，看到村里往返者、辛苦劳作的村民休息时无处依靠，尤其炎炎夏日田间耕种者更需要一座避暑喝茶的亭子，更不必说官员巡行阡陌时也需休憩。于是樊知县建造琴亭桥时，也拨款建亭。

为何俗呼“虔亭”呢？根据古籍记载，我做了大胆猜测和求证，樊纪复不仅为官清廉，体察民情建桥，还曾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扩建孔庙学宫，于任上做了许多惠民实事。他的爱民之情感动了村民，村民以“虔”字来表达他们对爱民县令樊纪复的恭敬诚意之情。因年代久远，“琴

亭”俗呼“虔亭”已难以考证，只能由此当作一个美好的传说来演绎。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礼乐教育，而礼乐教育的中心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乐教离不开古琴。“虔”与“琴”皆与传统礼教文化有关。因此，琴亭古村也是一座历史悠久、虔敬礼教传家的古村。

但是，《侯官县乡土志》记载：“西，曰：磐石、岑亭。亦名琴亭，傍山而居。”

“岑”本义是小而高的山，泛指山。或许，“岑亭”的名称与罗汉山、琴亭山有关。无论如何，说明琴亭的名称有多个，或许是不同历史时期因风貌之变迁而产生新的俗称。

琴亭附近的一片土地称作“亭下”。据村民说亭下即现在的真武庙、琴亭新苑一大片区域，以前都是良田，村民便在此耕种。1981年车辆段项目征迁琴亭村时，真武庙一带被拆迁改为新村。1992年，村中重建一座琴亭于琴亭境西侧。

福州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琴亭古村在唐朝时属于闽县灵山乡，清朝时属于侯官县西园区（厚山、崎山、盘石、琴亭、洋下、凤山、水头、涧田、泉头、西园、汤斜、篁墩、岭下、溪里）。西园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置沿革调整多次。琴亭村和西园村、磐石村等的历史是共同的，有交叉之处，无法分割清楚。因此，不能说琴亭湖只属于今天新店镇的西园村、磐石村、琴亭村，也不能把整个西园区域的人才全部归属到某个村。我们从一个村落看到了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变迁中感受时代前进的脉搏、沧海桑田巨变的喜忧、各个姓氏族群分散疏远的悲欢离合。

如今，琴亭村内的琴亭湖及其支流、溪水、池塘都陆续填土盖房，众多的桥如琴亭桥、白连桥、琴亭下桥、白花六角亭桥等也随之消失，幸好尚余一条如同沟渠的琴亭溪佐证琴亭村的历史。除此外，房地产开发商在琴亭村的两个小区内新建了两个亭，即琴浦新苑里靠近东浦路边的琴亭、祥亭佳苑小区门口的祥亭，算是对消失的古村古迹的弥补，让村民们也多了一个夏天乘凉、茶话的休闲去处。

“庆丰庄”的故事

◇邵良官

云山苍苍，樟水泱泱。云山樟水之间，坐落着一座座古老的庄寨，犹如散落在乡间的明珠。这些永泰庄寨多建于明清时期，雄壮威武、精致巧妙，黛瓦飞檐，厚墙围合，集防御、居住、美学等多种建筑功能、元素为一体。寨立天地间，乃天人合一的建构，极符合永泰当地地理特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族社会居住特点，既防御外敌，又弥漫着浓浓的温馨家园的氛围。

内为庄、外为寨；文为庄、武为寨；父建庄、子建寨。永泰梧桐镇的庆丰庄为现存较有代表性永泰庄寨之一。庆丰庄，俗称坂中寨，位于永泰县梧桐镇椿阳村板中11号。2016年5月28日，庆丰庄列入永泰县第九批县级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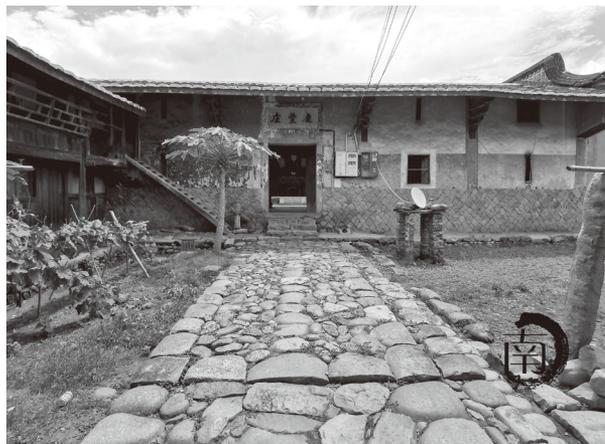
保护单位。

庆丰庄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庄寨主人是陈氏先祖陈如坤和他的儿子陈尧榕。整体建筑历经十余年建设时期，一座固若金汤、攻防兼备的庆丰庄横空出世了。最初连房带院仅800余平方米，后随家业兴盛逐步扩建，陈尧榕接过父亲陈如坤的棍棒，继续扩建完善，修建院落占地3937平方米，建筑面积3856平方米。如今我们可见的庆丰庄为两进院落式格局，共有300多房间。

庆丰庄有内外两重同样具有坚实防御功能的厚庄墙。外墙以硕大的鹅卵石和夯土筑成，令人感到震撼的是，这些鹅卵石在堆砌的过程中并未使用任何粘合剂，完全是自然的叠加和垒砌。在鹅卵石的上层，便是用泥土夯起的土墙了，这些墙壁上全都留有密布交叉式射击孔，用于射杀前来作乱的匪众。高耸的院墙边角处设有用于瞭望和防守的碉楼，高墙上相距数米便开斗形窗。在筑墙时，设计者、工匠们巧妙地将大型鹅卵石敲碎，破碎的一面向内堆砌，光滑的一面裸露在外，这样就能防止盗匪向上攀爬围墙了，且鹅卵石个个都有脸盆大小。墙内侧还有“跑马道”。庄寨内除了有主人家生活使用的大厅和房间之外，两堵围墙之



陈凤銮与妻子一家



间，还有一处专为建筑工人准备的二层小楼。别小看这工匠们的宿舍小楼，这栋小楼不仅不简陋，还有着精致的木长廊和造型考究的景观窗。工人房的讲究，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庆丰庄建造的时间之久和主人家对建筑的重视。据说建造时期，陈尧榕曾亲自监工，事无巨细，一一过问。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不仅关心庄寨的工程，也关心工人们“有无吃饱饭”“吃的是不是大米饭”“有没有吃够三碗大米饭”……

庄寨里永远不缺故事，庆丰庄也一样——

放牛娃成为百万富翁

庆丰庄在当地被誉为福建版的“乔家大院”。建庄先祖之一陈尧榕，最早是一个放牛郎。村民见陈家穷，对他们父子叹息道：“你

们这样一辈子放牛，以后儿子怕也只能去放牛了。”就是这一句话，让他们深受触动。当晚，一夜难眠的陈尧榕推醒熟睡中的妻子，说要去做生意。两人商量了大半夜，最后决定由老婆出面，回娘家（今明灯村）借了一点本钱。陈尧榕是个生意能手，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向老岳父借钱，收购了几十担茶桔饼，雇佣两只“南港船”运往福州贩卖。谁料天有不测风云，船只在路上先后倾覆，创业起步便赔得血本无归。陈尧榕信守承诺，为了偿还货款，他咬牙卖掉了家里所有的田地。岳父见女婿实在，又帮他借了一些银两。

后来陈家利用永泰当地的特产，开始与一位福州人合伙做李干生意。陈尧榕之后所有的成功仅靠两个字——诚信。有一次结账后回家，他发现合伙人给自己多算了银两，第二天急忙赶回福州，将银两奉还。合伙人拿出账单一核，果然算错了，于是陈尧榕诚信的美名逐渐在生意场上传开。凭着诚信，他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李干免税出口到香港，在福州上下杭开了“太昌”“义昌”两家大商号。诚信经商声名远播之后，在上世纪30年代，陈氏家族的李干生意越做越大。陈尧榕共有五个儿子，有做账房先生的、有做民团团长的、还有留学日本的。



坂中街

“不讲风水”的庄寨

环顾庄寨四周，便会觉得这座庄寨有些不同寻常。它被称为“不讲风水”的庄寨，因为它没有遵循传统民居“背山面水”的风水讲究，朝向任性大胆，庄前是一马平川的广阔田野，庄后是流淌着的大樟溪，可见庄寨主人对大樟溪的热爱。除了热爱，还有一个陈家人流传至今的原因：当年陈尧榕与父亲准备开工建寨之时，也曾考虑过寨子建在哪里好呢？椿阳村周边群山环绕，多股土匪啸居山林，而乡民世代居住在大樟河流域形成的肥沃平原上，一旦土匪来侵扰，转移上山肯定来不及，而平原地带又无险可守。陈尧榕反复勘察地形后，决定在坂中洋建寨，这里背倚大樟溪，无腹背受敌之忧；寨前则是一片田野，行动方便，一旦土匪骚扰，乡民可迅速转入寨中。而且寨前视野开阔，稍有风吹草动，庄丁就能迅速发现目标，予以狙杀。

其实，最好的风水在心里，诚信就是陈家的风水。

百年前的高大上朋友圈

来过这座庄寨的朋友都会看到，庄寨大厅中央的正上方高悬着三块清代匾额，其赠予者全是晚清重要的国家重臣，身份非凡。一块是光绪年间福建提督陈学芬赠予庄寨主人陈如坤



正厅上悬挂着几块匾额，送匾者分别为萨镇冰、周荫人、陈学芬



的，写着“椿萱并茂”，当年福建提督，类似于今日分管教育的副省长。另两块是题给“大奎先生（即陈尧榕）”的寿匾。一块是民国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赠予陈尧榕的，周荫人是孙传芳的同门同学。另一块尤为珍贵，是时任民国海军司令萨镇冰赠予陈尧榕的。可见陈氏族人恪守信义、品行服人，并以此推动家族生意越做越大、声名远扬。陈氏家族鼎盛时期，曾在福州上下杭开设两大商号，一度将自家的李干出口至东南亚等海内外各地。

庄寨里的跨国压寨夫人

庆丰庄里有一张锈迹斑驳的铁架床，这在当年可是稀罕的西洋物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一个玻璃相框，上面有一张微微发黄的黑白全家照，照片左侧的黑衣女子面容端庄，双手微扣；右侧男子长袍黑褂，头戴瓜皮帽，拱手而坐，中间站立一男一女两名幼童。

你很难相信，这座山间的偏僻古寨竟与日本有关系？这段浪漫的跨国爱情源自庄寨主人陈尧榕的小儿子陈凤銮早年远渡日本留学。陈凤銮在早稻田大学留学三年，品学兼优，亦子芳心暗许。随后陈凤銮就和亦子相恋并结发为妻，他们回到这座古寨生活。亦子的家世显赫，父亲是当时的将军，对这个博学谦逊的中国小伙很满意，陪嫁的物品自然不少。亦子嫁到中国时，将军父亲特地购置了一张漂亮的铁架床作为陪嫁，运到中国，再雇人肩挑背扛送进庆丰庄。

至今，寨里还保留着当年样式时髦的一些物件和“全家福”等。

华林寺里千年莲

◇张 茜

这世上，物与物之间微妙地存在着关联，犹如我与华林寺。那年到福州，定居华林路，华林路因华林寺而得名。后来我写作常在《福建日报》发稿，福建日报社就在华林寺近前。我的工作单位也在华林寺后面。20个春秋，在华林路走来走去，华林寺始终在路旁注视陪伴着我，僧红围墙，僧红山门，奇巧的叠叠斗拱，弯向苍穹的翘脚以及挂在翘脚上的悠悠金刚铃。

好些年前，不知何因，我曾进去过华林寺，记得认真默读了里面的相关文字。之后又带孩子去了一趟，似乎是想让他记住那古老而清丽的建筑，他长大后学了建筑设计，不知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关联。最近，华林寺总在脑海里浮现，僧红如炬，敦促似地感召着我。



华林寺

我恭敬前去，朝圣般，阳光绚丽如花。山门宏伟，屋脊高耸，浑圆驼峰两端缩成榫头，衔接卯口，生成联合力量。举头仰望那浑圆，好似胀鼓鼓两个面袋，民以食为天，我这凡夫俗子的想象。立柱两头收杀，为梭形，外表雅致优美，内里有着超越等截面柱的稳定性能。构件肥硕，形式清简的山门，令人分明感受到唐颜的繁华、宋朝的诗意——唐风宋韵。

华林寺建于北宋花德二年(964)，彼时吴越国王钱氏割据闽浙等地，天下纷乱，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福州郡守鲍修让为祈求国境安宁，拆除闽王宫殿，用其材料在屏山南麓建造华林寺。不由想起《礼记·月令》：“(季夏之月)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别看重的祈福活动，并不只是为了一种简单的仪式感，而是真的具有很多正向能量和现实影响力。祈福是华夏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赋予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祝愿。通过各种祈福活动，可以帮助更多人将正念、正信、正能量的行为意识，融合运用到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学会随时清除心智障碍，实现思想转换，改变行为方式，最终成功获得幸福人生！

华林寺初名“越山吉祥禅院”宋高宗赵构赐御书：“越山”“环峰”。明正统九年(1444)，御赐匾额“华林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寺院扩

大，并入附近的罗汉院、越王庵等，后又增建御书阁、环峰亭、绝学寮、胜会亭等诸多胜景。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重建大殿、天王殿、山门、廊庑、客堂、僧舍等。整座寺院，静穆典雅，蔚为大观，香火鼎盛。历经一千多个春秋洗礼，而今大殿身旁白石壁相围的鱼池般的巨型焚香炉，依然完好，形如莲花。“池”沿漆黑如墨，染至内壁。遥想远年，法磬声声，信众如织，般若般若。

其时，华林寺一带林木蓊郁，梅荔满园，馆舍清幽，四季如画，气候宜人。“宝刹越城边，千花绣佛前”，人们郊游、进香，净心祈福。

十个世纪过去，风风雨雨，华林寺大殿屹立如初，恍若一座庞大木制模型，置于碧空丽日下。我心怀敬畏，屏声静气，轻移脚步，逡进游廊。一棵枯树映入眼帘，它以残缺不堪的身姿立于园林，一如达摩修行，揭示万物经受的磨练，返回原本。我试图猜测它的年龄，当然徒劳，多少年龄又何妨？揭谛揭谛，精神与日月同在。一棵大香樟，树冠飘逸，潇潇洒洒，枝叶葱笼，庇荫半条廊道。枝枝杈杈，道道树皮沟壑里，滋生出一方树上灌丛。岩姜蕨自带孢片，那孢片和枯黄树叶一模一样，以假乱真，一片或几片，贴敷于香樟树皮沟里，护佑孢子成蕨。棵棵青蕨犹如小树，汇集成林。耳畔隐隐传来苏轼声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辛弃疾吟唱：“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

游廊尽头接着几间廊室，古朴木门，半合半开。里边陈设残损木构件，颜色泛黑，显然来自闽王宫殿，年岁超过一千。抬步跨过门槛，融入那个时代。一朵木雕莲花，色泽如咖，静静盛开，片片花瓣，厚实有力，绽放生气，从古至今，指引人们解脱尘世，抵达净土。

我终于抵达华林寺大殿，这通体没有一根铁钉的神圣之地。这华夏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诠释着宇宙真谛。

华林寺大殿，位居华林寺主轴线的中心位置。大殿虽经明、清两朝多次重修，增建周廊下檐，但大殿主要构件(梁架斗拱等)仍为初建时的



牌匾

原物，保存唐宋建筑风格，是中国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大殿主体构架为八架椽屋，前后乳袱用四柱，彻上露明造。为了容纳内槽佛像的高度，内柱高过檐柱2.62米，属厅堂型构架，但其内柱柱头上又有高度近3米的枋，与四周檐柱上三层首尾相接，形成一个不在同一标高上的铺作层。因此，它的构架是一种特殊的厅堂型构架。殿内构件造型优美，使大殿在古朴雄浑中显出南方建筑特有的轻快秀丽格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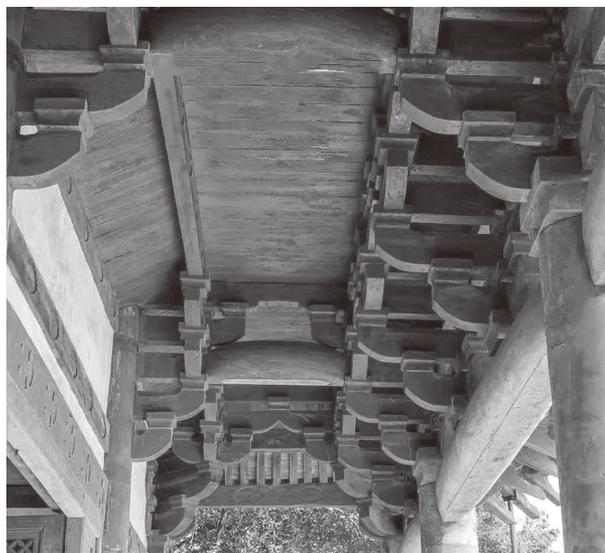
华林寺大殿的四檐及内柱头上均施斗拱，斗拱组合严谨、简洁。外檐铺作为七铺作双抄三下昂重拱造，柱头及补间铺作均为七铺作双抄双下昂重拱偷心造，斗底作皿板形，用材硕大，数量依需增减，大量运用插拱。除转角铺作出跳用足材外，其余均用单材。梁、袱、前檐阑额均为月梁造，以粗大原木制成，断面近圆形，额上不施普柏坊，前檐补间铺作栌斗直接坐于阑额上。18根丰盈粗拙的梁柱呈梭形状，其中四根内柱高7.2米，巍峨挺拔不对曲线形成自由流畅轮廓的云形驼峰在梁袱上的运用，动态盎然。昂嘴曲线砍作三段，沿曲线轮廓微刻线脚一道，活泼自然。装饰构件与浅雕团窠、彩绘，巧妙结合，既雅致又粗犷，彰显独特魅力，为国内罕见。脊檩、前廊

东西和后檐乳袱下皮，保留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道光四年(1824)、同治十三年(1874)等重修纪年题刻，以及“法轮常转”“国界安宁”“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等宋代以来吉祥语题刻，颇为珍贵。

1958年国家文物普查时，华林寺一度被定为南宋建筑，其后几经考察，又做了全面测绘及碳14鉴定，确认其风格型制颇具隋唐遗风，建造年代不会晚于五代末北宋初。这与宋代的《三山志》等史书关于“吴越国拥有福州时期，郡守鲍修让于钱氏十八年(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拆除五代闽国宫殿等建筑用于修建华林寺等佛庙”的记载相吻合。

因华林寺创建于宋朝初年，从它的构架形式，不但可以看出北宋建筑特点，还可上窥至前代建筑风格。更由于长江以南地区多雨、潮湿，古代木构建筑难以保留，而使华林寺大殿尤为珍贵，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珍贵实物资料，入选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至1990年，国家拨专款对华林寺进行修缮。大殿落架整修。顺势整体向东南迁移14.6米、向南迁移8.3米，脱离原来湿洼地修缮，除了修复大殿外，还增建了山门、配殿、两廊及四周围墙等附属建筑，并建立了华林寺文物保护所，大殿被辟为古代建筑博物馆。



华林寺木构件



华林寺木构件

驻足大殿，寸寸蓖梳瞻仰，身心舒缓，宁静致远。

殿前一棵古桑，生机勃勃，枝叶披垂及地，使人看清枝上花苞朵朵，密如繁星。这寓意原始生命、生殖力，象征甜涩忧伤爱情，象征死亡与悲伤的树木，承载着古人浓厚的家园情怀以及对永恒岁月的追求。

桑树，因其长寿、生命力顽强，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它神话而诗意的想象。《礼记·内则》“国君世子生，告于君……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向天地四方”。《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诗经》“唯桑与梓，必恭必敬”。《史记》“楚平王以其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工，乃大怒，至于两回举兵相伐”。《墨子·明鬼》“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也”。辛弃疾“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岗细草鸣黄犊，斜寒林日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一棵桑树，引出厚重历史画卷，引出黎民百姓家国情怀，引出宋代福州郡守吴修让建造华林寺，祈福国泰民安、社稷强盛的美好愿景。

一朵木雕莲花，一棵古桑，一座没有一根铁钉的千年华林寺。

蔡襄：飞毫划峭壁 灵源为之开

◇蔡林

“灵源洞”并非“洞”，而是一道从北向南断崖下挫逐渐开裂的山洞。“灵源洞者，四面皆石壁，中裂一洞，深可二丈许，其端有若洞者，故以洞名。”（元-吴海《游鼓山记》）。裂洞位于鼓山涌泉寺东边的，因造山运动形成的山体断层，如刀削斧劈出大小崖面近乎平整的石屏，错落于山洞。山洞“两崖崇墉，通以石梁”，千万年前大自然为文人墨客在山林深处备下盛大的摩崖客厅，虚位以待很久了。

终于，中国文化历史丰盛的宋朝来临了。庆历六年（1046）孟秋8日，在“灵源洞”的东边，一块三米多高的岩壁西向而立，24个端庄浑厚的鲁公体榜书，“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孟秋八日游灵源洞”镌刻其上，气贯如虹。这是至今发现年代最久辨识度最高的鼓山摩崖石刻，书写者乃碑刻四人之一的蔡君谟，即宋代名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

宋已降，到“灵源洞”的文人墨客或崖壁书丹或翰墨起稿而镌刻石上，“摩崖会客厅”石刻挤挤挨挨交错而立，篆、草、隶、楷随崖形呈现，叙游记、明心志、赋诗情或留言唱和……巨细交错，到明代已一席难求，谢肇淛在《鼓山志》中遗憾到“殆无寸隙”。

蔡襄是幸运的，早早地坐上“客厅”主座上。明代著名藏书家、徐兴公盛赞到：“君谟灵源洞题名，笔划庄重，鲁公体，大胜《洛阳桥记》。鼓山

题刻，宋代为盛，而书法古雅绝伦以君谟为第一。又书‘忘归石’、‘国师岩’于洞左，径三尺许，皆奇品也。”（《榕阴新检》）文中“大胜《洛阳桥记》”指的是蔡襄主持建造泉州洛阳桥并留下被誉为文、书、镌“三绝”的《万安桥记》。“大胜”乃治学严谨的徐公毫不掩饰地对鼓山灵源洞蔡君谟书刻的赞美之词。

蔡襄两知福州，游鼓山留刻书这一年是他第一次知福州任上的第二年。庆历五年（1045）三月蔡襄回乡任官，过程颇费周折。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执掌“新政”，三、四月间欧阳修、蔡襄等仁宗亲点的“京城四谏”，意气风发为改革谏言、弹劾宰相。反对派从弹劾范仲淹关系密切的滕宗谅（滕子京）贪污公使钱成功反扑，在变革派和反对派之间的激烈的矛盾中，仁宗犹豫了。执政者范仲淹请求外放，仁宗获准。庆历四年九月欧阳修因所谓“盗甥案”被贬徐州，蔡襄忙呈《乞留欧阳修札子二道》予以挽留，仁宗不予理会。随之，改革者接二连三陆续离散。蔡襄自觉独留无意，决意与欧阳修、范仲淹同进退，可是仁宗不予准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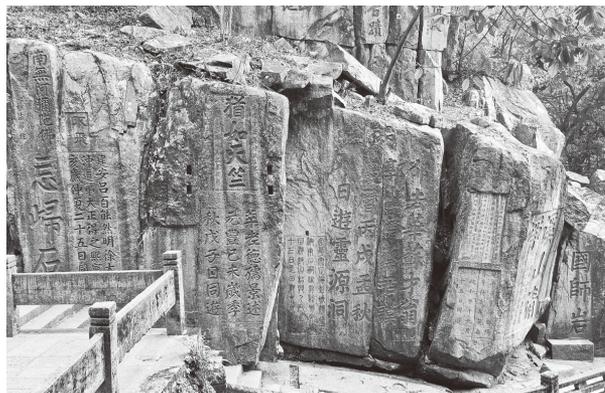
相传，蔡襄为能回乡任职动了点小脑筋，他用蜂蜜书写在御花园平时陪仁宗散步途中的树干上，蚂蚁吮蜜组成字迹，仁宗经过时不由止步，喃喃辨识到“蔡襄、蔡襄，回转家乡”，一旁的蔡襄即刻跪拜谢恩，并告知母亲年迈，请求外放

回乡。仁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得核准。这仅是故事而已，然庆历四年十月朝廷颁布诏令“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已酉、授右正言，知福州。”仁宗由不许到准了，其间蔡襄一定是做了仁宗的工作。史书载，宋仁宗对蔡襄偏爱有加，亲以飞白的笔法书“君谟”赠与，堂堂皇上不以“名”称臣子，而像“灵源洞”碑刻上的友人以“字”称蔡君谟。

诏令发了，可是还摆脱不了宰相杜衍的挽留，直至杜衍因故罢相，蔡襄终于庆历五（1055）年春随了知福州的愿，官虽不大，但“惟予守长乐，幸就禄养丰”。（蔡襄《读乐天閒居篇》）福州任上的“禄养丰”足以让他接来父母举家在福州团圆。

卯足了劲做个好官的蔡襄，自娘胎其母亲卢氏就在洛阳江畔为他许下报天地山川之恩的职业取向。这是莆仙泉乡间流传甚广的一则泉州洛阳桥的故事：1012年立春时节，在惠安往泉州的洛阳江中，渡船忽遇大浪，就在船即将倾覆之时，天籁一声“蔡学士在船上……”，遂即风平浪静，卢氏和乡亲一船人平安到岸。卢氏环视周遭均是黔首羸弱之人，未有读书者。胎儿动了，莫非吾儿？蔡襄祖上于浙江迁仙游，卢氏嫁入蔡家时，已繁衍了五代，虽也家贫子读书，却世代务农。母亲暗喜，许下诺言，“若生儿必读书为官，在此修一座桥。”蔡襄就这样在预设中来到人间。

蔡襄是幸运的，自幼启蒙于父母，更多得益于书香门第出身的母亲卢氏。卢氏以门前的青松



鼓山灵源洞摩崖石刻蔡襄“忘归石”、“邵去华……”、“国师岩”

不畏严寒顽强向上为孩子立德。蔡襄的外公卢仁学识渊博却累举不中，放弃科举后，卢仁在老家惠安涂岭伏虎岩清泉石室设馆教学。女儿给他带来两位俊朗的小外甥成了他的希望，五岁的蔡襄和三岁的弟弟蔡高与年龄相仿的小舅舅一起受通经史并富有科举经验的外公耳提面授。明·嘉庆《惠安县志》载：“伏虎岩在昆山南，（北）宋·祥符（1003—1016年）中僧道养隐此……”“其下蔡忠惠襄母卢氏家焉，襄尝读书于此。”

九岁时蔡襄和弟弟回枫亭进乡序就读于会心学堂，幸运再次落在12岁的蔡襄及弟弟身上。当年任仙游县尉的凌景阳到枫亭办事，兄弟俩在寺院里琅琅的书声吸引了他，凌景阳慧眼识珠将两兄弟收入县学，进入科考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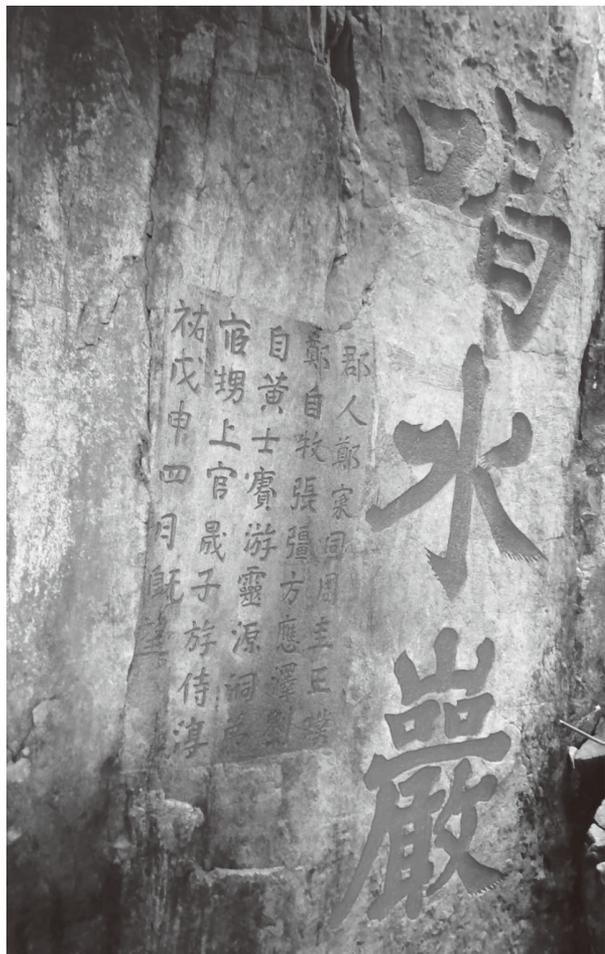
蔡襄这代人亦是有幸的，宋朝科举制度在唐制上打破“工商杂类”不得报考又不限考生所属乡土籍贯，应试者“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有才学者均可报考。六年后，适逢开封府府试向全国开放。不满18岁的蔡襄领着小两岁的弟弟徒步北上，翻山越岭赴千里京都科考。蔡襄不负众望于天圣七年（1029）秋闱府试斩获第一，天圣八年（1030）刚满18岁的蔡襄于春闱殿试获第十名。

仁宗天圣年间人才济济，据记载“天圣五年丁卯科，前三甲是王尧臣、韩琦、赵概，以下有文彦博、包拯等197人”；天圣八年包括蔡襄、欧阳修等侯官者113名。“仁宗养士，三代受益”。大宋朝官吏分立，选拔的士都归吏部管理，需要下地方历练，大多十年寒窗又十年侯官。宋代史上如雷贯耳的文官团队流世千古并不完全因品阶高，而是有理想有抱负，博古通今，善书法精诗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蔡襄、苏轼……均以天下为己任，居庙堂、处江湖忧君忧民，励志改革而闻名天下。“庆历新政”仅一年零四个月就夭折了，他们的精神不朽，《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外放退隐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走向地方，成就了我国帝王朝最好的仁宗时代。

34岁的蔡襄知福州，依然不忘践行着庆历

新政。“正月二十七日，劝农使厅落成，题名梁间。”“延揽名士周希孟等办学，亲至州学讲解经术。”率“海滨四先生”为福州培养真才实学的人才。“提倡看病就医，将医病药方《太平圣惠方》刻碑公布于众，并创办医学堂。”

蔡襄上任次年六月逢福州大旱，当人类面对无法抗拒的自然灾难时，选择求助于神灵。农家出身的“父母官”蔡襄体察民意，直面众神，作《祭神文》（《钦定四库全书端明集卷三十六》）领着百姓出东门前往鼓山西麓的鳝溪祈雨。“善溪……山峡间有二潭，下潭广六丈，深不可计。昔闽粤王郢三子有勇力射中大鳝于此潭……土人因为立庙，号白马三郎”（《三山志》）。建于唐末的善溪白马王庙是福州最早的古庙之一，民众信之。《钦定四库全书-端明集卷三十六》蔡襄祭神文曰，鳝溪润德灵府感应王：庆历中，某（襄）



鼓山灵源洞喝水岩

为郡守，夏旱不雨，民忧失业。时诣庙下，以山川之职，致请于神。五鼓东行，阴云四起。奠拜既兴，澍雨成潦。农田沾洽，人有余食。乃新王宫，以答灵贶。今将卜年，复兴符印。某（襄）之事神，不敢少怠。秋田干裂，百姓聚首，有望于神。神其救职，活吾生齿，无弃前功，以贻神羞。

祭罢“五鼓东行，阴云四起。奠拜既兴，澍雨成潦。农田沾洽，人有余食。”求得大雨后，“某（襄）之事神不敢少怠”乃命知县贾大冲新修神庙，贻神珍羞，“以答灵贶”。

这年大旱解除，民有余量的丰收季七月，蔡襄与好友相约陪同上司游心仪许久的鼓山，留下了“邵去华……”摩崖石刻。同时，蔡襄还留下一首《游鼓山灵源洞》五言诗，诗中可读到更多的信息。

《游鼓山灵源洞》诗曰：

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
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
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
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
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
飞毫划峭壁，势力勿惊触。
扪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
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
况逢肥遯人，性尚自幽独。
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

开篇“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诗人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黎明时分就从郡楼远眺东边十里外紫气意蕴的青山，旭日撕破天幕，山间雾霭折射出七色光彩直逼入人眼。诗人从闽江边“乘舟逐早潮”来到鼓山前。

“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上山了，云层深厚遮障了前进的路，树木茂密山谷间幽暗迷蒙。出山谷听得农家鸡鸣声扰乱寺院诵经的木鱼声声，看眼前庙宇屋顶在朗朗日光下金光闪闪。

“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来到灵源洞，坐看泉水注入石臼，泉声轻柔透出竹林，身心清爽。眼前一方方绝壁，如大地上悬挂的书轴，作

为宋四大书法家的蔡襄忍不住选了最心仪的一方岩崖“飞毫划峭壁”。从诗中有力的“划”字仿佛看到风华正茂的蔡襄飞落着管城子在崖壁上丹书。近千年后人们来到崖壁下直面一尺见方、纵四列、横六字端庄敦厚的颜体榜书，那“势力勿惊触”气贯如虹的书刻穿越而来，浑然于天地间。

“扞萝跻上峰，大空延眺瞩。”此时，书法家身份一转成为游人，握着藤萝登上山峰，天空辽阔放眼远眺只见：“孤青浮海山，长白挂天瀑。”如黛孤山在云中时隐时现，那山挂着一道从天而降的瀑布。

物我两忘之时，“况逢肥遯人，性尚自幽独。”路上邂逅退隐山野的人，情绪拉被回现实，羡慕起高尚自在的归隐生活。

“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夕阳再一次照到郡城里，久留也未能尽兴。

这句的“复”字透出一个信息，蔡襄至少在鼓山见过两次夕阳向城。也就是说蔡襄留宿鼓山，虽然诗中并没有透露同游者是否宿鼓山，但崖刻榜书中的第一位“邵去华……”，一首题为《宿鼓山寺》的诗可为旁证。

邵去华大名叫邵饰，是江苏丹阳人，他曾任“福州福清尉”，这年在福建转运使任上。

《宿鼓山寺》（宋·邵饰）：

玉磬声流夜阒寥，天风吹送海门涛。鹤来松顶云归后，人倚阑干月正高。

诗中描写鼓山之夜：诗人午夜听着天风吹送着山下闽江入海口涛声（兴奋难眠走出禅房）倚着栏杆望天幕，云已去，只有月儿高挂，银光下野鹤归来栖息于松树顶……写景中流露出对鼓山景色的喜爱，与蔡襄的“况逢肥遯人，性尚自幽独。”意趣相投，都向往大自然的幽居生活。

《宿鼓山寺》写于庆历丙戌秋，邵去华在时为福建文臣提刑苏才翁、福建武臣提刑郭世济以及福州父母官蔡君谟的陪同下游览鼓山。他们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还是诗书好友。蔡知州尽地主之谊陪同上司游览，并在灵源洞如此隐蔽有情趣的幽境里留下他们的友谊见证。他们的行程在

蔡襄的《游鼓山灵源洞》诗中可知：从城里郡楼望东边而起，乘舟、上山、划峭壁、扞萝登顶、观孤青天瀑、逢肥遯人更不免茶叙一番，知归隐之事令人羡慕。这么丰富的游历，哪怕今日也难以做到。当年上一次鼓山更是不易，夜宿山中寺院，即可省却劳役之苦，又能沐天风观明月，何乐不为？那崖刻几乎同步于作诗抒怀之时，应该不是巧合。980年前的农历七月八日前后，他们一定是留宿鼓山，甚至不只一夜。

他们留宿鼓山寺那夜，想必听到涌泉寺开山祖师神晏的故事。

唐五代“闽王奏立鼓山涌泉禅寺，具百戏香花诣雪峰，请师主持，仍奏赐紫衣，号定慧大师。”（《鼓山志卷三》）相比闽王为定慧大师神晏奏立的鼓山涌泉禅寺，神晏更喜在灵源洞诵经。据说，灵源洞不似今日之干涸，千年前曾有欢快的泉流，神晏于此诵经思辨，嘈杂水声令其心烦，便喝令“顽石点头”泉水改道，即灵源裂岩北端泉流处留下“喝水岩”的缘故。神晏常在崖下一块石头上打坐诵经冥想，闽王到鼓山涌泉禅寺寻神晏不遇，得知在灵源洞修炼，御驾灵源洞，可神晏自顾诵经，诵毕方才参见，闽王甚是不爽，于是王与禅师一阵智慧较量，“后闽王延钩加号广辩圆觉兴圣国师”（《鼓山志卷三》）。

“西景复向城”的这天，也或是邵去华宿鼓山寺后的一天，蔡襄在“灵源洞”神晏国师坐禅处2米多的岩壁上恭敬地以端明体书下“国师岩”。书毕，他倚在石桥边一块岩壁下望日西斜，忽觉“淹留未云足”，还有许多公务要处理，居然在此忘归，于是飞毫再划“忘归石”后念念不舍下山。

在虚位以待的崖壁上，“忘归石”与“国师岩”一左一右地隔崖伴着“邵去华……”，三石完美的组合定位在山涧空谷，灵源洞摩崖石刻艺术的高度为之而开。近千年后的今天，踏入“灵源深处”，隔涧下探从北往南“忘归石”、“邵去华……”、“国师岩”这三块“皆奇品”的摩崖题刻端立在熙熙攘攘的灵源洞摩崖客厅中，依然古雅绝伦，如他的人品、官品。

名门绣手曾明

◇林丽钦

旧时福州的刺绣简称榕绣，自宋以来，已有千年历史，曾作为贡品辉煌一时。1915年2月，美国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一幅来自福州的绣品《骏马图》在博览会上脱颖而出，荣获金奖。

将榕绣带上技术巅峰和世界舞台的，是一位来自名门望族的才女——曾明。

曾明（1887-1973），字懿文，号开珍。光绪十三年（1887）生于福州城内东街“五子登科”曾宅。曾氏为福州名门望族，一门四辈连出进士。其祖父曾宗彦曾任清廷江南道监察御史；嫡堂叔曾毓隽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嫡堂叔曾以鼎曾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江防副总司令；父亲曾以澍曾为浙江省学台衙门巡捕。

曾明自幼随祖父在北京生活12年，后又随父母居杭州数年，终回榕定居。光绪三十三年（1907），曾明考入由陈宝琛夫人王寿眉任监督的福建女子职业学堂刺绣班。宣统元年（1909）6月，23岁的曾明作为首届学生从学校毕业。

同年，曾明嫁给表哥庄昶，但第二年庄昶病逝。24岁的曾明带着一个遗腹女守寡终身。

毕业后曾明留校任教，于1913年成为正式教员。任教期间，她专心钻研刺绣工艺，并师从张维凡、张凌波、陈子奋等名画师学习画艺，同时

吸收西洋画特点，独创仿真彩绒绣法。

1912年，她以当时著名画家张维凡的一幅名画为蓝本，结合精妙的刺绣技术，用比头发丝还细的数种彩色丝线，在一幅高34厘米，长50厘米的绣布上再现骏马奔腾跳跃的场景。1914年3月，历时两年的榕绣精品《骏马图》诞生。

画作展出时，愿意以重金求购者甚众，都被曾明拒绝。

晚年曾明在福州开元寺遁入空门，也不再刺绣。“文革”期间，红卫兵常入寺“破四旧”，她将骏马图从镜框中取下，折叠成块，缝入杂布袋中随身携带。为了保护绣品，她听从外孙李厚威建议，将骏马图捐献给国家。他让外孙写信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并在博物院回信函询是否需要补偿时选择了无偿捐献。生活贫困、全赖亲戚资助的曾明，变卖随身多年的手表得以凑齐将绣品寄往北京的邮资。

1973年6月25日，了却心事的曾明病逝于福州，享年87岁。

这位生于名门，逝于空门的大家才女，让榕绣技艺惊艳世人，却仅留下两幅作品。一幅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草书绣面，一幅是蜚声海外的《骏马图》。所幸它们都得到安稳的归宿，分别被收藏于福州市文物管理局和北京故宫博物院。

从台江走出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侯德榜

◇石丽钦

在台江区尤溪洲桥东边，现代建筑林立中，静静地矗立一座古韵风貌的木构古厝，这就是侯德榜故居，现位于义洲德榜路1号。这里原为闽侯县坡尾乡，是一片花红柳绿、“平岗细草鸣黄犊”的闽江边田园风光。侯德榜曾在这里出生、学习、牧牛、耕作，留下了无数的足迹。古厝为清末建筑，木墙灰壁黛瓦，坐北朝南，单层，总占地面积667平方米，由大厅、厢房、披榭组成，面阔五间，进深五柱，穿斗式木构架，双坡顶；披榭面阔2间，悬山顶。总建筑无台基，楞木、柱子直接架设在礅墩上，属低洼地带半高脚木屋一类，系典型的清代福州闽江畔古民居。1992年，侯德榜故居列入福州市名人故居加以挂牌保护。2009年，列入第七批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在台江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关心和市城乡建总的大力支持下，筹集资金274万元，予以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现作为侯德榜生前事迹展示地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从小励志 科学救国

侯德榜（1890—1974），名启荣，字致本，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是世界制碱业的权威。侯德榜祖上笃清，在明朝嘉靖年间，由闽南漳浦县迁居永泰县大樟溪畔葛岭镇九老村；清朝后期，侯笃清的第三个儿子有支子孙，又迁到闽县南台义洲坡尾乡。侯



德榜1890年8月9日生于义洲坡尾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为侯笃清第13代裔孙。侯家主要以务农为业，由于家庭贫困，侯德榜在乡里学了两年私塾便辍学回家，帮着父母在田间干活，养鸡鸭、放牛羊，农村什么活计侯德榜都做过，尝过生活的艰辛。

侯德榜从小好学不倦，为了不误农活，放牛带着书，在田里脚踏水车也诵读不已。一次，祖父侯昌霖找小德榜，远远望见他趴在村外的水车上车水，双肘往横木上一撑，脚下踩着水轮，一边车水，一边自学从姑妈家借来的《古文观止》。经年累月，侯德榜的双肘都起了趺子。“挂车攻读”的故事从此传为佳话。祖父侯昌霖读了几年私熟斋书，是位文化人，他见孙子读书这么用功，很是欣慰，特别重视对他的教育和培养。“德榜”

名字就是他爷爷侯昌霖起的，寓意是“厚德载物，榜上留名”。启是侯氏辈份，“荣”也是好字，启荣，就是开始繁荣的意思。侯昌霖还要倡导以德致本，自然是寄望于孙子不仅求取功名而且品德高尚。侯德榜多次说过，爷爷是他的启蒙老师，是爷爷让他树立了“读书要勤奋，办事要认真，为人要厚道，一生要爱国”的思想理念。

发现侯德榜具有读书天分的，还有他姑妈。1902年隆冬季节的一天，福州下了一场多年不见的小雪，天气非常冷，侯德榜的父亲叫他前往城里姑妈家去办一件事情。侯德榜冒着风雪，来到了姑妈家，姑妈叫他到阁楼去取一件物品，时间过了很久，快要到吃午餐的时间了，但姑妈还没见侄儿下楼，这是怎么回事？姑妈上楼一看，只见侯德榜靠在柱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原来，侯德榜在阁楼上一个角落，发现了几本旧书籍，迫不及待地翻开来看，越看越入迷，竟然把姑妈交办的事情给忘了。他的姑妈认为侄儿是位难得奇才，将来必有作为，应该倾全家之力对侯德榜进行培养，让侄儿有朝一日走出台江，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1903年，侯德榜13岁，在姑妈资助下，进入福州英华书院就读。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和钻研精神，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兴趣浓厚，博览群书，专业功底一步一台阶。学习三年后，又被保送到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1910年毕业后，被派往英资津浦铁路符离集车站当工程练习生。学习期间，他看到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傲慢与欺压；看到了无数中国苦力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他们鞭打、驱使；看到了腐败的清王朝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下任人宰割。侯德榜还从《天演论》中，明白了弱肉强食的道理；在《海国图志》中，读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为此，侯德榜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1911年，他考入北京清华留学生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13年，以十门功课共1000分的特优成绩保送赴美公费留学。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柏拉图专科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化学工程。留学八年，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

博士学位。1921年，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法》，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侯德榜被接纳为美国sigmaxi科学会会员和美国philambdaupsilon化学会会员。

首创纯碱 与世共享

18世纪初，我国所需纯碱全部依赖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亚交通梗阻，碱价骤涨，以纯碱为原料的许多民族工业被卡住脖子。1917年，爱国实业家、化学家范旭东先生，在天津塘沽创办了永利碱业公司。那时，世界上的碱厂，已采用新兴的苏尔维制碱法，制碱技术被英帝国化学工业公司所垄断。范旭东先生创办的永利塘沽碱厂，苦于没有专业人才，许多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便写信邀请当时正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侯德榜回国来永利工作。信里详细讲述了纯碱制造对于工业、食品行业和百姓日常生活重要性；讲述了英国卜内门公司对中国纯碱市场的垄断；讲述了国际索尔维集团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以及处于天津塘沽永利制碱厂条件和工业救国目标，恳请侯德榜回国与他一起，共同发展祖国制碱事业。

侯德榜在邀请信里看到了以“实业救国，科



侯德榜（中）在工厂与科研人员研讨



毛主席接见侯德榜等科学家

技兴国”为已任范旭东的诚意；看到了祖国发展碱业的迫切要求；看到了眼光远大范旭东的家国情怀，为发展民族制碱工业，侯德榜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于1921年回国，应聘为永利塘沽碱厂总工程师。从此，他便一心扑在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研究和工艺改进、设备安装上。从调换碳酸化塔的水管、另行设计新分解炉起，到多次加强冷却设备，改造滤碱机和石灰窑，以及平时要处理种种临时事故，他总是在紧张而又艰苦的劳动中，在探索技术的征途上，几经寒暑，留下一个又一个深深的脚印，终于逐步摸索到实施苏尔维制碱的各项生产技术。范旭东称赞他“奋不顾身、寝馈于工厂，从事拼命”。1924年8月13日，他用苏尔维法第一次试制出产品。但红黑色相间，质次量少。侯德榜没有气馁，再接再厉。经过调试改装，1926年重新开工试制，结果产品洁白精良。侯德榜称之为“纯碱”，以志不同于“洋碱”。1926年8月，以“红三角”命名的纯碱，参加了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荣获金质奖，并获得“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评语。到1929年亚洲的第一个大碱一塘沽碱厂生产走上正轨时，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及东南亚各国。中国化学工业的基础之一制碱工业由此诞生。

这是中国的纯碱，这是中国人志气的结晶。当时苏尔维制碱法的技术还没有公开，侯德榜完全可以申请专利而富甲天下，但他以为他的技术

属于全世界人民，应该造福于全人类，决不能把科学技术作为谋求个人财富的工具。他要把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无偿地公诸于世。1932年，以侯德榜署名的《制碱》一书在美国出版了。全世界人民宛如在沙漠中突然找到了甘甜的泉水，因为全世界的玻璃、肥皂、纸张、花布以及许多食品和药品工业，都需要纯碱这把金锁匙。全世界人民都翘着大拇指称赞：“中国，OK！”1934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赠予侯德榜科学博士学位。1935年，中国工程学会奖给侯德榜该会的第一枚名誉金牌。

再展一翼 酸碱齐飞

侯德榜把兴办民族化学工业比作千里之“行”。他认为制碱的成功只迈出左脚，写出一个“彳”（音chi）字；还应迈出右脚，写出“亍”（音chu）字，这就是制酸。那时，硫酸铵化肥已在我国使用，每年进口几十万吨，仅这一项国家一年就得外流银元二千万。为此，永利遂决定自办硫酸铵厂，这厂就建在南京附近、长江岸边的卸甲甸。据说这地方是战国时期楚霸王项羽卸甲的地方。但侯德榜作为厂长兼总工程师，他不能卸甲，而是全副武装披甲挂帅，指挥了又一场艰苦卓绝的创建化学工业基地的大搏斗。

1934年4月8日，侯德榜率技术人员赴美考察。他用两年时间，根据国内工业环境的特点，将原来委托外国公司设计的图纸加以审查，又将其中700多份设计不尽合理的图纸重新绘制。在采购设备方面，他精打细算，凡是能保证质量自己动手解决的，决不盲目向国外订货。进口外国设备时，他巧妙地利用各国厂商之间的竞争，选购适用而又便宜的产品。在国外，他长年累月地谈判、参观、设计、订货、验收、学习，由于长时间的熬夜，终使侯德榜在纽约染上了一种“枯草热”病。虽如此，但他仍每天工作到深夜。这时，国内政治日见腐败，家中母亲去世且又被盗。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这些事“设非隐忍顺应，将一切办好，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吾

人今日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弗顾。其实目前一切困难，在事前早已见及，故向来未抱丝毫乐观。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1936年侯德榜回国后，把购自英、美、德、瑞士等国和本国制造的设备进行安装，最后全部成龙配套。1937年1月31日铵厂试车成功，亚洲第一流的永利硫酸铵厂终于建成。当这消息在《海王》杂志登出来的时候，国内外专家在惊讶之余，无不佩服之极。永利公司的塘沽碱厂和南京硫酸铵厂两大化工企业的建立，为我国化学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落后国家办化学工业树立了榜样。侯德榜“拼命为之”的又一事业成功，“予”字收笔，迈出了化学工业的右脚，实现了中国化学工业酸碱两翼齐飞。

侯氏制碱 化工桂冠

南京硫酸铵厂开工不到半年，日本侵华战火蔓延南京。日本驻南京领事胁迫该厂与他们“合作”。范旭东与侯德榜大义凛然地说：“宁可给工厂开追悼会，也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他们冒着日机轰炸的威胁，布置技术骨干和老工人转移，把重要机件设备拆卸，分批船运入川。永利公司在塘沽、青岛等地的分工厂也纷纷撤往四川，开始在后方重建化工基地。他自己“在风雨飘摇之中最后离厂。悲壮心情，同人莫不钦佩”！1938年初，侯德榜率员在四川五通桥建起永利川厂。但当地深井中盐卤浓度低，苏尔维的食盐转化率不高，制碱的成本骤然提高，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重新摸索一条路子。

当时，德国发明一种“察安”制碱法，盐的利用率高，于是侯德榜代表永利公司前往德国购买“察安”制碱专利。不料德、日法西斯在洽谈中串通一气，德方蛮横无理，侮辱我国主权。为维护民族尊严，侯德榜拍案而起，中止谈判，拂袖而回。他说：“黄头发、绿眼睛的人能搞出来，难道我们黑头发、黑眼睛的人就办不到吗？”在范旭东的支持下，侯德榜在香港、上海、纽约设实验室，同技师们合作，分析了两千个样品，进行了五百多次实验，研究了各种工艺手法，终于

1940年成功独创了“联合制碱法”。这个新工艺是把氨碱法和合成氨法联合起来进行生产的，大大提高原料食盐利用率，达95%以上，同时食盐中的氯制成了农业用的氮肥氯化氨。与苏尔维法相比较，纯碱的成本降低40%，其设备简单，管理方便，尤非“苏尔维法”和“察安法”所可比。1943年，中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年会讨论同意将新的联合制碱法命名为“侯氏联合制碱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称号。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学会也授他为名誉会员。随后，侯德榜将“联合制碱法”一并收入他的《纯碱制造》一书。

由于新碱法成功，侯德榜成为国际性的大科学家，中国制碱化学工业一跃而登上世界舞台。1944年至1949年间，侯德榜为援助落后国家办碱厂，五次去印度，为印度塔塔公司勘察设计制碱工业，还赴巴西、日本进行制碱工业考察。他到印度仅一个星期，稍加更改一些装置，生产效率便由20%迅速提高到40%。

力克阻挠 报效祖国

1949年天津解放后，刘少奇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到永利碱厂视察。刘少奇说：“中国工业化需要侯德榜博士。”当时侯德榜正在印度指导工作。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启程回国。在香港，他摆脱了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纠缠，途经仁川，他又拒绝韩国有关方面的挽留，终于7月回到祖国。

聂荣臻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开国大典前夕，



天津永利碱厂

周恩来来到北京永利办事处，看望侯德榜，并邀请他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界代表一起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侯德榜，鼓励他继续为新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而努力。9月底，侯德榜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他从全国工业化的前景着想，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上书政务院，建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1950年，侯德榜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技术顾问，负责指挥一个特派组在国营大连化学工业公司设立中间厂，把联合制碱法进行扩大生产试验。在大连把“侯氏制碱法”进行工业性试验。

建国后，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按照中央政策，实行公私合营，获得成功，侯德榜出任总经理。1953年，侯德榜参加民主建国会，当选为民主建国会常委，在这期间他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中国十大化工企业设想”和“复兴工业的意见”，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1955年，侯德榜在北京被授予中科院院士。之后，侯德榜轻车简从，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指导化学工业建设与发展。侯德榜先后到了福建、江西等地农村调研考察。在调研中，他看到全国各地人口快速发展，粮食需要大量增加，但由于耕地有限，农作物肥料缺乏，长势差产量低，老百姓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侯德榜认为，应该要为农民们解决这个问题，从肥料上让农民增产增收。

过了一年，侯德榜带队到上海化工研究院，与技术一道研究化肥生产流程和工艺，经过一段时间反复试验，侯德榜发明了碳化法制造碳酸氢铵(氮肥)办法，然后亲自领导示范工厂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由于碳化法制造碳酸氢铵成本低，工序简单，易于在小型化工厂生产，非常受欢迎。侯德榜在调研中，还看到了发展小化肥前景广阔，向国务院提出逐步向全国推广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重视，为我国农业生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957年，侯德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过了一年，侯德榜被政务院任命为化工部副



83岁高龄的侯德榜抱病在家主持讨论纯碱工业的发展

部长，还兼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化工学会理事长，分管全国化学工业生产，参与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重要决策和化工行业一些重大科技活动。这时候，侯德榜已经六十多岁，他走马上任，深入福建、浙江、湖南、山东等区，指导化工企业的发展。根据国务院或化工部安排，侯德榜平时经常组队到国外去参观学习。1958年8月，侯德榜与队友正在日本考察化工企业的发展，妻子张淑春因病逝世，他回到家里，非常悲痛，没有想到相爱一生的妻子就这样走了。

侯德榜的妻子张淑春是不识字的农家女，她善良贤惠，生有两男一女。侯德榜多年在外，她长年默默地守护着小家。火化后，侯德榜把妻子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房间，长年相伴，从没动过继弦之念头，“惟将白发守空房，报答半生死别离！”终生不渝的夫妻恩爱，令人感动，可歌可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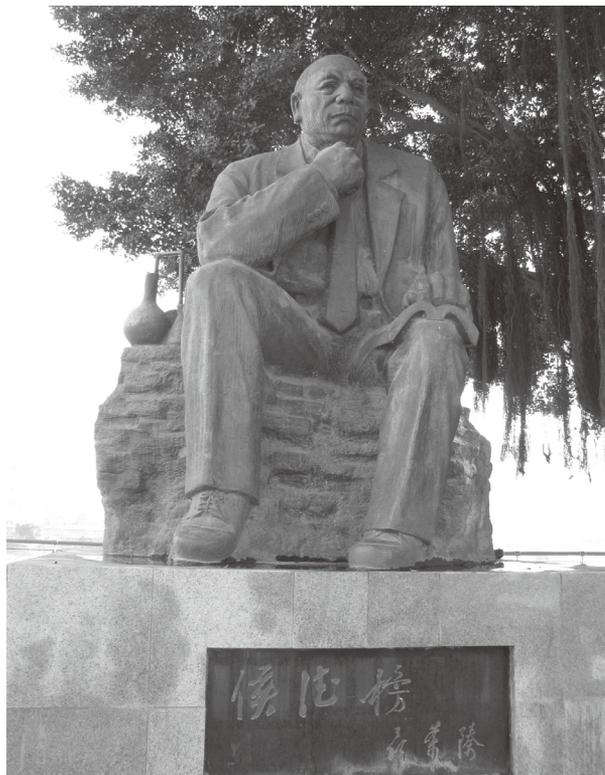
妻子逝世后，侯德榜不顾年岁已高，体力虚弱，常常带上技术人员深入福建、湖南、河南等地，指导市、县级别小化肥厂建设和生产。

由于有国家政策扶持，有化学技术人员指导，有当地政府重视，有农业生产大量需求，小化肥工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生产出一批又一批价格低廉碳酸氢铵、磷肥和钾肥，为农业丰收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8年底，他将《纯碱制造》专著结合中国国情做了重要补充和修改，完成了一部80万字的中文版《制碱工业》巨著，这是他从事制碱工业

数十年的实践结晶。他把近2万元的稿酬全部交了党费。他说：“以有生余年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德榜也被勒令停职检查。在政治风暴面前，他仍矢志不渝，带病和胡先庚一起编写《酸和碱》科普读物。1973年，83岁高龄的侯德榜抱病在家，召集纯碱工业技术干部，讨论化肥与制碱工业发展规划。1974年8月26日，侯德榜因患白血病和脑溢血于北京逝世。这位从福州台江农村走出来的科学家，为化学工业发展呕心沥血，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去世前，他交代把自己最珍贵的藏书献给国家，并交纳党费八万元。他在印度塔塔公司指导生产的时候，酬金颇丰。他支出10万美金买下北京芳家园1号和东四二条1号的两处房舍，分别捐赠给黄海化学工业研究会和中国化学学会。又另将一笔外汇分赠给中国化学会和天津中苏友好协会。

侯德榜教导后辈爱国爱党爱家乡。侄儿侯虞钧回国后，发明了著名的“马丁-侯”公式，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新中国的化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德榜对家乡的化工建设十分关



台江江滨公园内的侯德榜塑像

心，几乎每次写信给时任福建省化工厅总工程师侯敬思（侯德榜胞弟），都对福建如何上马化工厂及生产中应注意的问题作具体指导。弥留之际，他惦记着要在福建办一个碱厂，为家乡人民生产价廉物美的纯碱；还在一张化学元素表上签名后，交给重孙，要他能继续为祖国为家乡做出贡献。

祖国和人民记住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化学学会于1996年设立了“侯德榜化学科学技术奖”，这个奖项是全国最高级别的化学奖项，每两年评奖和表彰一次，以激励广大化学科技工作者投身于化学工业和化学科技事业。中国科协、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等中央七部委于2022年研究决定，在全国选择140个单位，作为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侯德榜故居被列入，序号为81。自从基地成立以来，福州市和台江区许多学校，已多次组织老师和学生前往参观，接受爱国思想和科学精神教育，从小树立为国为民和热爱科学思想。1990年10月10日，国家邮政局发行J173“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第三枚20分邮票就是化学工业科学家侯德榜，以“侯氏制碱法”生产工艺图作为邮票背景，以此纪念这位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委，于2014年启动了科学家主题联合宣传活动“共和国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曾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任教授的侯德榜入选，天津大学请国家一级编剧兼导演许瑞生执导，创作出一部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于2021年10月27日在天津大剧院上演，产生了极大影响。福州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把侯德榜故居门前的北兴路，命名为“德榜路”。台江区人民政府在福州江滨公园里立起侯德榜的铜像，并保护好他的故居。永泰县葛岭镇九老村，通过集资办法在村部中心建了个“德榜亭”，展示其家乡的骄傲。

侯德榜是从福州台江走出的世界级著名科学家、杰出化学家、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中国重化学工业开拓者，他是台江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闽娇女宗——王眉寿

◇方 琪

王眉寿(1848—1921)，字淑怡，闽县(今福州)人，为福州“西清王氏”第十二世。王眉寿的祖父是工部尚书王庆云，弟弟王仁堪是光绪三年(1877)的状元，也是福州最后一个状元。在严格的家教下，王眉寿度过了充满浪漫憧憬的少女时代，20岁便嫁给与她生于同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陈宝琛。王眉寿与陈宝琛同为书香世家出身，两人情投意合、举案齐眉。

光绪十一年(1885)，陈宝琛因在中法战争中荐人不察被连降五级罢官回福州。陈宝琛回福州后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见拙文《福建近代教育的奠基人陈宝琛》，发表于《福州文史》2023年第二期)。王眉寿积极参与，发起创办女学。陈宝琛本人对福建教育贡献良多，他的夫人同样不遑多让。王眉寿自出嫁到陈家后，助夫教子，努力发展福州的教育事业。王眉寿先在陈宝琛家乡螺洲创办“绥和女子家政学校”，教学内容包括音乐、舞蹈，纺织等。光绪二十四年，她还把陈家旧书院改建为“螺洲两等小学”，不久又把“绥和女子家政学校”并入“螺洲两等小学”，捐资扩建校舍，王眉寿亲任监督。学校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开新式教育之先河，为家乡培养具有新学思想的人才。

王眉寿虽为官宦出身，却有着亲民情结。为了让女性能自立，在陈宝琛的大力支持下，光绪三十一年，她在福州创办了“乌石山女塾”，招



陈宝琛故居

收平民少女入学。光绪三十二年，她在福州光禄坊玉尺山房创办了“女子师范传习所”，分设“家政”和“小学教员”两班，招收女学生60余人，亲自担任第一届监督(等同如今的校长)。

光绪三十二年，全闽学会会员林柏棠倡办“女子职业学堂”，王眉寿在她的娘家、其弟王仁堪状元宅第(现鼓楼区竹林境)的后花厅和家庙内，又设立了新式女子职业学堂——“蚕桑女学堂”，设“刺绣”和“造花”两个班，每班收40名女学员，提倡女子自立。宣统元年(1909)，女子师范传习所和女子职业学堂合并为“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主要为社会培养新式的女教师。王眉寿担任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第一届监督。

王眉寿创办的福州女子师范学堂培养出的人才不胜枚举。有“文坛祖母”之美誉的冰心(原名谢婉莹)曾于1912年报考福州女子初级师范学堂,她虽然未上过小学,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913年,其父亲谢葆璋到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海军部学司司长。是年秋,冰心随母亲和三个弟弟由舅舅护送到北京,中断了她在福州女子师范学业,但她一生都难以忘怀在福州女子师范读书的情景和慈祥庄重的王眉寿监督(校长)。福州马尾才女杨纪文是王眉寿的学生之一,毕业后留校教刺绣和音乐。新式女子职业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还有一位名满闽中的“全闽第一绣手”——曾明,她的作品刺绣《马》,用独创的“仿真彩绒绣法”,即用比头发丝还细的数种彩色丝线,一针多线往返穿梭于画面上,以此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骏马。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一举斩获金牌,这幅作品后来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眉寿那颗善良的心时时关注着平民子女,热心扶持平民子女入学。福建省第一代女教师林淑柏的成长,更是倾注了王眉寿的心血。螺洲贫家女儿林淑柏3岁丧父,随母亲寄身舅舅陈萱春家度日。当时正在创办“螺洲两等小学”的王眉寿不忍小淑柏依循传统的人生轨迹,在脂粉阵中沦为平庸。于是,她多次上门动员陈萱春送小淑柏上学。当时陈萱春家人口多,自己一个小店员的收入也只够养家糊口,无法供给小女孩上学。因此,陈萱春多少有些犹豫,但王眉寿不厌其烦地劝说,她的真诚也让陈萱春不忍拒绝,就答应送小淑柏入学。这对小淑柏来说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八岁时就被外婆缠足的林淑柏的裹脚布被扯掉了,她终于上学了。当时的小学是光绪新政推动下的产物,已开始男女合校。后来被誉为“中共密使一号”的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抗日名将陈长捷均是林淑柏的同班同学。林淑柏深感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励志勤学发奋苦读,加上天赋聪颖,每学期都获得王眉寿校长颁发的“最优秀”银质镀金奖章。小学毕业后,林淑柏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关口,面临失学困境。当时她舅舅

家收入也仅够勉强糊口,完全无力再送外甥女继续学业,更何况当时连男孩子的教育都得不到保证。王眉寿看到林淑柏心事重重,也不忍心一个好苗子就此被扼杀在摇篮中,更何况自己倾注了那么多年的心血,看着林淑柏一步步成长,在如花季的美好岁月,难道就此锁进闺阁、不见天日?此时的王眉寿已在福州城内创办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并任监督。王眉寿又一次来到陈萱春家,苦口婆心劝说他让林淑柏进福州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可是,陈萱春自家的男子都没有上过中学,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女孩上学的代价不但高,而且还要忍受着流言蜚语的压力。因此,陈萱春始终不肯答应。王眉寿了解陈萱春的难处,毅然决定为林淑柏提供公费待遇,再三劝说:我办的女子师范学校供吃供住,不比在家里费钱,现在风气开通了,女子不仅可以读书,而且可以到社会做事,很体面的。淑柏很聪明,一定会学好。女子师范毕业后,学校还会保她当老师,可以养活她娘亲,你姐姐的下半世也不需你操心。陈萱春这才下定决心继续送淑柏读书。在女子师范学习的林淑柏成绩优异,1914年以最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在女子师范附属高等小学校(也是女校,即今福州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前身)当老师。林淑柏老师始终铭感王眉寿校长不离不弃的培养、提携、教育和关心她这样一个贫农孤儿,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于是她学习王眉寿校长爱生如子的情怀,立志终身从教。抗战中,林淑柏毅然回到王眉寿校长培养她的螺洲乡母校小学任教,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全心全意培养着家乡的弟子,成为福建省第一代新式女教师。

王眉寿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是她对于福建的女子教育功不可没,由于王眉寿在创办女学过程中贡献卓著,被称为福建女学第一人,尊称她为“范之师”。政府颁赐褒奖匾额“闽峤女宗”,可惜原件毁于大火,复制件现供奉在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清朝名臣左宗棠手书的“螺江陈氏宗祠”内。

王眉寿于民国十年(1921)在福州病逝,享年73岁。

林旭“维新”谋福

◇江榕

林旭(1875—1898)，字暉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近代诗人，清末维新派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其故居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

林旭自小父母双亡，由叔叔养大成人。在少年时期，他便以博闻强记、聪慧好学，赢得了“神童”的称号。他的才华为时人所赞誉，亦为他迎来了许多福气。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外孙、晚清重臣沈葆楨的儿子沈瑜庆在读过他的文章后，对他大加赞赏，并将女儿沈鹄应嫁给他。林旭在随同沈瑜庆四处游历期间，结识了倡导维新变法的陈



宝箴、陈三立父子，并接受了他们的维新思想，林旭在19岁时高中福建乡试解元(举人中的第一名)，后入官内阁中书。他在京师内阁中书任上，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多有交往。维新思想从洋务派中发展而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当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迅速崛起。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中国北洋水师，挑起甲午战争，清廷仓惶应战、节节败退，最后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日本强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人群情激愤。次年，康有为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的“公车上书”，强烈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林旭与同试举人亦奋起上书“请拒和议”，反对割让辽东和台湾。然而，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顾民意，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危机，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公车上书”的行动，让林旭对康有为产生崇拜心理，拜康有为为师，专治“义理经世之学”。1897年，他进入张元济等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增长了西学才干。1898年1月31日，他发动寓京的福建籍维新人士成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等学会互通声息，传播西学。不

久，康有为在京组织保国会，林旭为该会“始倡董事，提倡最力”，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变法运动，成为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之一。1898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荣禄听闻林旭有才，希望能将他召入幕府。林旭就此询问康有为的意见，康有为告诉他：“就之何害，若能责以大义，怵以时变，从容开导其迷谬，暗中消遏其阴谋，亦大善事也。”林旭既没有因为荣禄背后有慈禧太后这座大靠山而动摇立场，也没有因为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荣华富贵而沉沦，甚至不为唾手可得的功名利禄诱惑而曲意逢迎荣禄。相反，他游说荣禄把变法讲坛摆到荣禄幕府中。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朝廷命四品以上各官荐举人才。翰林学士王锡藩将林旭推荐给光绪帝，称赞他“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犖，其才具实属超群”。9月5日，林旭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林旭就此进入光绪帝的权力中枢，不少变法上谕出自其笔，“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但维新变法触及了顽固派的核心利益，因此遭受了朝廷疯狂反扑。9月21日，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光绪帝大感事情不妙，让林旭带着密诏出京给康有为。林旭在完成这一任务后，并没有趁机逃走。不久，他与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分别被下令逮捕。林旭被俘后，“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做微笑”，当得知将被问斩时，他在狱中留下一首绝命诗：“青袍饮泣知何报？慷慨难酬国是恩。我为君歌千里操，本初见者莫轻言。”9月28日，他们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林旭时年仅24岁，是戊戌六君子中最年轻的一位。

才华出众的林旭留下的诗集《晚翠轩集》，精妍博瞻，意味隽永。外患频仍、国势衰颓、民生凋敝的晚清社会，铸成了其苦涩幽僻、用意豁

刻的诗风，橄榄回甘，弥见风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赞叹林旭：“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环奥深秬。”林旭被视为学宋的同光体诗人，但在诗学观念上比较包容，认为“论诗如文较多派，能驿众家即无害”。他曾在《直夜》一诗中写道：“依违难述平生好，寂寞差欣咎膏宽。身锁千门心万里，清辉为照倚阑干。”表现其参与新政变法的坚定决心。在他另一首诗作《还福州》中写道：“客吴思越此成回，云水多情识我来。白氎千重遮日走，绿荷万顷泛风开。车音听入江干别，庭树归寻旧月栽。仰屋波光看不定，顿思微醉玩深杯。”暗喻了当时国家局势的不明朗，抒发了他对乡土的眷恋之情和为国家命运而忧、济世报国之情。

据林纾《剑腥录》记载，林旭并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是挂念“娇妻尚在江表，莫得一面，英烈之性，必从吾死，不期酸泪如绠”。远在福州的沈鹊应得知丈夫的死讯后，悲痛万分，写下一副挽联：“伊何人？我何人？全凭六礼结成，惹得今朝烦恼；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据说，她曾以仰药、绝粒等方式殉夫，最后因哀毁过度，于1900年4月香消玉殒，年仅24岁。

沈鹊应自幼师从著名诗人陈衍，天资聪颖，现存《崦楼遗稿》，其中一首“悼夫之词”《浪淘沙》全为其“血泪所凝成”：

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篋中遗稿自千秋。

肠断招魂魄不返，云暗江头。

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悔恨更何尤？

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她与林旭可谓珠联璧合、才子佳人。这对眷偶最后安葬一处，其墓联云：“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楼绝命词。”

林旭在最美好的年龄、最高光的时刻，生命被迫戛然而止，令人痛惜不已。他获得的人生现世之福实为短暂，然而他致力于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想、为国为民造福的理想信念，却如星星之火遗留于世，只待一阵春风吹来又能炽烈燃烧。

林云铭与古文析义

◇黄益群

位于福州南台岛的林浦村，它静静地看着世事风云变幻，沉淀着属于自己的厚重与传奇。

地灵人杰的林浦村，村口有一座高大的石牌坊跨街而立，正面为“尚书里”三个大字，背面书“科第联芳”，中间石柱上对联曰：“七科八进士传经衍庆；三代五尚书积德流芳。”这座明隆庆年间皇帝赐建的牌坊，昭示着明代林浦林氏家族不容小觑的尊贵与名望。

林氏自五代间入闽，世居福州开化里林浦，至十三世家族衍为六支，为礼、乐、射、御、书、数六房。林浦林氏兴起于明永乐年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家族声望达到鼎盛，是福州府重要的科举与文学家族。林氏家谱现存最早的一篇序文是天顺元年（1462）林元美所作，《天顺壬午修谱序》曰：“稽我远祖，五代间自固始入闽，卜居斯乡。因用吾姓名乡之浦曰林浦，岐曰林岐，桥曰林桥。”

林云铭字道昭，号损斋，他这一支属于林氏“射”房，高祖林潮与林元美子林瀚同辈，曾伯祖林庭壘与林瀚之子林庭机为同榜进士，是“七科八进士”之一，曾祖林庭春，祖父林煜，父亲林兆熊。

闽县林浦林氏之盛在明代屡屡为人称道，只要是文人墨客都不吝惜为之增添一笔。时光荏苒，林氏到清代，科举的兴盛与荣光就慢慢黯淡下来，虽如此，但林氏对于科举依然有着执着的

情怀。少年林云铭刻苦自励，“与伯兄云镶发奋读书”（《福建文苑传》），他嗜学的坚韧与刻苦闻名于时：“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今世说》）夏天，燥热难当，家僮准备了温水请云铭沐浴。少年云铭正读书入迷，他没脱衣服，就径直把身子浸入盆内，衣服都湿透了才发觉，同乡的人都呼云铭为“书痴”。

林云铭从幼时就喜欢古文词，他自云：“余自束发受书，即嗜古文词，时塾师亦仅取坊本训诂口授，然余终疑古文比不如是作，在后入亦必不应如是读也。比长，偶取一二篇逐句逐字分析揣摩，反复涵泳，遂觉古人当年落笔神情呼之欲出，狂喜竟日。”（《古文析义初编序》）因为不满塾师讲授古文的内容和方式，云铭自幼年时就开始自己探索古文的阅读方式，体会古人写作的苦心，自有心得。

林氏一族以治《春秋》晋身仕途而声名鹊起，林云铭自然也不会免俗。《春秋单合析义》是林氏家藏秘本，卷首有林云铭序曰：“余家以《春秋》世其业，记早岁司刑新安时曾有题要辨疑之刻，删繁就简，以便初学。”顺治五年（1648），林云铭中举后，在福州城南筑小斋，肆力钻研《春秋》，他在《春秋题要辨疑序》中云：“戊子，倖领乡荐，誓以抱膝十年为期，即卜筑小斋于城南之麓，延师其中，讽诵之余，辄取《春秋》题旨，合众说而析其衷。”顺治八年，24岁的云铭在福

州于山平远台读书。

潜心读书的林云铭没想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顺治十二年，林家遭遇大难：清初福建沿海反清势力活跃，在政治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有族中豪强与海外交往，一向通奸，这无疑会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这场家族纷争几乎置林云铭一家于死地，林兆熊一家迁往建宁府避祸，林云铭携家带口前往建宁府，依附顺治九年壬辰科武状元王玉璧，直到康熙七年（1668）才回乡祭祖。林云铭在《重修诸祖墓记》中曰：“余早岁以先府君家难，出居建州游宦日久，戊申、己酉两岁，回籍展祭祖茔。”

顺治十五年，林云铭中进士，授徽州推官。林云铭为官政绩突出，但性情刚直，不屈权势，终被排除在官场之外。康熙六年，林云铭因裁缺归里，开始了建宁府的隐居生活。

建宁府山水秀丽，林云铭抚琴蓄鹤、登山临水、读诗赋词，平静中的高雅充满了隐士情调。可是，一场无妄之灾突如其来，把他的生活摧毁。康熙十二年，耿精忠叛乱，林云铭被获遭囚，下狱18个月。他九死一生，誓死不肯依附，直到王师入闽，才摆脱厄运。康熙十七年，林云铭携家人入杭，僦屋杭州南璧里。他在《为霖禅师还山录序》中写道：“闽变之后，余以蒙难无家，舍芝城而客杭。”常言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杭州，林云铭为了生活，开启卖文生涯，终成一代大家。

迁杭之后，林云铭开始编纂《古文析义》。他在《古文析义初编序》里写道：“近客西湖，日与二三好友相过谈文，不异南村晨夕。尝叹古人所读，其书俱在，非有秘幻奇诡不可见得者，而今



林浦村尚书里

人不能效古人之作，乃今人不能效古人之读耳。因取坊本撮其要者，字栉而句比之，编末各附发明管见，以课子弟。”

历经四年，《古文析义》终于完成，出版后反响甚好：“为海内具眼许可，嗣凡式庐枉顾者，无不以二编为请。”在大家的催请下，林云铭开始编纂《古文析义二编》，从康熙二十四年三月至二十六年十月，《二编》完成。林云铭在序里云：“余姻娅叶子宗之牙签颇饶，复假余馆，俾得广搜前编遗逸。余以嗜古技痒纵目其中，屏绝应酬，揣摩经营，寝食皆废。”（《古文析义二编序》）

南宋以来，古文评点本层出不穷，明代中期后，科举时文写作的需求，造就评点风气之盛，各类评点本蔚为大观。林云铭编纂《古文析义》是为了纠谬正讹，他以严肃的编纂态度，在为《古文析义》选文的时候，不仅重载道、重新重奇，也重视议论叙事文，努力使“千古作者苦心”不致“埋没尘坌。”《古文析义》自发行后，备受关注，也备受青睐，因此发行量巨大，版本十分复杂，从清代到民国之间，流传五十多种版本，经久不衰。

林云铭提倡读书，他说：“后人不患不如古人之作，特患不好古人之读，尤痛为后学针砭。”他著作很多，影响很大。仇兆鳌云：“先生于经史无不淹贯，又探奇于庄屈，取法于史汉，摩神于唐宋大家，宜其才雄力厚，品格高古而姿韵悠扬，不愧当代作者。”

康熙三十六年，林云铭因痰疾卒于杭州。《晋安林西仲传》：“越明年，移寓杭州凤山门外，以痰疾终，享年七十。”



濂江书院